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人在东欧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第一章 1989，中国人“远征”东欧

苏联东欧地区对中国人来说，虽属近邻，却一度远比天涯。

曾经是“同志加兄弟”，转眼就变成了“头号敌人及其仆从”。先是辩论对骂，后是兵戎相见，无形的一道铁幕，使两方老死不相往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热”持续升温，美国、加拿大、西欧、日本、东南亚、澳洲、南美、塞班岛……唯独不能去被誉为“地绿中心”的东欧苏联这一大片地广人稀的地区。亚欧大陆悠久的“丝绸之路”，一断就是20年！

人们害怕。

识字的中国人合书闭目，眼前立即浮现出一幅图画：白的是雪，黑的是面包，还有疯人院、克格勃、坦克和熊。

山不转水转，原则随着时光转。

80年代后期，双边互称“同志”了。

先是东欧各国党政领导人，最后是戈尔巴乔夫本人，陆续到了北京。酒杯双碰，相逢一笑。百姓们被告知：过去的让它过去。

就在这时，西方各国因1989年北京事件对中国人关紧了栅栏，而苏东铁幕四面洞开，中国人近水楼台，“出国潮”立即转向了苏东地区。短短3年，去苏东地区的中国人远远超过了14年中去西方各国的总和！

人们称此为“苏东波”——苏联东欧之“波”。

（一）出国潮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一曲充满忧郁和希冀的《橄榄树》，载着东方古国的丝绸、珍珠、风油精，随着趟趟爆满的国际列车，传入了蓝眼睛的世界……有人为了欣赏“天空飞翔的小鸟”，更多的，则是为了追求能在这个星球上横冲直撞的美钞……

中国与苏联东欧关系全面正常化后，首先是扩大经济和教育文化交流。最先看到庐山真容的是政府官员和公派留学生，而因私到这些国家的大流源头在哪里呢？

应当说，先尝禁果的人是勇敢者。

最早持因私护照到东欧的是一批探亲访友者和路过东欧去西欧的自费留学人员。首先吸引他们的是匈牙利和波兰，懂俄语的去了苏联。

王君是1987年自费到奥地利留学的中国某市郊区人。物价昂贵，在奥国生存不易。王君1988年因买不起飞机票而坐火车取道布达佩斯回国。那时的布达佩斯街头出现一个亚洲人都容易引起围观，人们问王：“你是日本人？你是南韩人？”一听是中国人，人们就肃然起敬。何也？中国改革得早，加上中国敢于反对前苏联霸权主义，而这些国家的前领导人大多亲苏，所以，东欧人民对中国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觉得中国人有骨气。

王君在举目无亲的情况下，很快结交了不少友好的匈牙利人。他们提供条件不错的住房，只收很低的房租，王君把一些没有送完的礼物，如清凉油、风油精、丝绸衫、珍珠项链等拿到自由市场去卖。回忆当年，王君笑了：“我从来没做过生意，也不知家里人给我买这些东西时花了多少人民币。嗨，就瞎卖呗！清凉油、风油精一个卖1美元，项链每条卖15美元，绸衣服卖60

美元。一天就卖完了，总收入 860 美元，全部东西只有一个小包。”

“我简直觉得在做梦！”王君如今是一个商店老板，他的外国妻子当经理，而他还在读书。王君继续对笔者说：“卖完了货我从梦中笑醒，我要回家，买了再来卖，可是持中国护照回去了就出不来了，我的匈牙利朋友一个上午就把三年居留证，也就是人们说的黄卡送给了我。我回到了北京，立即把美元换成人民币，到自由市场批了 10 包货。莫斯科的朋友帮我买的火车票，从北京到匈牙利只相当于两条牛仔裤的价钱。我就一个月一趟来回跑。除掉一切费用，每个月光靠跑单帮可以挣二万多美元。我主要卖珍珠项链、电子表、打火机和砂洗衫，这些东西很轻，利可十倍翻。几个月以后，其它收入也就多了，我就不愿来回折腾货了。”

到后来他为什么不做货的买卖了呢？不便问他。据他的朋友讲，他后来就不贩货，而是“贩人”了。

（二）“人贩子”

护照能在发展中国家成为商品，“人贩子”自称促进了国际交流大循环。靠赚同胞的血汗钱成为百万“大款”，他还要感谢国家的护照制度……世人都说出国好，个中悲苦天知晓……

读者或许要问：人也是可以“贩”的么？问题不在于合法不合法。资本来到这个世界，每个毛孔不是滴血也是滴脓的。中国人想要出国的何止一千万！出国的目的有留学、工作、探亲、访友，只要有国外来的信封，里面装有一纸担保、邀请什么的，等一个月就批下了护照，最短的只要几天。只要有关系，在中国好像没有办不成的事。王君先向朋友中间发这些邀请书，每位收 1000 美元，朋友的朋友收 2500 美元至 3000 美元，而每份邀请书“成本”在 10 美元以下。到 1989 年 6 月，王君每个月要办近 100 人。按地划分的价格如下：

一类地区：福建、浙江、广东每位 6000 至 1 万美元。

二类地区：上海、东三省 3000 至 6000 美元一位。

三类地区：北京和内地其它省份每位 2000 至 3000 美元。

注：这是到匈牙利的价格。

读者又要问：这么高价，有多少人要买邀请书呢？

福建一位“蛇头”（专办出国手续生意的经纪人）说：“在三明地区、温州地区、青田县，每个乡要出国的人就不止 200。北京要是放开了，至少有 10 万人要出国，要是国内申请护照容易，我就没饭吃了，所以，我要感谢现在的出国管理政策。”

王君于是就开办了正式的“国际人员流通”业务。他是在几个月暴发成百万“大款”的中国人。他所办的人都要按他的清单带十几包货到匈牙利，以两倍的价批给他，而他再以四倍的价批给匈牙利等各国商贩。每个人到匈后仅把货一批，就赚回了办出国的部分或全部费用。王君还利用当地关系，为这些人办白卡（半年至 1 年居留）、黄卡（1 年至 3 年居留）和蓝卡（6 年至 15 年居留权，即移民卡）。办这些“卡”又是无本万利的生意。

“办人”是否违法？中国驻某国三位不同级别外交官的回答是：“很难

说这是合法的，但也不能说这是违法的。他们（蛇头）能弄到所在国一切真实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合法的工作，探亲邀请，而且有公证章，是花了代价的，至于收入多少费用，完全是愿打愿挨的。凡是这类事告到我们这里，我们是不受理的，这是所在国法律的事。”

不管怎么说，王君现在手持多国护照或永久居留卡。除了在赌场输了十几万美元（王君如今发誓不再赌了）外，买了几处房产和两个铺面，汽车、游泳池、社会组织头衔什么的，都有了。银行存款这辈子不出灾祸是用不完的。由于他拿出钱来赞助过国内家乡小学，县里把这个小学的名字也改了，还要把他选为当地政协委员。“有了钱，就有了名，没钱，华侨回国要挨白眼的。”曾是读书人的王君提醒不开窍的访问学者说，“我原来也和你们一样安贫乐道，只想学好专业，科学救国，多天真！谁救你？现在，我回去也是个外商，处处受到款待，要是混不好，回去以后，当个典型，宣传‘优越性’、‘母亲的怀抱多温暖’。那滋味没尝过，却也听说了不少。”

（三）“黄祸又回来了！”

成吉思汗，一代天骄，令欧洲人谈“黄”色变。几百年过去了，欧洲人又惊呼：“中国人一夜开来了几个师！”……

早期像王君这样发大财的华人数约百十来人。这些人现在大都进入西欧、北美，买房置地开餐馆，或像王君这样的读书人还想读书。有些暴发户把这些来得容易的钱全部或大部扔进了赌场。

1991年4月以前进入东欧的中国人无论大财小财，应当说都是赚了钱的。勤劳、聪明的中国人，在有人的地方就能活。回国后不用吹，腰缠万贯，哪个不服？个中秘诀，不便多问，“贩人”贩货，促进了国际交流，至少是大开了数万中国人的眼界。这些人全都取得了国外居留权，可以自由往返。在这些原来都不富裕的国家，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凭金钱、汽车和其它财产说话的。

中国人涌入东欧的动力之源，就是对国外发财的向往和能赚钱立足的客观条件。促进这股大潮向前的是像王君这样的中外“蛇头”。东欧“国际倒爷”和东欧在中国的留学生，也都在幕后制造了一份份合法文件。这些文件使中国各地公安局护照科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使北京至莫斯科的国际列车票成百倍的涨价，使中国人成群结队地出现在东欧各城市的街头。东欧一家报纸惊呼：“中国人一夜开来了几个师！”少数复活的当地法西斯分子狂喊：“黄祸又回来了！”

据权威人士估计：从1989年年底到1992年3月底，中国因私到东欧列国的人数约有6万人——一个整兵团！比这个数字还要多的人到了前苏联（今俄、乌等国）。

冲在这股出国潮排头浪的有一批学生、学者，他们的目的地不在东欧。据匈牙利《人民自由报》报道，他们是由于“政治迫害”而以到东欧的名义去西方寻找“自由”的人士。但笔者在东欧一年多，竟没有遇到一个这类中国人。再则，能领到出国护照的人，还有政审一关要过吧。倘有政治原因，谁也不敢斗胆发出境卡。

(四) 条条大路通罗马

据说天上有一位仇视人类的恶神，为了看到人类相互残杀、血肉飞溅，就通过种种魔力，使人间产生了金钱。金钱对人类的诱惑力是人所共知的，而在今天的中国，走出国门的诱惑或许比金钱还要大……国外遍地是黄金的梦幻，使许多国家的边境线上越来越多地印满了中国人的足迹……。在那一行行慌乱蹒跚的足迹之间，洒落着点点斑斑、令炎黄祖宗羞耻的心泪和热血……

有一部分华人到东欧的目的是转道去南朝鲜、南非这两个与 7 中国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东北地区的朝鲜族人去南朝鲜探亲做买卖不能取道北朝鲜，而东欧几个国家和原苏联与南朝鲜有外交关系，可办进入南朝鲜签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1992 年 8 月 24 日中国和大韩民国建交为止。

由东欧转到西欧的主要是中国南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人士。这中间有花钱买合法入境手续的，大部分则是有组织地偷渡进入意大利、西班牙、奥地利等地。也有进入西欧后因吃不了打工之苦又折回东欧做小生意的。曾在国内当了五年记者的小谢就是其中一个，他回忆偷渡时的情形是：

蛇头把他和其他 6 位偷渡者带到原南斯拉夫与意大利交界的小镇。两天后的一个晚上，蛇头命令众人把大行李都甩掉，只带一个小提包，坐上一辆封闭的大卡车，绕过关卡，下车爬过两座山，躲过几队巡逻兵后冲下一个山坡。这时，天已有点亮了，蛇头指着山下说：“下面就是意大利！你们快冲！过去就好了，不远有一个小镇，你们按这个号码打电话，就有人开车来接你们去罗马，万一没人接，就花几个美元搭车，反正条条大路通罗马。”

这位小谢当初是被蛇头吹昏了头而偷渡到意大利的。他吃不了打工之苦。痛定之后，也当起了蛇头。当时，他专门在匈牙利组织华人办进入南斯拉夫的签证。1956 年曾经为纳吉避难的南斯拉夫大使馆，面对匈牙利人引为骄傲的英雄广场，而在巨大的艺术塑像四周，每日要汇集百十位来自东胜神洲的偷渡者。他们三五成群，低头不语，在类似小谢那样的蛇头的带领下默默地排队等候签证。对他们来说，南斯拉夫离他们想象中的西天极乐世界只有半步之遥了。

由东欧进入西欧的偷渡之路苦状莫名、险象环生。偷渡者夜间行车，司机不敢开大灯，走的又是僻乡山路，一不小心，车翻人亡。不期遭遇边防军，捉住了搜身审问，受尽奇耻；胆大的无视严令，拔腿就跑，不出几步，就在边防军警枪弹之下非死即伤。

由西方折回东欧的华人声泪俱下地介绍他们的悲惨经历，也使一些原来准备偷渡西方的华人改变初衷，就地“淘金”，使东欧华人与日俱增。直至今日，“东欧热”仍未冷却下来，成千上万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来到了这片陌生的广阔天地，开始了新的营生。

第二章 淘金谱

(一) 龙有九种，种种各别

在中国活得无忧无虑的人只是想出国观光，而那些要背井离乡出国谋生存的总有一些“伤心事”。……还有的，是为了“躲事”……

这里不包括因公出国的外交人员、国营公司干部和公派留学生。持咖啡色因私护照到东欧的中国人有以下几类：

因去西方不能入境而滞留的中国人。中国外交官称之为“滞留者”。

以留学名义出来的。

以受聘工作名义出来的。其中包括“公派自费”，即持因公护照以公费名义，实际上是自费的人员。

以探亲访友名义出来的。

以私人名义实为国内公司或机构公费派出的少数人。如国内某大公司，在办理劳务护照时为本单位干部也办下因私护照。这类人员又称“公费自派”者。

到东欧这些国家干什么呢？观光旅游是极少的，大多数人是来谋生的。谋生的生计大体是：

一、开办公司，做批发零售中国产品的生意。真正运转起来的中国公司只占极少数。在东欧各国注册的中国公司（有限公司或无限公司）有数千家。其中在匈牙利的就有1000多家，在独联体各国千余家。注册公司的费用不等。就注册资本来说，无限公司无底限，有限公司在罗马尼亚要2000多美元，匈牙利要7000美元左右，捷克和斯洛伐克也是如此。注册费（包括律师费、咨询费）1000—2000美元不等。在边远城镇申请注册比在大都市申请速度快。相比之下，比在国内手续简单多了，所需资本也少多了。有人是为了解决当地居留身份而注册公司的，注册后并不运转的公司占大多数。中国人公司名称也有特色，叫“X龙”的有很多。已知叫“长城”的公司有十来家。

二、做小买卖。自由市场是唯一可以摆摊的合法场所。华沙、布拉格、贝尔格莱德、布达佩斯等城市有“跳蚤市场”的地方就有中国人，这是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操北方话的中国人主要的谋生职业，无论他们是以什么名义出来的。

三、办人。西方称之为“办理出国手续经纪人”，中国北京人贬称为“人贩子”，中国南方叫“蛇头”。蛇头自称“做人头生意”。职业干这一行的多半是浙江、福建和黑龙江同胞。职业办人者实际上是较守信用的。他们有完整的国内外配合机制。如：办一个某县某乡的某一个人，国内手续如乡村证明，县市公安局，省公安厅关系，翻译文件，到北京订票或办过境签证全包；国外完整的合法文件及公证、认证手续的办理，出国后的接机接车、住宿、转往目的地的接应，也都包揽无遗。全包下来的费用是6—10万人民币。人到目的地，电话通知国内付款，交款人也是守信用的。或者是部分承担责任制，如：只办国外全部手续是一个价，人到莫斯科是一个价，到布达佩斯、华沙和布加勒斯特又是一个价，转送到维也纳又是一个价。送到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是高价，最高达12万元人民币。有送到美国的，价更高，据说在3万美元左右，最高达4万多美元。

四、办餐馆旅馆。中餐馆在东欧是近几年由无到有的。最初只有在莫斯科的官办合资的“北京饭店”，布达佩斯的“四川饭店”等。到1992年3月，东欧各大都市都有了规模不一的各式中餐馆、中国快餐厅，连边境小镇都有了中餐馆。捷匈边境、匈奥边境、匈罗边境都有了中国餐馆。从1992年元月开始，布达佩斯这个只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家中餐馆开张。与餐馆类似的中低档旅馆，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过往行客和一时找不到房的初到者。如莫斯科的“乌拉尔”、“爱华”、“花都”旅馆，布达佩斯的“欧亚”俱乐部，罗马尼亚的“中国之家”等等。这些中国人集中的地方也是中国人的信息中心。

五、代理商。有国内背景的中国人作为国内国营公司或行政单位开拓市场，收揽信息，代办贸易或投资业务。这类人员本身素质要求较高，必须深通外语且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这类人员数量不太多。

六、留学。以学语言为主。东欧各国都在使用自己的民族语言。苏联解体后，独联体各国也逐渐扩大其民族语言的使用范围，连几百年不用的“死语”也复活了。中国人到东欧正式读学位是相当困难的，只能先在语言学校学几年，再进大学预科。

七、打工。在东欧国家企业打工几乎是不可能的，主要是在中餐馆、华人公司或旅馆打工。

八、跨职业者。边留学边做小买卖；贩货贩车票兼“贩人”，“合法”事与“不法”事同时干。在国外，为了生存，靠各种方式谋生，是正常的，也是常见的。

九、卖艺。中国的艺术家也常出现在东欧街头，作画卖画、剪侧影像、拉二胡、吹笛子、表演武术、练气功、玩杂技、演魔术，个人团体都有。1991年一次自发的国庆联欢会，部分艺术家（包括电影导演、歌唱家、相声艺术家）随便就能推出一台高质量的演出。难怪有人说：没一两手的人是不敢出国的。专门在街头卖艺的人不多，但影响很大。精彩的中国民乐演奏和中国国画很受东欧人欢迎。

十、开办诊所。中医针灸、按摩在东欧有一定市场。东欧不像西方那样难领行医执照。最早到东欧办诊所的是东北地区的单位或个人。不少中国外交官也请当地中医看病。

十一、无业者。这些人在国外怎么活命？读者不用为他们发愁，他们中有人带出去的钱足够活几年、活一辈子甚至几辈子。他们先等等看，买下房产，买下移民身份，有的甚至能更名改姓买下不止一个国家的护照，或问他们钱从何处来，别人谁都不知道，但谁又都明白。被采访的一个地地道道的中国同胞，外语一窍不通，只知他一个很普通的洋名字。他自己无意中说：“老子这辈子不愁没钱用，谁敢与我过不去，别说在国内，在国外老子也有办法收拾他。”有一部分是短期无业者，走走看看，混不下去，再回国。他们也有句口头语：“我的优势在国内。”

十二、贩毒者和为娼者。这已是公开的秘密了。据驻某国使馆的官员讲，当地警方已向他们多次照会，并提供了从华人手中搜出的毒品证据。关于卖淫者，公开的占少数，主要在各大都市的夜市或旅馆中出现。暗娼只有从嫖客的口中或警方的口中才能略知一二。另外就是“业余”的，边做事，边卖淫。至于生活无着落、安全没有保障、不断与人“膀肩”（同居），给“大款”干“全活”的女子，不在此列。

（二）华人百态图

仿佛在一夜之间“几个师”的中国人就从海、陆、空同时登上东欧的国土，并且非常迅速地在东欧挖掘了网一样的“商城”沟壕。尽管许多“城堡”都是几个哥们和姐们“凑份子”从蓝眼睛人那里租借而来的，参加“商战”的武器也多是一些中国大铁炒勺和针灸的银针……然而，这“几个师”的战斗力却是不可轻视的。元帅的心只能有一颗，元帅手下的士兵却是同吃一种米，长着不同心……

苏联东欧本来与中国是联成一片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但 20 多年不相往来，近两代人无法了解沟通。苏联东欧政治变质后，经济大滑坡，人民生活水平一落千丈。为什么人们知道这些国家并不富裕也要去“闯一闯”？为什么占 99% 以上的人根本不懂这些国家的语言、文化、历史，也敢去这个陌生的世界？应当说，几万个人出去有几万种原因。笔者总不可能写出万般情由，只能将所采访之几斑以充全豹。为信守诺言，故将被访者真名隐去，按字母顺序把其真事列来。

艾君。36 岁，北京市个体户。

“我在中国什么都有了。”艾君不无自豪地谈起他在北京的房子、财产和铺面。他出国时连自己的报关表都是别人代填的。1990 年中国治理整顿期间，他的个体商店商品积压严重，不知是哪位官家没有侍候到，有人告他一个“偷税”罪。“我的确不知在红桥哪些事是合法，哪些事是违法。人情做到家了，百事通得过，哪一个环节忘了打点，罪名就来了。”他没有多谈自己，只是抱怨“贪官”无厌，“反正，这几年挣的钱两辈子也花不完。罚完了，老子不干了，花 2500 美元到国外看看，也不枉为人一世。”艾君出国较晚，错过了贩运黄金期（1988 年至 1991 年春）。出国一趟，没赚到钱。回国重操旧业，幸逢允许胆子更大一点，日子仍然红火。想起他在华沙、布拉格、布达佩斯所吃的苦头，艾君说：“我再不出国了。”

毕君。28 岁。她是内地某省某研究所的工程师，77 级大学毕业生，82 级研究生。“我出国完全是为了解决两地分居问题。”她莫不伤心地谈她的过去。毕君的丈夫在上海工作，两人是下乡插队时患难之交。“进上海比出国难多了！”她这样说。毕的丈夫在上海某图书馆工作，公婆都是“永久牌”病号（毕君笑语）。丈夫不能离开上海调到外地，媳妇又不能尽半女之心。调到上海是登天梦想。于是，她通过“关系的关系”，买到了一张“单子”，来到了华沙条约签署地。她曾天真地想凭自己的计算机专业在国外可以发挥专长，再接丈夫公婆出来。这样，她就借了一万人民币自己先行一步。到了波兰，头都晕了。这里的失业率远远超过了中国，找事做谈何容易！她终于改了行。“我总要赚回一万人民币才能回国呀！”她先摆摊，不会算账，看不住货，被偷的货值比利润还多，她只好与一个台湾老板“膀了肩”。老板倒是没有亏待她，没让她只当“朋友”，而是发挥她的专长、让她做计算机生意（后文“港台商人在东欧”有补）。这个老板也姓毕，在酒宴中众人称她“毕太太”，她是坦然答应的。

毕君没有忘记她的家和她的同类。笔者采访她时，她还含泪谈起她不久前一次感想：“上个月我和毕先生到布达佩斯，看到自由市场上的中国小贩

有不少是国内教师、医生、工程师，我意识到已有一批知识分子就像我一样，如水土一般流失到国外。出来了，谁愿没混出点名堂就回去？就当泼出的水，谁会可惜。”

蔡君。33岁。他可没有毕君的“觉悟”。蔡也有大学文凭，但一听就知道是买的。“在中国哥们儿没有办不成的事。”蔡君如是说。蔡君在东欧三国有房产。他自称在国内做过房地产，是内行。蔡君文化水平不高，但对知识分子还比较重视，见人戴眼镜或谈吐文雅一点，就说：“你给我干吧，在国外你有文化，有能力，我有钱，绝对不亏待你。”笔者曾好奇地问一句：“你的钱怎么出得来，国家不是严格控制外汇出境吗？”

“你真是书生。”蔡君说：“你知道我是怎么骂海关的头吗？敢查我的包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再个，有钱还怕买不到一切？”

笔者听不下去了，问他：“没有中国你还能牛气吗？你大概是最有资格说好字的人呀！”

蔡君不这么看。他答：“要是没在中国，老子现在可能是个博士，说不定也是一个包玉刚呢。当年我上学时，娘老子靠边站了，现在老子上学又太老了，老子的老子知道自己有愧，才不得不做点补偿。说不定将来谁靠谁呢！”

蔡君是很聪明的，也是勤劳的。他有雄厚的资本，特别注重网络人才，目前麾下有健全的人马班子：英、德、俄语三个翻译，还有专门对付东欧黑手党的保镖，有会计、秘书，有专门的律师和所在国代理商，他的努力已从国内延伸到国外。自己又不到外面嫖赌。房地产在东欧是大有作为的。蔡君是真正赚了外国人钱的东欧华人中的一位。

戴君今年50岁整，衣整貌端，颇有东南亚实业家的气度，原是江南登了报的“农民企业家”。他是东欧新一代华人中年龄较大的。戴君出国，完全是为了一封信，他称之为的“诬告信”。

80年代初，戴君平反了（笔者至此死也想不起他所讲的平反原因，反正是平反了）。他由S市到W县承包了一个纺织厂，几年之中享誉海内外。戴君是拿得出国内外报道文章和图片证明这一点的。

“后来，我也有了钱、房子、汽车。老婆比我小20岁，受不了我天天在外谈业务，给伊20万，留下儿子放回大城市了。就在去年春节，上面派人来调查我的经济问题。其实，写匿名信的字我一看就知道是啥人写的。我也不申辩，一个报告写上去，阿拉不干了，就让伊来当厂长好嘞。斗来斗去没意思，急流勇退，见好就收。今天政策说你是致富模范，明日领导说你‘有问题’，上半日大干快上，后半日冒进无功。罢了，交给朋友两万美金，买了本汤加护照，到南洋兜了一圈，看不到太大的发展，就到匈牙利来了。我想在这里办个厂。”

戴君也是有代表性的东欧华人。类似的笔者也采访了几位，他们经历过运动，处世待人比较慎重，出示他国发的护照时可看到名字都是改了的。在中国，他们是有人所称的“中产阶级”，有事业心，有各种正常的欲望，有共同的担心。他们大都想凭过去的干劲，重振雄风。

易君，22岁，是年轻漂亮的原机关女干部，大学毕业。出国原因也是最简单的。小易过去的男朋友是外交随员，在非洲某国，一去两年。小易的娘家住房狭小，哥嫂侄子一大群，娘家是住不成的，单位集体宿舍另一位女同事的丈夫也是天天来会妻。“实在没辙了，我就出国了，我没花一分钱，是朋友帮我出来的。”如今，她与这位朋友同居了。因为国内普通机关干部如

无一技之长者，出国谋生最难。要不是这位朋友，她靠什么过活，靠谁来保护？她的这个朋友是个实实在在的忠厚人，他一人天天出来摆摊，卖的钱回来全部交给小易。后来匈牙利驱赶华人，他们转去了捷克。

范先生和范太太都是福建某县的乡村中学教师。福建人出国很难，要出国的人也最多。他们到东欧是过路客，真正目的是到意大利、西班牙或其它西欧国家去打工。在国内他们听人说在西方打工也能赚大钱，意大利、西班牙是有可能解决居留身份的西方国家，而且在西方中餐馆很多。范氏夫妇仗身强力壮，幻想有一天也能以爱国华侨的身份重修他们原来的校舍，或许那个学校也能改名为范氏中学。他们有2万人民币存款，又借了10万，跟着成千上万偷渡大军于1990年进入意大利。“实在受不了啦！”范太太满眼是泪水，哭诉在意大利老亲戚的餐馆里受到的苦难。她在意大利怀了孩子，可是老板（她的叔公）还让她干重活，不干的话就意味着没饭吃没地方住，实在不行了，他们来到了匈牙利。孩子没满月，夫妇两个就到自由市场摆摊。中国南方人真是能吃苦，他们在市场极萧条的情况下每月能净挣800美元。可是，匈牙利1992年新年开始，不给中国因私护照延期。他们的孩子虽然出生在布达佩斯，警察就是要赶他们走。“怎么走啊，家里欠了10万，这笔钱是可以偷可以抢的么？”后来当地教会出面解决了他们夫妻3个月延期问题。3个月以后怎么办呢？出路就是回国，10万巨资对有些人不算什么，可是农村中学教书匠两辈子也是还不清的。

纪君，46岁，是东北某地的中医。过去公派到东欧访问过，在医院表演传统和现代相结合的针灸绝技，颇为轰动。在单位有人说她恃才傲物，甚至说她针都扎出了作风问题，她一气之下，抛夫别国，带着孩子到东欧某国办了一个小中医诊所。笔者像病人一样排队，等了两个小时才采访到她。她有了永久居留权，诊所也是合法的，生意非常好。她的理想是开办一个大医院。大概她知道笔者目的，说话时极为小心：“我要把中华医学在国外发扬光大，把毕生精力投入到治病救人的事业中。”无论怎么说，纪君是在东欧能独立成功的不多的中国女性之一。

郝君，21岁，在东欧的形象非常突出。笔者认识他是在一家中餐馆吃饭的时候。他在邻桌，服务员（也是中国人）来结账，郝君不抬头，说：“把你们老板喊来，大爷在国外都快把中国话忘了，你的老板还不知护照是什么色的呢！吃他的，是看得起他。”服务员刚从国内来，不敢惹他，就请当地雇员来说话。外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脾气，过来彬彬有礼地递上帐单。郝君可真威风：“你他妈的讨钱来了！”一个内摆腿，用鞋底掴了外国服务员一个耳光。“中国功夫”用在这上面，厅内的所有中国人又是气又是叹，都来说他的不是。郝君倒是量大，把一张百元的美钞一甩：“没见过钱不是，拿去花吧，下次大爷来，不要说结帐二字。钱，没说的，缺钱用来拿就是！”

第二次见到郝君是在一个朋友家。他的朋友正失恋伤心，他在对朋友说：“你也是一个人？你怕她干嘛？这小妞活不长了，大爷一句话，要她的左腿不会伤他的右腿。在国外打死一只鸽子要犯法，打死一个中国人绝对没事。”这次笔者只知道他今年21岁。

第三次是从一位使馆官员那里得知郝君下落的。原来，他因贩白面被警察抓获，他还在拘留所打电话请求中国使馆出面保护。使馆官员在证据面前能说什么呢？只好任所在国法律来处理了。郝君如今是不愁居留权问题了。永久居留！东欧政权形式是演变了，而专政形式仍然如故，那些因工资低、

物价高、没气出的狱吏狱卒，将用最合适的方式来看管这个仗着功夫横行的中国青年！

李君（29岁）很具有代表性。不少人都和他一样大呼“上当”。朋友给他写信，说每个月至少能赚2000美金，因此他就交给朋友2500美金办出国了。李君出来得较晚，形势变了，钱不好挣了。他如今在一家中国人办的旅馆当服务员，每月工资除去吃住费用，所剩无几。

麦君是由西欧到东欧去的华人青年学生。他大学没毕业就到了西方，起初与同伴们在一起，后来为了个人生存，就到一个亲戚办的餐馆里打工。“哪里是打工？分明是作奴隶！”麦君说他干了十个月没拿到一分工钱，老板亲戚说：“不是我慈善，就决不会让你在我这里吃住。”早上他要为老板一家做好早点，服侍一家人吃喝，从中午11点到晚上8点在餐馆炸肉丸子，滚烫的油常溅得满手起泡，贴上膏药还得接着干，8点回家后还要照看老板的小孩子。麦君如今不想继续读书了，也不信仰什么“主义”了，他也加入了摆摊行列。

倪君今年18岁，别看人小，已经是“老资格”东欧华人了。他是探亲出来的，叔叔是50年代定居东欧的老华侨。由于小倪出来得早，如今腰包也有十来万美金了，汽车、公寓也都买下来了。一次他在给国内机关工作的父亲写信说：“你还吃那个苦干什么，给你3万人民币，花着玩去，3万人民币够你几十年的工资。”问起他当初为什么要出来，他的理由最简单：“不出来没劲。”

有了钱，未必能买到地位。倪君一朝醒来，对知识发生了兴趣，来东欧的中国访问学者大都一肚油墨，两袖清风，倪君花钱请了其中二位来当自己的家庭教师，一位教外语，一位教中文——倪君成了一个花钱到国外学中文的特殊“留学生”。

欧阳君也是以留学名义出来的。18岁还差一个月的1983年某日，欧阳君因犯“流氓罪”被判处5年徒刑。他回忆说：“那一年我在上技校正放假在家，一个街坊跟我妈吵架，我一看就火了，就出来和那丫挺的打一顿。他媳妇过来帮忙，我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其他街坊都过来给劝开没事儿了。没想到那女的哥哥是联防的。过几天就告到派出所了。也没让人说什么就把我抓起来了，正赶上严打，连指定的律师也‘请求’法庭‘严惩’。判了我5年。不服，跑了一次，没跑了，管教的打累了让犯人头儿打，还加了1年。犯人农场什么能人儿都有，我交了几个朋友，学了几招。心说一出来就找仇人算帐。回家以后家里人都死劝我别再找事儿。我那仇人的哥哥又当上了综合治理的头儿。这几年家里挣了点钱儿，就给我买了个留学的单子，死活要我出国留学。虽说不歧视，也是办一路手续洒一路钱。总算出来了，可是没语言在这儿上小学也没人收。我想还是先挣点钱吧，挣了钱买个国外身份，再回国读书。我就想学法律。”

欧阳君从1989年底到1990年底，靠“倒货”挣了十几万美元，有国外永久居留证，还买了房子和汽车。如今，他已到北京自费上大学。不过，他没有学法律专业，而是学外语专业。

第三章 留学生

（一）副博士和方便面

“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激励着中国人“头悬梁，椎刺股”……啃着方便面攻读“洋博士”学位，“革命”的味道尽管浓了一些，难道谁敢说这不是为了今后更好地生活……

刘淑是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以后第一批交换的留学生中的一位。在国内，等候公派出国留学的人员排队排几年已不足为奇。“有关系的人宁愿等下一拨去美国或西方其它国家，也不愿意到东欧。”刘淑说，“最后领导做我的工作，让我提前一年出国，不过是到苏联。我是学化工的，到哪儿都一样，说走就走了。”

刘淑的父母都曾留学苏联，她还是在苏联出生的。但近些年来国内对留学苏联是不屑一顾的。小刘走时只有弟弟一人送行。

留学苏联，第一步要过俄语关。小刘虽然从小跟父母学了一点儿口语，但听说能力远达不到听课的水平，读、译、写还是可以过关的。在离莫斯科400公里的一个城市，小刘正式入学报了到。全班只有她一个外国人。第一次上数学课时，教授（一位老太太）用俄语问她：“你多大年纪了？”她没听懂，想说：“我没听明白你的话”，可说出口却成了：“我不知道。”老师接着问：“你的家庭姓什么？”她又误解对方问她家里有几口人，就回答：“4。”引起哄堂大笑。高傲的教授接着说：“你一不知自己的年龄，二记不住自己的姓，想到我们国家做什么？”小刘满腹的羞辱，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她上课时自己看教材，一堂课下来，她竟读完了半本书。下了课她就去房东家，房东教她口语，纠正她的发音。有些好心的同学帮助她练习听力，经过半年的努力，她看电视、听广播都没有问题了。

期末考试结束了，数学成绩迟迟没有公布。终于有一天，几位老师来到班上，在公布分数之前，在黑板上出了两道难题。老师点名叫刘淑上台公开演算。小刘心说：“有何难哉！”走上台去，不到15分钟就当众解完了题。答案是正确的。这时老师才公布考试结果，全班只有刘淑一人是满分。原来，小刘的答卷引起了老师们的一番争论，他们不大相信这个连日常语言都不懂的东方姑娘会有天才般的数学头脑。

岂止是数字！小刘的三门功课都排在班上前五名，她受到了嘉奖，赢得了尊重。这并非她先天比别人聪明，而是她比别人多了几倍的努力。小刘只用三个学期就学完了硕士学位的全部课程。到接受采访时，她正在写副博士论文。她的桌上除了书、计算机，就是放假时从国内带去的方便面了。

像小刘这样的陈景润式学者并不多见。留学生的生活是很丰富的。

（二）儒生经商有道

中国古代的儒生见到“孔方兄”，都要作掩鼻躲臭状……今天的“秀才”，对于“银锻细软”却犹如“绿林好汉”一样，敢于横刀立马大喝一声：“要从此路过，留下买路钱。”

1990 年以前，中国与苏联东欧各国只是交换公费留学生、互派访问学者。每年能有几百名留学生，访问学者难于统计，期限是半年至一年。互访学者和短期考察、学术交流的人员占多数。从 1990 年起，自费留学生不断上升，远远超过了公费生。

申请出国“留学”的人数中，真正的自费生还是少数。因为东欧及苏联诸国的正规大学只有很少的专业预科班招收自费生。中国青年根本听不懂当地语言的授课，只能进一些语言学校，更多的人是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出国做生意的，否则，就生存不下去。自费生申请报助学金、奖学金的至今未有所闻，这里不是西方国家。

自费生大部分都是以商养学的。即使是公费生，在东欧物价飞涨的条件下，他们也参与了商业活动，以助学业。

刘军在莫斯科某大学已经学习了 3 年，他要等博士论文通过后才结束留学。他爱人和孩子都到了莫斯科，租了一个 3 居室的房子，自己一家住一间，余两间转租给路过或长驻莫斯科的中国人，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绰绰有余。由于吃喝不愁，他们在苏联又生了一个孩子。刘军读书 3 年，学业养家两不误，到 1991 年暑假还带回国内 1 万多美金。

倒车票，倒货，介绍住房，做翻译，是留学生的四大收入来源。

1992 年 1 月 1 日以前，由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价不到 5 个美元，只相当于北京到武汉的硬卧票价。由莫斯科至布达佩斯的车票更是便宜。苏联车票在 2—4 个月内有效，而车票早就被少数“留学生”买空了，他们再以十倍以上的价钱卖给中国人（中国列车票的票价 1000 多人民币），一张车票纯赚 100 美元左右，100 张车票就是 1 万美元。票贩们宁愿票作废也不降价，爱买不买，你在莫斯科多误一夜要误多少事？过往行客一般也不把百十美元放在眼里。这样，在莫斯科没倒过车票的中国留学生常被揶揄为“缺心眼儿”。

当然，贩票者决非全是留学生，留学生的收入也不只是这一个巧宗儿。

小孙是来自中国内地某省的农村学生，北京某高校的高材生。他提前一年毕业分配工作，是研究所里的得志青年。为了小孙上 3 年大学，家里卖了兩间土屋，爷父四老都有病，弟妹排成行，一家债务就指望小孙早毕业来还。连奖金副补一共才 150 元人民币的工资，让一个爱买书的单身小伙子在北京花销，别说还债，不添新债也就万幸了。

1989 年，小孙被选派赴苏攻读研究生。

由北京至乌兰巴托、莫斯科的国际列车是一个国际流动商店。一出二连浩特，不知从哪儿来的国际商贩就挨个车厢地敲门。“皮夹克。有？”“旅游鞋？”这些中国话也是花了一番功夫才学会的。与小孙同包厢的 3 个中国人打开了他们的大小箱包，一下子，车厢成了一个批货站，夹克、鞋、羽绒服、大大泡泡糖、防风打火机、人造珍珠项链……可谓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一个苏联妇女要买内罩，又不会说中国话，一急，竟然把外衣脱了，双手托了托内衣里的乳房。结果没有货。同车厢一位中国女士晾在角落毛巾下面的内罩露出了一角，没有逃过这位苏联女士的眼睛，说什么也要买，结果 200 卢布成交了。200 卢布，那一年值人民币约 50 元以上。

小孙除了两包书，就只有几件换洗的衣服，没有任何货可卖。

但也就是这一次旅行，他学到了什么叫商业。一个学期下来他省吃俭用，把结余下来的助学金卢布拿到大使馆按官价换成美元，回国后又借了几百美元，一个暑假他返回国内两次，来回倒货，4000 美元纯利！大学 3 年的债也

还了，家里还添了两间半砖半土的房子，那些嘲笑他家“读书无用”的邻居也开始鼓励子弟多读书、学好外语。

一个学子改变了乡风。

小孙也参加了倒票列，压在他抽屉里的一大摞国际列车票，使笔者明白了为什么在莫斯科车站买不到票。不过，笔者从小孙处买的票是格外优惠的。

莫斯科市面积比北京大几倍，市内交通以地铁为主，12条地铁四通八达。不懂俄语的初到者有如进了宏伟的地下迷宫，除了感叹苏联雄厚的国力外，就是自责自己耳目不灵。这里的一切标志没有外语，连车站、机场、广播也只有俄语。到苏联来办事的中国官员和商人如果不懂俄语，只有求助于当地的中国留学生了，这也给书生们提供了一些赚钱机会。

如今留学东欧、独联体的中国学生，是相比之下最显阔的留学生。比起那些在西方涮碗端盘子的中国留学生来说，他们在东欧比当地学生要神气得多。

学生的任务是学习，不说报效祖国，也要求生立身。一些留学生为了钱，拼命“宰”自己的同胞，个别的还与当地黑社会联手坑中国旅客的钱。他们天天在车站接人，介绍到旅店再拿回扣；散布谣言说在别处物价更低，说服新来者把货物甩给他们转手；极个别的甚至拉皮条，把不谙世事的中国女子介绍给嫖客，或以介绍住处、介绍自费留学、介绍办当地居留证的名义骗取同胞钱财。如此种种与读书人身份极不相称的勾当，也是不时发生的。当然，干这些事的自称“留学生”的人实际上未必是留学生。

绝大多数留学东欧的中国学生，尤其是公费生，在刻苦学习，且遵纪守法，追求的目标是学有所成。东欧经济虽比不上西方世界，但在科技教育方面却不比西方差多少。在这里攻下副博士一点儿也不比在西方获得博士容易。国内时下对东欧地区有些偏见和误解，但是低估轻视在那里的留学生的学力是错误的。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对留学生说：“你们好像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1992年3月，《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号召留学生们（不管过去政治态度如何）回国效力。国内正值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的大好时机，一些因悲观而计划迟归或不归的，大可不必担心，与其在他国混饭，还不如回来大展宏图。青年代表未来，世界归根结底是属于年轻人的。

再则，当年去苏联东欧留学不归的老华侨也是一面镜子。

第四章 老华侨

（一）洒满辛酸泪的东欧华侨之路

西班牙人哥伦布远渡重洋，历尽千难万险发现了美洲大陆，向全人类展示了雄性的刚强和威武……，黄皮肤的中国人离别黄土地的祖国，却是洒着辛酸耻辱的血泪。

从第二次鸦片战争至 1945 年 100 余年中，俄、苏各期政权使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圈在这样大片领土内没有南逃的中国人就成了俄、苏的臣民。如今，在独联体内部的远东、中亚地区，到处都能看到讲俄语、取俄语名字的华人后裔，但他们与中国已经没有多少联系了。

第二批华侨是一战以后在苏俄的中国劳工。他们第二代一般都是混血儿。到今天，他们的后代只拿祖先的照片来证明他们有中国血统了。

第三批华侨是两次大战期间为“追求革命真理”去苏联的中国国共两党青年。1924 年 5 月，苏联帮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了黄埔军校，次年 9 月又在莫斯科成立了“中国孙逸仙劳动大学”，惯称“中山大学”。第一期推荐选拔去苏留学的有普通学生，也有国民党要人的子弟，如蒋经国（蒋介石之子）、冯洪国（冯玉祥之子）、于秀芝（于右任之女）；叶楠（叶楚伦之子）；邵志刚（邵力子之子）等。共产党青年有董亦湘、俞秀松、邓小平、傅钟、张闻天、陈绍禹、乌兰夫、伍修权、孙冶方等等。到 1927 年 7 月国民党取缔中山大学时，有不少国民党青年反戈一击，宣布与国民党断绝关系并留在了苏联，最著名的有蒋经国。中山大学到后来就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劳动大学”，苏联也就成了中国共产党的大后方。这些中共党员，有受党内的斗争影响而不得不在苏联的，有受苏联残酷清洗而下放到工厂劳动的，也有养病一去不回的。如今他们几乎都去世了（有死在疯人院的，有被肃反人员镇压的，有死于苏联卫国战争战场的，有久病而死的）。他们的后代就留在了苏联，入了苏籍，只讲俄语。如王丹芒、王丹丁兄弟（王明之子），他们分别是计算机和东方文学的专家。

仍讲华语、与中国有联系的是 1949 年以后去苏联东欧的华人。

50 年代，中国派出了大批留学生到东欧学习，尤其去苏联的人数众多。这些人大部分学成回国，如今大都是中国各方面的中坚人物。这其中有总书记、总理、副总理、部长、局长，也有教授、专家、工程师。也有很少一部分留学生留在了苏联东欧。

起初，各使馆留学生处对留学生的婚恋问题有干涉权，后来留学生们反对，所在国提意见，所以就开了禁，跨国婚姻问题由此产生。整个 50 年代因留学生来苏与苏联人通婚、定居苏联的中国人约有 150 人左右，在东欧其它国家约有 100 人左右。这些人大都入了当地的国籍，他们去东欧生活已经几十年了，是当地“通”。

50 年代初，部分苏联红军驻在东北某些港口，红军官兵中有娶中国女子者。红军撤回国内后，这些中国妻子也就去了苏联，如今她们也都是老太婆了。

60 年代初，中国新疆有数万人越境入苏，他们如今分散在靠近新疆的独联体各共和国，大部分住在集体农庄。

（二）田丹娘的故事

美洲的老华侨多是被当成“猪仔”买去修铁路的，扁担横放在地下他们都不知读作“一”……而东欧的老华侨却多是顶过硕士、学士帽的学问人。没有人再称他（她）们为“猪仔”，而他们的心路至死都会烙满“猪仔”的烙印……

田女士，62岁，俄文名字叫达尼娅，中国人喜欢称丹娘，是退休的俄罗斯某大学的教师。50年代初留苏学生，等学士、硕士、副博士、到博士论文都通过时，她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热爱她的伊凡一直等了她5年。57年初田回国。留学生说话开放惯了，难免刺耳，恰逢反右整风，田女士成了整风“对象”。正在她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伊凡作为援华专家来到了中国。一个女右派博士，中国人几个敢娶？小田与伊凡在中苏友好俱乐部举办了婚礼，在外交方面努力下，伊凡偕妻回到了苏联。田女士避开了反右、四清、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风暴。

在苏联，田女士在专业上一直不断进取，很快由副教授提升为研究员。中苏两国高层论战，两下成为仇国，田女士写给父母的信被原封不动退了回来，上面写明“收信人拒收”。谁还敢收来自“苏修社会帝国主义”的信？田女士在苏联也是行动无时不处在KGB的严密控制之下。谁都有可能成为“中国间谍”，何况是中国精心选派的这么聪明能干的留学生！

田女士如今是独身生活，她的伊凡20年前死于一次科学实验事故，她现在在只靠500卢布养老金过日子。在俄罗斯，500卢布只能买自由市场上的3公斤牛肉。问起田女士为什么不回中国去看看，或定居，她说：

“去年回去了一次，几十年的积蓄几乎花光了。唉，难啊，比不得有钱的西方华侨，我们这样到中国，像叫花子一样。亲戚家，久住难为人。人又老了，谁会用咱？”

问起将来怎么办？田女士苦笑一下：

“那还不容易，等死呗！”

（三）当年叛逃者的后代，还记得毛泽东

新疆集体叛逃事件，如今上点年纪的中国人还记忆犹新，他们在俄罗斯关心着中国的一切。如今，他们可以返回中国做生意，评说在中国见到的“毛泽东热”……

维佳原姓刘，是60年代初由塔城到苏联中亚地区的中国人。去的那一年，他才10岁，他父亲是汉人，母亲是维吾尔族人，现在他们都是中亚某国的公民。维佳读完高中后，在集体农庄当司机，娶的也是一个当地华人。一家老少三代10口人生活在一个农庄，有自己的院子、农具、汽车、牛羊和房子，在外面讲俄语，回到家里讲汉语。整个农庄有80%是从新疆过去的。

如今，维佳一家都活跃在中苏边境上，成为边贸大军中的一支家族支队。

中国北方边贸的历史有2000年以上。中俄边贸“互市”的历史也有几百年了。爱好文学的人不会忘记《红楼梦》中勇晴雯抱病补裘的故事，曹公说

那件裘皮大衣就是俄罗斯的。

古代的“互市”，今天叫“易货”，国家间易货，民间也易货。宝玉时代的俄罗斯裘皮大衣今天仍受中国人的喜爱。维佳作为活跃在边贸的个体商人，最早的商品，就是中亚裘皮衣（当然不是用孔雀毛织的）。裘皮换来的是中国的旅游鞋、牛仔服，卖成卢布后再买苏联呢子大衣、西服、戒指、幻灯机、照相机、手表、电动剃须刀、地毯、望远镜、手风琴、钢琴、帽子，用汽车拉到边境一倒，又带回满车丝绸、皮夹克、打火机、运动服。一月两个来回，10万卢布利润没问题。维佳原来的月工资是300卢布。维佳能讲流利的俄语和汉语，也懂一些中亚、新疆少数民族的语言，他一家是靠边贸致富的原苏联公民之一。他、他的父辈，最不理解中国又一阵“毛泽东热”。维佳说：“要是毛泽东在世，中国可能更富？”与大部分胆小怕事的苏联公民不同，维佳大胆地说戈尔巴乔夫不好，中国的邓小平“哈罗削”（好）。

（四）赵氏姐弟

世界上最看重姓氏的应是大不列颠国那帮封过爵位的人……地球上以姓氏为凝聚力的当属黄皮肤的华人……为了一眼很少出水的“老井”，两姓家族可以刀来剑往地械斗数百年；在国外对付“洋人”，华人的绝门神功就是“家族”联合作战。“夫妻店”、“姐弟公司”等等要比“独行大侠”更容易立足江湖。

赵玉芳女士是匈牙利资格最老的华侨了。她的前先生是匈牙利前驻华外交官。这位强干的才女现在是赵氏中餐馆集团的首领，也是首先发起匈牙利中华商会的实业家之一，同时也是深通匈牙利政策的专家。她靠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干出了一番个人事业，同时，她还义务为匈中两国官方、民间交流提供咨询服务和有效建议，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民间“外交官”。

赵女士之弟赵玉伦先生也是大器晚成的实业家。赵先生在国内就是一个有胆有识、办事果敢的多用人才，工作30年，虽官至副处，却总有过剩之精力。探亲来匈不到两年，就一连创办了三家中餐馆。这位文人出身的老板把餐馆装饰成了小型中国艺术博物馆，经营之余，他还积极参与“中华商会”的筹备组织工作，并无偿帮助一些华人的求职创业，深受华人赞誉。

老华侨，尤其是没有忘记中国话的华侨，对当地政治、经济、传统有很深的了解，并且有各自的专业优势。现在中国官方、民间都在开拓东欧及独联体市场，这些老华侨是随时可以起用的人才。

不要以为他们没有北美、东南亚华侨巨贾那么富有就给他们白眼，关键时刻，他们几句话可能使中国公司避免百万损失。比起某些素质低下的新去东欧、独联体的华人，他们更诚实、也更有修养。由于东欧巨变、苏联解体，西方国家乘机到这一地区挖人才，如科学家、专家、教练，中国有同样的机会，不可不察。当年赫鲁晓夫一声令下撤走了的专家，正是可以花些钱请到中国来的无价之宝。尤其是流失出去的华人专家，再让他们流到西方，实在可惜。目前东欧独联体的改革，把知识分子改得越来越穷，他们正想到国外谋生。

第五章 东欧人摄像机中的华人

(一) 中国国粹=菜肴+功夫

在大批华人涌入东欧前，东欧人提起中国恐怕不会忘记菜肴和功夫。那时，可能只有外交官才有幸品尝过中国菜肴，他们蓝眼睛同胞只能有聆听垂涎的份儿。而东欧的男孩和女孩；却人人都会在大街小巷之中比画几下“成龙式”的中国功夫。随着黄色面孔越来越被东欧人读熟，中国菜肴闯入东欧的“寻常百姓家”。东欧人对中国功夫的领教也就越来越深刻。它既包括“嘿嘿”地拳打脚踢，同时也包括用金属片代替硬币打国际专拨电话……

首先是所在国对突如其来的这么多中国人表示惊奇，最初的报道是客观的反映情况，不加评说。匈牙利通讯社记者在采访了几个中国人出国、谋生、办居留的情由后，在《人民自由报》上写了一篇报道，末尾一句话是：“也许布达佩斯还会出现中国区？”

中国人的到来，使所在国的旅游、服务业收入大增。无论在华沙还是在布达佩斯，抑或布拉格、布加勒斯特，邮局、翻译局、公证处、电话局、律师事务所的重要顾客是中国人。中国人带来了中国货，中国产品已深入到城乡的家家户户，这对市场萧条、物质匮乏的东欧各国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中国人也带来了投资，弥补了东欧产业结构的某些不足。

西方记者是无意中发现东欧街头、市场上有那么多中国人的，最初他们的报道是有政治色彩的；因为“新东欧”已加入了“自由世界”的行列，中国人又大都是“六·四”以后出来的。有文章说：“大量中国公民为逃避政治迫害而逃到东欧。”这种联想起初使读者深信不疑。但到后来，当人们看到不少中国人完全能自由地出入中国倒货时，另一种偏见又产生了。某国一家英文报纸说这是中国政府有意鼓励他们倾销中国积压的滞销货。渐渐地，摆摊的中国人照片登载在报刊上，图片说明是中国人不顾禁令在“非市场区”走私经商。

中国人不懂当地语言，法令在眼前也认不得，谁又能把散居的中国人组织起来传达“上级指示”呢？

时间长了，对华人的报道也就越来越多了。好人好事见的不多，冲突、矛盾、丑事都描写得很细致。

外国人移民，需要当地房东作担保。这样，担保书就成了一张有价证券。一个中国小伙子花了1500美元从当地一个老头那里买到了担保书，而他本人并不住在老头那里。这件事被登上了报，移民局就下决心调查每份担保书的真实性。

接着，就有专门记者对中国人跟踪采访。假公证、假结婚的接二连三地披露了出来，中国人的信誉大大降低了。

一家声称以“人道主义”为宗旨的报纸登载了一位孤寡老人的控诉信，内容是：“我是一个无子女无老伙伴的老太婆，除了有限的救济金，没有别的收入。我把外间一个大房租给几个中国人住，还没到一个月，他们就搬家了。他们走后几天，电话局就给我送来了7万福林（约合9000美元）的电话费单子。我不知道他们的中文名字，也不知他们搬到了哪里或是回了国，这笔钱我卖掉房子也还不清，何况房子又是公产，我该怎么办？”

据说，这样的缺德事还不少。在匈牙利给国内打电话，比在国内通话还方便，不少中国人给国内打电话，一次就要打几十分钟，就像打市内电话一样。给帐时傻眼了，有人就想起了一个个偷打电话的绝招。

打黑电话是聪明的中国人的一大发明。匈牙利街头有公用电话，有一些市内投币电话有时会出错，与国际线通。一人发现，百人日夜排队，每位一讲就是几十分钟，半小时下来的说“不过瘾”。有些正常的国际投币电话机有时接通后，投入金属片也可变成免费电话。有懂行的人干脆在夜静时用技术方法拆开公用电话机，使之变成黑电话。有人说这是对当地政策的一种“报复”。

打黑电话的人有得意者把这一秘密传授给匈牙利朋友。匈牙利人的“海外关系”多得很（仅1956年跑到西方的就有几十万），他们也跟着打黑电话。知道的人多了，终于把真相登上了报纸。

（二）国内报刊替东欧淘金热“火上浇油”

国人喜欢死命拥挤地抢购“出口转内销”的商品。任何一件不好出手的压仓货，只要挂上“出口转内销”的招牌，就会异常的走俏。国内的传播媒介不知何时也传染上了如此“怪病”，当东欧淘金热在大陆升温时，传播媒介“怪病”的发作更加令人难以琢磨……

最初关于东欧华人的国内报道主要集中在“国际倒爷”如何致富，中国商品如何在苏联东欧获得暴利，有多少人成了暴发户等等。这些报道对“苏东波”具有推波助澜之功效。1989年至1991年，是中国改革以来的经济治理整顿阶段，国内产品滞销，有工厂发不出全部工资，尤其是个体户叫苦不迭。有的误解政府要走回头路，重新“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这些报道的副作用就是让成千上万的人递交了护照申请表。报道这些内容的多为晚报和周末版，文摘报又转来转去。这些报纸读者面广，神州大地上随即卷起了东欧淘金热。这就是“新闻导向”效应。尽管这些报道并不是正面报道，并且称国际商贩为“倒爷”，但有心人从中得到了商品行情，“一条价值几元人民币的珍珠项链到匈牙利能卖十几个美元”，敏感的国内个体户跃跃欲试。

新闻报道是有时效的，过了时限，形势就变了。以项链为例，当时新闻报道说能翻十几倍商利，也的确是如此；可是中国人1人带1000条，1000人要带100万条。这可以让匈牙利全国每个适龄女士都带两条中国项链。就在国内关于项链的短篇报道发表后一个月，匈牙利自由市场的中国项链只能保本卖了。

我国关于东欧问题的专业研究单位有不少，但其研究成果对公民到这些地区的具体指导意见不大。因为大量文章都是根据形势从政治高度揭露西方反共势力在这些地区搞的和平演变活动，披露由于演变后东欧人民所遭受的巨大的经济困难，而由东欧回来的中国人说法不太一样，这样，好奇者越发想去看看个究竟。这叫新闻的“逆反应”。

最先全面客观反映华人在东欧状况的是港、台报刊。他们在华人中作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和采访，对华人公司、餐馆、小商贩作了详尽报道。在东欧的中国大陆人中间，港台报刊有很大的市场。

不知什么原因，中国驻东欧的记者发回来的关于华人的报道，大都登在

只有极少数人才能读到的内参资料上。直到 1992 年 1 月 3 日，新华社驻布达佩斯记者，发回国内的关于匈牙利政府对在匈华人采取重大行动的较长报道，见报时也只有第一句话。而在这几天前（12 月 28 日），有一篇关于东欧华人情况的文章也是发表在很多人不易见到的《参考消息》上。不过这篇报道关于中国人出国都是国内的违法者的说法，引起了东欧华人的不满。还有一处关于一个中国人的半边头被砍下来，放在中国驻匈大使馆附近的消息，被证明“并无此事”，使馆人员对此也感到恼火。

关于东欧一些国家限制、驱赶、囚禁华人的行动，以及华人连连被惨杀的事件，在国内从未公开报道。大批华人继续涌入东欧。

随着时间的推移，东欧列国对华人的报道和关于对外国人居留政策的报道越来越多，而绝大多数中国人不认识当地文字，说了等于没说。

国内一些杂志和文摘报上，也有不少关于东欧尤其是匈牙利华人的报道。读完后不难发现，这些猎奇性文章采访的大多是回国华人，而出自实地考察的不多；正面写留学生和创业者的不多，挖苦讽刺“倒爷”的不少；用权威数据的不多，道听途说的不少。其内容主要有三：一是“倒爷”如何“倒”，二是华人在红灯区如何作声色之事，三是华人如何赌。

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干这些事的大有人在，不倒货，怎么活？关于赌，也是事实。那么关于“红灯区”呢？

“红灯区”就是色情场所，是娼妓、性品商店、性影视较集中的地方。色情场所在国外是私生活的一部分，是采访“禁区”。中国人出国，一般要等半年，甚至一年两年以上才能取得外国人身份（否则不能往返自由），才能赚得一点钱回国光耀一番。长期独居国外的青壮年男女并非无性人，性压抑使一些人心理变态。但大部分人是出于好奇，看看“红灯区”外观究竟是怎么个面目，真要问津“红灯区”（中国人称此举为“打鸡”）的人恐怕还是少数，听说有某君不得不回中国治性病。然此类事是难采访的。据回国人员卫生检疫单位工作人员讲，从东欧回国的人，只有极个别的人患有性病，而申请出国的体检人员中，患性病的数字要多一点。当然，有性病的人是不能出国的。

（三）东欧第一份华语报纸

海外早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至理名言：“自杀的最好方式，就是办报刊杂志。”东欧的第一家华人报纸，却义无反顾地面世了。这家报纸的老板——一位文气十足的中国人民大学的青年学者，常常感叹：华人在东欧实在不容易！又推推眼镜说：“华人要联合。”

1991 年 8 月 15 日，第一张汉语报纸《旅欧导报》（匈牙利版）正式刊印，并在华人中试发行。这张没有当地合法登记出版号的报纸是为华人办的一件大好事。报纸每份 50 福林，销路不错。内容最有价值的是匈国政策介绍以及商务、地理信息，这对不懂匈语的华人来说，无疑是及时之雨。在匈华人绝大多数连英语都不懂，匈语就更不用提了，办事、问路，几乎是睁眼瞎。听到的只是传来传去的水分越来越多的消息，控制信息的便大牟其利。《导报》问世以来，深受读者欢迎。

问题是，《导报》尚未在当地取得合法发行权，而且是在国内排版，出

版周期太长。这份不定期的小报显然没有得到大财团的资助。初期创业阶段，华人都很艰难。

创办这家华语报纸的是原中国人民大学青年学者、旅匈华人事务所老板 C 先生。C 先生，经济学硕士，精通英语、匈语，是极少数能联系匈社会上层的大陆华人之一。他的事务所是目前能准确提供匈牙利社会政策咨询的华人信息中心之一，对华人的总体情况了解得比较全面。问 C 先生华人在匈混得怎么样，这位文气十足的老板说：“不容易。”

第六章 创业的足迹——“百万阿昌”罗曼史

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中国农民好汉，战争却折断了他那雄性之舟上的桅杆。他被城里人打个半死，他被邻居讥为“当代太监”。命运如此多舛，人生偏多传奇。他只身闯入了东欧。他领略了商场与战场的区别，他经营成功了自己的事业，也经营成功了自己的爱情。大把的西方硬通货，使他有资格享受西方一流的高技术医疗文明。他终于又扬起他那雄性之舟的征帆……他仍旧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儿。

在东欧“淘金”的数万华人中，有人成功也有人失败，有人成功后又失败了，也有人失败后又成功了。这本是商场中正常的现象。不过，下文故事的主人公阿昌却近似传奇人物。他有奇特的出国背景、辛酸的创业过程、始料不及的成就和失算。

10余年前，阿昌也“出过国”，没用护照，十几天就回来了。

阿昌姓覃，广西人，34岁，当过侦察兵。那年打仗出了国，全班一半人死于一枚重炮之下。阿昌死里逃生，可是万恶的弹片却残酷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那一年，阿昌妻，年方20岁的农家女，在仗打完半年后，才盼到阿昌复员回乡。

回家头几天，阿昌走亲串友，早出晚归，回家就叫累，纳头便睡。妻子沉浸在夫妻团圆的幸福里，也不多打扰他。到了第5天，阿昌不得不忍痛忍耻对妻子说了真情——他已失去性能力。他诚恳地提出分手，要妻早日改嫁以免误了青春。善良纯朴的妻子如遭电击雷劈，未语泪落。月光下，夫妻对窗静坐了整整一夜，及日出，妻终于开了口：“昌哥，没有它，我还是你的人，我守你一辈子，我不要那个，没关系。”说完紧紧地抱住阿昌，眼泪禁不住又涌了出来。

阿昌觉得现在多劝也没用，不如缓几天。

一天早上，妻子醒来，丈夫不见了，在他睡的地方放着一封信，上面写道：

“阿瑶妹，我们当初结婚时没有正式到乡政府登记，所以，也不用办离婚手续，这是乡妇联主任说的。你正年轻，千万不要为了我这个废人误了你一生。我的抚恤金全部留给了你，就当送给我妹妹办嫁妆的钱吧。我永远感激你替我照顾我母亲多年，她老人家在地下也感激你。我此去永远不会回来了，我要到外地找工作。不用担心我。出医院时我想到死，但为了你，我没有这样做，你不要辜负了我的心。责任田交给叔公管，还有房子……”

她读不下去了，她知道阿昌是再也不会回来的。半年后，娘家接她回去，她自办了一个养兔场，成了致富模范，招了一名伙计做上门女婿。此是后话。

阿昌呢？

这条硬汉子本来可以回乡干一番事业，但为了阿瑶，他闯到了长江边的一个大城市。原想投靠这个城市的两个战友，后又不想寄人篱下，靠卖力气在建筑工地干了一年临时工。

人真有不走运的时候。一天，下工的阿昌想洗洗满身的泥浆，可是几百

个民工共用的两个水龙头还坏了一个。阿昌走进工棚附近一幢居民楼，两个厕所没有标牌，阿昌见一个烫长发花衣的背影进了一间，他就自信地走进另一间，刚推开门，里面就一声女人尖叫：“干什么？抓流氓！”一层楼的居民，还有刚才进入另一个厕所的人——正面看是个男的，也冲了出来，不由分辩，一通乱打。阿昌哪敢还手？先是躲开棍棒扫把，后见一个后生拿起铁锹要砸，就闪身夺了过来。市民们一看阿昌手中得了兵器，都愣住了，腿快的赶紧去打电话，派出所马上就来了三个警察。不由分说，把阿昌铐上就带走了。市民们说这下可除了一害。

审讯室。

问：“姓什么、叫什么？职业？抬起头来！”

答：“姓覃，叫阿昌，民工。”

“阿昌？副班长？你看我是谁？”

“陈军，老战友，老战友，我是无辜的呀！厕所没有牌子，进那一间的又像一个女的，我就进了这一间，怎么我……你还不知道我，想要流氓？怎么耍哟！”阿昌苦笑着，所长陈军紧紧地抱住了老战友。

接着是开手铐、上烟、敬茶、保释、洗澡，阿昌成了陈军家最受欢迎的客人——当年一次作战演习，阿昌为救毛手毛脚的城市兵陈军，自己险些丢了命。阿昌这时才了解到陈军的父亲原是位大首长，现在离休了，陈军的哥哥陈民是应华集团公司总裁。当夜，阿昌在客房休息，那边一大家子在商量如何帮助阿昌。

凭着一身的武艺和对陈家有恩，阿昌到陈民的应华公司当了保卫人员，住在陈民家，每日几乎寸步不离总裁。陈民有了这样一个得力的保镖，在混乱的商场更加大胆放心。有一笔款子拖了很久不回来，阿昌一人出马，见面问好握住手就捏紧不放下，硬是让对方的左手打开保险箱，取出钱，在收条上签了字才松手。阿昌深得陈民的信任，生意上的事有时同阿昌商量商量。

不知道陈民多情，还是他妻子好妒，这两个事业型的人竟没有雇一个家庭保姆。过去也曾有过两个保姆，先一位是乡下来的，被陈妻赶走了；后一个是附近大学的女生，每天课外来家干两个小时家务。陈妻没过多久又赶走了。阿昌来后，上班随陈总出门，下班一道回来，做饭洗碗的事由阿昌包了。闲来无事，陈民的孩子和阿昌一起玩一起看书，玩熟了，晚上就要阿昌拍她睡。陈民每月给阿昌开500元工资。时间一晃几年过去了。

这年春夏之交，北京政治风波波及到长江，陈民是有心还是无意卷进去的，阿昌也说不准。陈民出事走了，听说是出国再也不回来了。

阿昌照常到总经理室上班。新总裁起用了一批新保卫人员，阿昌虽未被解职，可是没什么事可干，下班仍回到陈民家干家务，安慰陈妻，照顾陈女。时间一长，邻居们背后就说长道短，知情人为他辟谣，说出了阿昌的隐私。这一来，街坊四邻单位又给阿昌起了个外号：“当代太监”。一天晚上，陈女问：“阿昌叔叔，什么叫太监？”

阿昌又来找战友陈军。陈军关系多，办法也多，说：“我有一个朋友去年到波兰探亲，现在不回来了，说那边生意好做，最近给我写信要我在国内给他办公证。我看你也出去看看，国外医疗条件好，说不定还能治好你的病呢！”阿昌说：“我又不会别的外语，当年学的越南语又没用，出去能做什么？”“这么多人出国都能活，论能力你未必比他们差，机会难得，你就去吧，我也赞助你一部分本钱。”陈军鼓励他。

1989年12月，阿昌办下了护照，带着这些年积攒下的2万多人民币，先到了北京。陈军的朋友告诉他，北京南边有个地方叫白沟，这里的东西非常便宜，诸如打火机、项链、皮夹克等等，这些东西到东欧可翻出十多倍价来。阿昌在去东欧的前一天去了白沟，把采购的货物打了15个包，雇了一辆车直接运到了北京火车站国际列车候车室。没有雇任何人，阿昌几个来回就把货扛上了火车。这是阿昌跨国跑单帮的开始。

第一趟，除掉成本和办国外身份的费用，阿昌净赚1万美元——6万人民币。第二趟，阿昌没有到波兰，而是到了匈牙利，这次带出去的货更对路子，净赚4万美元，阿昌花1000美元申请办了一个覃氏公司，还雇了一个帮手，花3000美元买了一辆旧奔驰车，又花了1000多美元办了个永久居留证。阿昌是最早在东欧站稳脚跟的中国人之一。

有人说阿昌很神。与阿昌同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会迷路，他有先天的强记本领和观察能力，商店名字、商品名称，他读不懂，但一写一个准。

布达佩斯有一个著名的大自由市场，中国人称为“红七市场”（因在红7路公共汽车站终点站，故名）。这里是国际商贩云集的地方，苏联人卖的是玩具、工具和食品，中国人卖的是日用百货，波兰人卖旧衣服，罗马尼亚人卖台布，这里还有不少越南人，他们专卖烟酒和手表，利润最大。没有人知道越南人的进货渠道，中国人很是羡慕，但又没办法接近越南人。这么多民族的生意人只有中国人最苦，中国人的货都是从中国长途背到匈牙利的。

阿昌又一次遇到了越南人。当初他突击学过越南话，不想今日在东欧用得上。几次接触后，阿昌与越南商贩交上了朋友。通过越南人，阿昌了解到两条水货渠道。匈牙利——奥地利边境有手表批发点，匈苏边境有烟酒批发通道。阿昌带着一个帮手各开一辆车先到奥匈边境，当天就把整车手表运回来，两个晚上就批发完了，一下赚了数万美元。根本不用到自由市场风吹雨打日头晒，也不用在火车上颠簸十天半月回中国倒货。做这样的生意，当时没有什么风险，也不用纳税。到1990年年底，阿昌的资产就达到80万美元。

1991年初春，阿昌开车送陈民的妻子去奥地利。在维也纳，他听说西方一些医院可以移植人体器官。在陈民夫妻的鼓励下，阿昌来到了德国。一家私营医院的大夫对阿昌说，移植男性生殖器官的成功率只有40%，而改女性的成功率要大得多。他要阿昌想好是移植男器官，还是女器官。阿昌坚定地要求恢复男性，万一失败再改女性。

手术费花了4万多马克，一位因车祸刚刚去世的小伙子的血型与阿昌相同，小伙子的器官移到了覃阿昌身上，一个月后，伤口完全愈合，阿昌出院了。医生问他有无不适感，阿昌红着脸说：“解小手还正常。”医生劝他留在德国，以便观察，可是阿昌仍关心他的生意。他又杀回商场。

回到匈牙利后，这里的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水货生意不好做了。一次到边境批货，上了对方大当，货没拿到手，8万美元的货款追不回来了。阿昌的助手又卷了几万美元逃得不知去向。“这是我出国以来接连两次摔跟头。”阿昌回忆说，“我感到自己的事业不应当总是跑跑单帮，倒买倒卖。但干别的，我还没有基础，首先是语言不行，所以我雇了一个能干的翻译。”

阿昌的翻译章晶是学音乐的学生，来自北京。一次自费到西欧某国参加小提琴比赛，回国路过匈牙利时见有很多中国公司招聘德语翻译兼公关小姐，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覃老板拨了个电话。阿昌与章晶见了面，彼此印象都不错，双方达成了协议：覃氏公司每月付给章晶工资500美元，外加食

宿补贴，合同期为3年。公司在布达山上租了一幢小楼，一层二间作办公室，二层为宿舍，地下室和院子作仓库。依照章晶的建议，公司添置了一套办公设备，传真机、复印机、电脑、多种文字处理机。一周之内，公司加入了两个行业商会；匈牙利国家商会和布达佩斯国际贸易俱乐部。章晶奉命起草了两百份建立业务联系的公函，阿昌签了字，按公司名录分别寄出。不到1月，公司就收到了十几份询价单。国内应华公司正式让覃氏公司作为欧洲业务代理公司，并空邮了一大批中国货样品。覃氏公司门口搭起了样品棚。

一时间，章晶成了公司主角，她要接待上门谈判者，又要处理文件信函，还要给覃老板翻译德语报纸上公布的政策法规信息。覃阿昌呢，在家给章晶做饭，出门为她开车，不知情者还真分不出他俩谁是老板，谁是雇员。

匈牙利从奥匈帝国时代起，就受德语影响，两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都是德国一方，至今大多数匈牙利人能讲德语，在校学生第一外语便是德语。章晶的母亲是德语老师，她没料到从小教章晶的德语到今日真派上了大用场。

在匈牙利，操德语的商人占了外商的一半。每到旅游季节，大批德商来匈牙利，边休养游玩边谈生意。覃氏公司唯一的翻译又只讲德语，所以，“工作重点”就是做转口德国的贸易。几次接触后，阿昌感觉到德国人比较守信用，态度严肃，办事认真。

仅他们俩是不够的。公司聘请了一名当地律师兼职常年法律顾问，还聘了一名当地退休的会计师专门同税务局等部门打交道，两人也都会讲德语，月工资都是150美元，这在当地是相当高的收入了。何况，律师每周只到公司上一天班，会计师每周到公司来半天（做完对付税务局的帐目便走）。公司内部账目由阿昌本人做，这些都是当年在应华公司时跟陈民学的。如今，他还教章晶如何谈生意，如何做好两本账，闲暇时，章晶还教阿昌讲德语。阿昌见了德国商人，偶尔也卖弄几句“古腾塔克”（你好）什么的。时间久了，章晶吃惊地发现，阿昌有时能补充她翻译和个别遗漏词汇。阿昌每晚死记商业词汇，读不准他也不在乎，可那敏感的耳朵听得是很清的。

1991年6月20日，德商送来传真订单，需要20万件男女各式丝绸衬衫，除规格、质量不低于样品等要求外，限一个月内交货，合同5日内在佩斯国际贸易中心签订。交货地点定在匈牙利，价格方式：FOB。

这5天犹如打仗。

应华发回传真。国内应华一个子公司现有价值2亿人民币的丝绸织品积压，在国内以不到成本价1/3的价格都批不出去。要抓住机会，打开外销渠道，CIF价，开信用证或打预付金由覃公司全权定舵，佣金可超过C5，必要时可以空运。应华公司总裁甚至在电话中告诉阿昌，万一没把握可以缓期付款。机会来了，是做直接贸易还是只提佣金？阿昌和章晶意见有分歧。章晶觉得提佣金稳一点，不用担心交货时间，也可避免损失。而阿昌说既然国内有存货，完全可以让国内提前空运到位，留下时间差。章晶被他说服了，嘴上却说：“还是老板说了算。”

两份合同都签了字。

与德商的合同定交货期为30天，与应华的合同交货期为20天。德商打信用证给覃氏公司，覃氏先付5%预定金给应华，货款在售后一个月内付清。应华的CTF仅略超过国内零售价格给覃氏公司，覃氏公司卖价高出2倍。应华公司并不亏，那批积货拖了整个集团的后腿，这笔生意可以带来新的转机。

第一批货12天后就空运，剩下的一周后全部到位。17个日日夜夜，阿

昌守在公司接国内发货消息；章晶跑海关疏通关系，与德商不断联系。两人都消瘦下来。商场如战场，这又是头一炮，万一失败，一赔精光，信誉扫地，难有再兴之日。

货到了，事还没完，验货、交货、交税、结算，到8月20日才理清全部帐目。这一日是匈牙利国庆日，多瑙河边升起团团烟火，对坐在屋顶上举杯欢庆的覃阿昌和章晶来说，这五彩缤纷的礼花像是专为他们开放似的。

“阿昌，当初要是听我的，你就赚不了这么多了。”

“要不是你，我哪能有今天！”阿昌说。

“没有我，你还可以找一个更好的搭档。是不是？”章晶调皮地问。

阿昌笑着说：“这是命，该到一起的。”

章晶把脸一扭，说：“得了吧，这里中国人都说我与覃大款‘膀了肩’。那次我还真傻，对他们说我们是各睡一层的。他们说我是欲盖弥彰。谁都不信我是枉担了一场虚名。”

阿昌说：“嘴巴长在人身上，由他说去好了。”

没想到这句话惹恼了章晶，她哭了，抽泣道：“原来你想要我虚名担到底！”一句话像电击了阿昌的某道脉络，也不知是哪来的勇气，或许是酒力，或许是本性的恢复，使阿昌一把抱起了章晶。章晶温顺地躺在他怀里，眼也不睁开，脸还是佯绷着，嗔道：“我还以为你这人真有什么毛病呢！你这个没……”话没说完，就被阿昌那张大嘴给堵回去了。

自此，两人配合更加默契。其他华人公司纷纷下旗回国，在匈华人为摆摊、居留大发其愁，覃氏公司一花独秀，静悄悄大发其财。

应华公司对阿昌很满意，第一笔生意成功后，又空邮了一批绢花、玩具、服装、童车样品。有应华做后盾，阿昌更加大胆往前走。

覃氏公司在德商、奥商中有了很高的知名度。一半是公司信誉，一半归功于漂亮多才的章小姐。章小姐每到一地，总是商人目光的焦点。每次外出，她都带回几张几十张名片。

布达佩斯西南有一个巴拉顿湖，这是欧洲最大的洪水湖。每年夏季，客商云集，一笔笔生意就在这水泊周围的歌厅酒吧里，有时就在沙滩晒太阳时达成交易。有一些中国小商贩就开车到这个旅游区摆摊。阿昌头一年也来这里“练”过几回，这次来的目的就不同了，他要与几家进出口商洽谈圣诞礼品的一揽子买卖。

中国产品为何不易直接进入西欧？这里有一个缘故。西欧国家鉴于中国实行高关税政策，对中国产品也高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覃氏公司是匈牙利的公司，而西方国家对匈牙利有诸多优惠的贸易政策。在奥匈边界，对运输车的检查很松，集装箱车队过往频繁。西方商人在匈牙利提货极方便。覃氏公司与西欧商人谈判一律用FOB价，在匈交货，余事不负责任。

西方圣诞节犹中国之春节。商业旺季就在节前一个月。通常11月底以前，进出口商必须把货物批发给零售商。覃氏公司收到的订单都要求11月20日前交货。

这批货有一半不是国内积压的产品，要重新组织生产。除圣诞礼品、儿童保健用品外，还有一批内衣、皮革制品和文具。一部分空运，一部分陆运，总价值人民币3000余万元，预计税后利润可达40万。应华公司表示通力协作，覃氏公司坐等货到。

第一批陆运皮革制品按期到达，货损2/3，货柜沿途被撬开。苏联铁路

边上的飞贼还算手下留情，没有偷光。保险官司打了几个月，仍无结果，此是后话。为了不失信于外，阿昌要应华公司按数再空运一批。

第二批陆运玩具同样遭到厄运。沿途货柜不知翻了多少跟头，损坏严重。

空运货柜提前到港，但有 12 个货柜被海关扣留，说是违犯进出口规定，未申请进口配额。阿昌急了，章晶也没法了。关键时刻那位当地会计师发挥了作用，她的一位同学在海关工作，通过这位同学将一位海关负责人请到了盖莱特大饭店。

匈牙利海关扣留过不少华人公司的货物，货主们叫苦不迭。8 月份，一位姓曹的华人为此自杀身亡，这使覃阿昌和其他一些华商不寒而栗。

这位海关官员脱了制服穿上绅士装，自己开车来到盖莱特大饭店。章晶在门厅迎候，会计师上前介绍，官员走过来握住了章晶的手，又托起来轻轻一吻，目光一直没有离开章晶的脸。“哦，赛卜，那炯赛卜！”（啊，漂亮，太漂亮了！）章晶被盯得实在不好意思，脸扭到了一边，阿昌却被讪得凉在一边插不上话。章晶请大家入席。官员能讲德语，丰盛酒宴，章晶等殷勤招待，不消多说。

酒喝足了，饭也饱了。正题留到公司去谈。天窗一开，白话直说，开价不说，2000 美元，章晶转身去取。阿昌用中文说“多加两千”。这官员接到钱，也不点，往上衣内一塞：“哟，哟，匪送的拉大稀拉”（好，好，再见）。

第二天，货柜顺利取出。那些在海关一筹莫展的华商又是羡慕又是嫉妒，有人说阿昌在国外也有通天本事，也有人说阿昌让膀肩使美人计等等。

到 11 月 20 日，总算把合格的货物都交给了德商，损破的、不合格的全批发给当地小商贩。结帐，毛利 15 万美元。流通税和关税还没交（可以延期两个月到半年）。

圣诞节快到了，布达佩斯的街头洋溢着节日气氛，阿昌和章晶上街购买节日食品和礼品。佩斯一边离多瑙河不远的一条街叫步行街，其商品之丰富，店堂之华丽，堪与北京之王府井媲美。阿昌在一家珠宝首饰店停下来对章晶说：“进去，看上什么只管要。”章晶却扭回头一笑，“你还是留点钱养你的孩子吧！”阿昌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摇着章晶的肩膀：“这是真的？你……你怎么早不告诉我。”章晶说：“这还有假。”周围的匈牙利人惊奇地注视着这一对衣着华丽的中国人旁若无人地拥抱亲吻，对欧洲人来说男女在街上亲昵太平常了，而中国人有如此举止实属少见。

远处走来了两个手持警棍、衣着灰制服的警察，步行街很久没有中国人摆摊了，怎么今天有中国人来？他们走到阿昌身边站住了。

“怕死颇特！”（护照）

阿昌掏出了护照和移民证，警察仔细看了照片，又还给阿昌，接着要看章晶的护照。章晶出国较晚，没来得及办延期证件，只有覃氏公司的“工作纸”（劳工局所发的半年工作许可）。警察说了一通话，旁边的行人有懂德语的，告诉章晶说：“护照没有延期章，必须立即离境，现在就要到警察局。”

申辩是没有用的，警察对孕妇最大的恩赐是限章晶在一个月內离境，护照上盖了个黑章，意思就是这个。

没有进集中营就是万幸了，阿昌章晶没说什么，也没买什么，回去商量要紧。

我也不想在这里做生意了，你走了，我也做不了什么，现在我们是有钱的，我们去德国，你学音乐，我学德语。我们读几年书再说吧。”阿昌见过

世面，这件事像是小菜一碟。章晶还能说什么？

简直就是大逃亡。公司固定资产全部低价变卖或送人，银行资本全部提出，外汇帐号只留 10 马克，福林帐号还存一万，交了税，多发给两个当地雇员半年工资，让他们另寻雇主。过了圣诞，章晶在德国的老师发来邀请函，两个人就一径西去了。

覃氏公司红火了一阵，又像千百个华人公司一样，悄然消失了。

第七章 “匈牙利热”的前前后后

（一）匈牙利突然成了华人“俱乐部”

许多中国人可能不知匈牙利属何方乐土，然而在中国大街小巷流行悬挂高音喇叭的年代，中国人对“裴多菲俱乐部”这几个字却不陌生……汉王朝的霍去病以重创匈奴人而名垂青史……80年代末期的中国人，却排着长队涌入一千多年就是匈奴人居住过的地方“走亲戚”。

东欧热的焦点在匈牙利。

自1989年初到1992年3月3年内，先后进入匈牙利的中国人有45000余人。除转入他国或回中国的外，现仍滞留在匈牙利的约有16000人。其中有2100人左右获得匈牙利暂时居留权(黄卡)，仅有百余人获得了移民权(蓝卡)。

匈牙利吸引华人的原因有很多，主要原因是：

第一，匈牙利与中国自1989年1月开始对旅游者互免签证，匈牙利是中国人唯一不用签证就可以去的“外国”。普通中国人取得出国护照难于上蜀道，获得一个签证就像登天一样难了。1992年元旦以前，由北京到匈牙利的卧铺车票在苏联购买的话，原价只相当于北京到武汉的硬座车票，即使经票贩子翻十番卖出的车票，也只相当于几百元人民币。过去出国多是官员、学者的“殊荣”，而腰缠万贯的个体工商业者，经济上虽高人几等，社会地位还是矮人一截。出国不仅是做生意问题，而且是他们向公有制获益者的一种炫耀。中国治理整顿期间，市场极为萧条，个体户的日子更不好过。到境外做做生意，赚点钱，中国工商税务的手是伸不了那么远的。再说，匈牙利不仅对中国、还对其它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免旅游签证，一旦取得匈牙利的工作身份，去他国也容易；所以，即使不打算在匈久留的中国人，也愿意把匈牙利当作去火星之前的月球中转站。

第二，匈牙利过去被西方国家称为东欧集团的“天堂”。这里是裴多菲的故乡，这里的人民珍视自由胜过生命和爱情。匈牙利早在60年代就开始了改革开放，其政策和法律灵活、齐备，人民生活水平高于其它东欧国家，市场繁荣活跃，社会相对安定。匈牙利对外国人，尤其是对当年敢于反对苏联霸权并大胆改革的中国人热情友好。外国游客很多，中国人初到匈牙利又有安全感，又能赚些钱。

第三，匈牙利位于喀尔巴阡盆地，风景秀丽，土沃水美，气候宜人。秀美的多瑙河由北穿南，恬静的巴拉顿湖按季换景，是欧洲的“天府之国”。全境古堡林立，名胜众多，通讯、交通发达，来到匈牙利的华人无不赞叹匈国的自然景色和良好的生存环境。有人还比较了一番：中国虽也美不胜收，但人口太多；苏联虽地广人稀，但环境欠佳；西方生活水平虽高，但中国人去西方挣钱不易，生存太难。综合来看，匈牙利适合普通中国人去谋生。

还有一个原因，大概是匈牙利文化与中国文化有些共性。与其它欧洲民族不一样的是，匈牙利人的姓在前，名在后，英语普及率与中国大城市差不多。匈牙利人黑发黑眼睛居多，身材中等，与东方人相似。不少中国人看到匈牙利人觉得亲切。匈牙利在1000多年前曾是匈奴人居留过的地方，匈牙利人征服这一地区后，至少有一部分匈奴人被同化。当代匈牙利人还有不少取

名为阿提拉，这是当年威震欧洲的匈奴人首领的大名。匈牙利人（他们自称马扎尔人）早期也是由东西迁的游牧民族，但究竟是从何地诞生并从何地最初西迁，至今也无考证结果。但匈牙利史地学家研究结果表明，从语言、音乐、服饰、习俗等方面看，匈牙利人与中国甘肃的裕固族有不少相同之处。无论怎么说，地处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带有不少东方色彩，有中国人戏谑地称去匈牙利是“走亲戚”。

或许，还有更多的原因，使中国的“东欧热”焦点集中在了匈牙利。

镜头一：北京东交民巷公安局护照科。早上8点半。

最长的排队是右边一支，去欧洲的。排队人数有100多，旁边还有两倍于此正蹲着轮休的人。笔者扎到一群人堆里旁听他们的交谈。原来，他们都是申请去匈牙利的，那些站着排队的十有八九也是要去匈牙利的。据护照科的工作人员讲，每天申请去匈的少则几十，多则数百，有的通宵达旦地排队。

这里还是信息中心和交易所。匈牙利那边发生了什么事，如何获得匈的黄卡、蓝卡，必须办哪些国内的公证，路上带什么货最好等等信息，在这里扎上半天堆，就可全部弄清。这里也有人专门推销匈牙利方面的邀请文件，这些文件是申请护照的基本条件。“1500美元。”“太贵了，1000怎样？”“哥们儿有诚意的话，咱们一边谈去。”有人要退车票或买车票，或专门从莫斯科低价买进的车票都可以拿到这儿来交易。私钞美元的中心点，除了免税进口商品商店门口和几大自由市场之外，恐怕就是这里了。

这里不能遮阳避雨，阳光下人们晒得汗流浹背，雨来时淋个透心儿凉。但幻想一下拿到护照后的兴奋，这点困难一咬牙也就挺过来了。当然，不能与拿国家钱出国的人相比啰，护照签证机票都是送到手上的。

应运而生的匈牙利语热也使这个小语种在中国成了畅销商品。公安局对面的电线杆上贴着匈语速成班招生广告，上面标明了报名时间和地点，但没有写明学费，据说学费为一般英语速成班的3倍左右。还有人在这推销匈语会话手册，匈英匈汉字典，价格是标价的十倍以上，生意很红火。匈牙利地图、欧洲地图都可以本价五倍以上的价钱买到。除了招生广告之外，还有一招聘广告。内容是“本公司是华人在匈注册的进出口公司，高薪招聘一女秘书，条件是会说匈语。本公司代办护照并支付全部旅费”等等。另外有趣的广告是：提供出国咨询，代办邀请和订票，联系电话××××××。有意思。

镜头二：莫斯科市“基辅”火车站。

莫斯科火车站有十来个。“基辅站”是西去方向的火车站。由北京来的火车停在“东方火车站”，两站相距不远。但初来者不熟悉莫斯科复杂的地铁图，加上中国人带货和行李太多，一般都不得不搭乘高于正常价格几十倍的火车站“黑车”到“基辅站”。在这两个火车站，到处可以看见中国人，可以听到中国话。与中国北京火车站相比，只是“外国人”比中国人多一点罢了。“嘿，哥们儿，吃了吗？”“住下还是到匈牙利？”“妈的个B，今儿又被出租车给宰了一笔！”这样的话随处可见。中国人不懂俄语没关系，问个路什么的，到处看得见中国人。

直赴匈牙利的中国人一下车便赶到“基辅站”。在这里，中国的票贩子（多是留学生）垄断了每日两趟去布达佩斯的车票。30至60美元一张，一般是支付得起的，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票贩子大牟其利。俄国票贩子难销车票，主要是语言不通，中国人怕买的是假票废票，所以宁愿出高价找中国

人买。

芬娜是“基铺”站行李房负责人，她和部下们每天能接待数十位中国赴匈的客商。芬娜热情好客，喜欢中国人。她常对中国人谈起她少年时曾给中国某个首长献过鲜花。没想到这位首长后来竟让中国人自己整死了。在她的办公室和汽车里，到处装饰着中国的工艺品，这些都是中国往来客商送的。他们这样做无非是为了行李的安全。莫斯科，过去是便衣警察横行，如今是小偷骗子霸道。

“基铺”站每天去布达佩斯的中国乘客少则几十，多则百余。

镜头三：布达佩斯“Deak”地铁火车站

布达佩斯有黄、红、蓝三线地铁。其中红线地铁穿过多瑙河底，连接布达和佩斯。三条线路交汇点在市中心Deak站。这是该市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交换站诸电梯口有一个大电视屏幕。这里是约见人的最佳位置。匈牙利人也常在这里约见。不熟当地环境的外国人更愿约在这里碰面——这是大家最熟知最易找的地方。

自从1990年夏季以后，Deak站大电视屏幕附近的座椅上，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乎不间断的中国坐客了。全世界只有华人说话的嗓门大，几十米以外只要看见了要等的人，就要连喊十来声儿“李大哥，我在这儿哪，我在这儿！”故中国人不仅令人注目，而且“醒耳”。

笔者每每约同胞谈事，也多在此站。来得早，坐上二十分钟半小时，盯住电梯的转口，那上下转线乘地铁的人流中，中国人能占十分之一。中国人多时，给人感觉这就是北京前门地铁站。

如果镜头再延伸一点，布达佩斯火车站、苏联驻匈大使馆（现俄罗斯使馆）签证处、各大自由市场都是中国人的集散地。而布达佩斯警察局、市公证处、劳工局、公司注册律师楼、邮电局，就简直是：“华人世界”了。

（二）华人“款爷”

1989至1991年7月，是在匈华人的“黄金期”，除了白痴和意外原因，华人都是赚了钱的，令国内人羡慕不已，连匈牙利人都刮目相待“基那伊”……

中国与匈牙利这个中欧内陆国相隔太远了。两国第一次接触大概是成吉思汗的部队残酷地掠夺这个弱小的民族（匈牙利史书称“鞑靼之灾”）。此后，除匈牙利某学者首当其冲掠夺中国敦煌宝物、奥匈参与1890年八国联军侵华、中国支持苏军的1956年事件外，两国并无太多太大的恩怨。两国人民是友好的。

匈牙利是原东欧集团中相对来说比较独立自主的国家。卡达尔政府在1956年以后，一方面迫于压力不得不紧靠华约，另一方面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了不少深得人心的改革。如党政分权、经济工作务实、注重效益、对外比较开放。中国改革初期或多或少，借鉴了匈牙利某些有价值的经验。

东欧各国变革相比较，最早、最彻底、最和平、最顺利过渡的要数匈牙利了。用中国特色的语言形容就是“不流血的演变”。匈牙利共产党（原称社会主义工人党，后又改过名称）在多党竞选中失败，并不完全是它失尽人心，而是选民们的普遍随大流（国际大气候）的思想，且受东欧其它国家的影响太大。匈牙利人视苏军的驻扎为耻，苏军毕竟是匈牙利共产党政府引进

来的，所以该党有“卖国”之嫌。东欧其它国家共产党在下台前都对“民主派”进行了程度不同的武力打击，如波兰对“团结工会”，罗共、保共对反对者、示威者。匈牙利人多数担心这些事件也会发生在他们的国家，所以，他们产生了“换换看”的竞选心态。实际上，到目前为止，匈牙利民众面对混乱的经济、腐败的官僚作风、艰难的生活，未必不怀念过去的稳定、廉洁和繁荣。

变革后的匈牙利经济形势存在许多严重的问题。

外债是问题之一。西方国家早年为了政治目的对东欧许下了很多诺言，如果某国离苏联远一步，西方政府就会不顾纳税人的意见，慷慨地对它进行大规模的援助。而现在，西方政府突然看到了一个梦想多年的事实：东欧各国共产党均让了位，华约、经互会不复存在。这时要西方政府掏腰包，就要找出纳税人一千个理由予以拒绝、拖延。

匈牙利创汇还债的主要途径是旅游。匈牙利外债总额已达到 200 多亿美元。人均外债水平是东欧各国最高的。1991 年 8 月 19 日，苏联政变举世震惊。次日是匈牙利国庆日，在一个庆祝会上，两位匈牙利人在辩论苏联的事件，一个说：“真让人担心，我们刚送走最后一名苏联红军，说不准马上还要请回来。”另一个不以为然说：“大可不必担心，苏联要是保守派成功了，匈牙利只会无形中受益。”对方不同意这个观点，这个说：“如果苏联走回头路，西方不会坐视不问，只要匈牙利政府要求，西方就会巩固‘自由世界’的‘新疆’；不要说贷款，就是过去的欠款也是一笔勾销的，北约军队就会守在 záhangy（匈苏边境一小城）。”苏联后来发生了更有利于西方的变化，所以，匈牙利等原来附属苏联的东欧国家，也没能从西方得到一个子儿。

匈牙利风景雅致，古迹密布，有山有水，气候宜人。每年到此游览的旅客大大超过本国人口总数（匈人口不到 1100 万，1990 年到匈旅游人数是匈牙利人口的两倍，1991 年增到 7 倍）。在原东欧集团中，只有匈牙利人的外语水平（尤其是德语、英语）最高。旅游者方便，所以愿来。

旅游业为匈牙利带来大量的外汇收入，所以，匈牙利对数十个国家旅游者免签证，包括对中国游客。旅游者当中又有很多商人，他们是潜在的投资者和贸易对象。

旅游者也给匈牙利带来很多麻烦。请客容易送客难。每年滞留在匈牙利不走的游客，就算只要占游客总数的 1%，也是 5 位数。这个国家如何承受得了如此沉重的移民负担！该国的失业率也在世界前列。1991 年失业人口高达 21 万。

匈牙利移民问题由来已久。两次世界大战，匈牙利都倒向德国，结果都成了战败国。四周领土或割或让，所以在与匈接壤的捷克和斯洛伐克、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乌克兰等国家，有数百匈牙利族人。1956 年“匈牙利事件后”，又有数十万人流落异国他乡。现在匈牙利政局相对稳定，生活水平较高，周边国家大量持外国护照却操着匈牙利语的人一回到匈牙利就想定居。还有一批过去由于政治原因出走西方，看到国内变革后又想报效祖国的匈牙利的大批知识分子，也想重返故国。

人口问题是匈牙利经济发展的一个障碍。

人口问题也是匈牙利申请进入欧共体的一个障碍。

人口问题也是匈牙利人变得对华人无情的一个原因。

匈牙利人口问题，主要是前面所说的外国匈牙利人回匈定居问题。对华

人来说，移民权的竞争者主要是回匈定居的外国匈牙利人。

第二个问题是劳工滞留问题。每年过境的土耳其以及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劳工有 200 万之多，仅在德国巴伐利亚工作的土耳其人就有 20 万人要穿越匈牙利。他们都是开车往来，到了匈牙利，不免要玩玩看看；也有不少是被在匈的东欧妓女（也包括匈牙利的）绊住了脚；也有觉得留在匈牙利做小生意满舒服的。总之，伊斯兰的子民有不少停下来不走了。外汇黑市市场几乎被阿拉伯人所垄断，“切汇”的事常令外国人叫苦不迭。中国人被“切”的何止千人。笔者了解到中国人被骗而损失最多的一次竟有 8 千美元。真主和警察部管不了的。

第三个问题是吉卜赛人问题。读者不要想象有那么一个大篷车，里面都是善良的贫苦吉卜赛人，其中还有一位美丽善良的舞女艾司米拉达或叶塞妮亚。吉卜赛人是欧洲各国的共同问题。在匈牙利，吉卜赛人比华人多几十倍，他们的职业是讨、偷、卖唱、算命和做小生意。他们有居留权，有的还持有匈国护照。有 80% 以上的中国人被吉卜赛人偷过（这是在三组人，每组 20 以上的中国人中抽样调查出来的结果）。满身酒气的一家吉卜赛人在布达佩斯著名的 Desk 广场竟把一个中国姑娘先打倒，然后将提包、外衣抱个精光。在匈牙利各自由市场，凡是摆过摊的中国人都或多或少地被吉卜赛人偷过。1991 年夏初，笔者在一个自由市场上看见一群操北京口音的中国青年围着两个吉卜赛人痛打，起初还以为是同胞好斗。细问，原来是一个中国人抓住了小偷，其他中国人连摊都不看了，过来痛打小偷。“打一打解解恨，我的手都打折了，前不久我一个整包就给他们偷了。”一个北京人对笔者有如是说。吉卜赛人在匈牙利的地位却比华人高。他们有自己的社团，他们团结，敢动枪动刀，还敢上街游行，要人权，不怕坐牢，不存在什么面子问题。在匈华人财物的主要抢掠者是赌徒、贪官，其次就是小偷了。

第四是难民问题。在匈的南斯拉夫及东欧、印度支那难民总共有 10 万之多，给匈牙利经济构成了沉重的压力。自 1988 年以来，匈牙利经历了 4 次难民浪潮。匈牙利政府每天要拿出数十万美元。

中国在匈牙利本来难以构成移民大问题。在匈外国人中，中国人实在是“少数民族”，但中国人很惹眼。亚洲人在欧洲人堆里本来就起眼是原因之一，其二是华人集中在布达佩斯等大都市，每天奔波劳碌，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所占的比例大大超过了人口绝对值的比例。凭心而论，匈牙利人并非先天歧视有色人种。匈牙利人最初对华人的友好也是每个到过匈牙利的华人都有感受的。匈警察局上校处长博尔山尼夫人说的是：警察局的任务不是在各民族之间进行选择（《旅欧导报》记者钟洁译自《人民自由报》）。1991 年 8 月 21 日，《人民自由报》公布的被驱逐的 17000 名外国人中，主要是罗马尼亚人、波兰人、保加利亚人、苏联人、土耳其人、阿尔巴尼亚人、巴基斯坦人、加纳人和尼日利亚人。这篇报道公布了自 1991 年 1 月 1 日至 6 月 30 日半年中抵匈的华人总数为 12674 人，但没有说明有什么华人被驱逐。

但仅仅几个月后，华人为什么立即成为主要被驱逐掠夺的对象呢？

古人说：谤我不是，自省再三。用现代话说，遭到别人非议，还是先作自我批评吧。

中国人多，闻风而动，一哄而上地办来匈“旅游”（匈牙利只认华人为旅游者，也只对旅游者免签证）。既然匈方不承认外籍工人的合法地位，来匈旅游华人也就不能久住不走，匈牙利不是中国的一个海外省，就是在中国，

没有临时户口，一个人到其他省市谋生也并非易事。匈牙利也是发展中国家，再宽容也容不下几万几万外籍旅游者长期滞留。再者，中国人的一些不法行为，也实在难以让人当客人挽留。

（三）冲突的必然性

只要有战争就会有牺牲。“商战”亦是一样。中国人又在异国开辟了另一个“商战”战场……

中国人到匈牙利和东欧其它国家，机会和艰辛是并存的。出国可不是在国内一般的“出门”，很多人精神、物质准备未足，满怀理想而去，满含辛酸泪而归，多数人失败是正常的。

语言不通，出国像聋哑人一样比划，这是绝大多数（99%）中国人的共同问题。东欧苏联不流行英语，信息在眼前你只有干瞪眼。

除了语言障碍外，生活习惯不同也是中国人“久住难为人”的重要原因。欧洲人做饭见不得油烟，中国人在住处又炸又煎，好洁的房东说什么也不把房子租给中国人住。

外国人好静，中国人爱嚷。东欧人睡觉比较按时按点，尤其是年长的。中国人做事娱乐没日没夜的。剁起饺子馅来整个楼都在发抖，搓起麻将来吵得周围人不得安宁。难怪东欧人对华人先是好奇，久而生厌。

多数中国人并不是到海外投资做老板的，求职业谈何容易？中国自 80 年代初就开始了经济改革，人民生活提高，市场繁荣。中国能有这么多人自费出国，本身就说明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就。东欧苏联与中国不同，他们先是完成了上层建筑的根本质变，经济改革没跟上去。民主是足够了，生活却大大不如从前了；党派多了，工资少了；政治冤案少了，失业多了。中国人普遍受教育程度比人家低多了，又不懂当地语言，上哪儿找工作？人家指望的是你来花钱、投资，你却来夺职，抢饭碗，不赶你赶谁？

好了，中国人就摆摊，卖中国的轻工产品。这在市场物质空前缺乏的时空内是可行的，但久了就行不通了。为什么呢？苏东地区工业改革的一个目标就是把重工业、军事工业转为轻工业，只有对薄弱的轻工业进行扶持、保护，市场才会由萧条转向丰富。中国在 20、30 年代抵制洋货，也是为了保护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国的产品质量差，低价推销这些不合格产品，不仅使国家官商贸易受到很大的冲击，也使中国的产品声誉受到很大影响。匈牙利的日用产品价格相对来说是东欧较高的。一个日本商人说，这个国家的人的福利思想严重，巴不得天上掉下来美元，根本不能适应东亚、东南亚人勤劳的工作强度。这儿的的产品成本高，价格自然高，同样产品，中国工资低，运费低，加上逃关税，在市场翻几番价格也比当地产品便宜。中国的产品在争夺当地的市场，所以，禁止带货、禁止摆摊也是迟早的事。这不是人家的错。我国一样反走私，一样狠狠打击海外走私活动。

即使是在自由市场，中国人还面临着与当地小贩的冲突问题。中国人为了急于甩货，微利倾销，争相降价，使自由市场价格一片混乱。当地小贩极为不满，他们占天时地利优势，一有机会，就报复中国人。

（四）由曹君自杀说起

人生最可悲的结局恐怕首推自杀了。西方有学者鼓吹自杀是勇敢者的行为。而东方人大多都认为自杀是懦弱的表现。中国有句古语：“好死不如赖活着。”如果不是逼到分上，谁的双手能扼住自己的喉咙？

已过不惑之年的曹君来自北京。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精明强干，1991年4月初举家来到匈牙利，住在佩斯14区“五一”路，有当地居留证。曹君在国内生意做得不错，靠着吃苦耐劳精神，精心经营，几年内也赚了几十万人民币（据曹君一友人讲）。1990年国内市场不佳，曹君花了一大笔钱买到了护照。到匈后，他在自由市场上摆摊，不多久也把早期的费用赚了回来。这位不下赌场不逛红灯区，一心只想做一番事业的实干家踌躇满志，不满一趟一趟的跑单帮，就与在匈注册的某华人公司合作做生意，想把国内的人民币以货物的方式转移出来（至少要翻两番）。在国内方面，他花了不小的代价打通各个发货渠道，向布达佩斯发了两箱货物。因未能弄清匈牙利进口规定，曹君不能提货，货箱被扣在海关。曹不懂匈语，想到多年血汗付诸一旦，悲愁异常。此间，曹君几次被警察盘问得莫名其妙，一次身上的几千美金被说成是“非法所得”，给没收了去，连收条也不给。曹君呼天不应，8月3日，抛下娇妻幼子，竟自缢而去了。

曹君自杀说明了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一是华人对当地法律知道得太少，二是当地的“法律”让人无所适从。

原东欧集团诸国重人治而法制不甚健全，有法不依，无法可依的现象至今仍存在。

首先是居留问题。匈牙利号称是开放国家，欢迎外国人到匈牙利投资。匈牙利本身也是关税及贸易总协定成员，按该协定国民待遇原则，应给予外国投资者最起码的居留权，而匈政府在中国人投资建公司时并不作任何解释，等中国人投资后却赶人出境。

其次是关税和外汇管理问题。匈牙利法律文件几乎清一色只用匈语，其税法、关税条例、外汇携带规定都只有专门律师才能从书堆里查得出。外国公司开业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指导，进出口许可证和配额制度极为难懂。松一阵时灵活放权，给外商以很多优惠政策。有人以为可照此扩大贸易，加大投资，转眼之间，有关当局又忽然宣布×年×月颁布的法律仍然有效，优惠不复存在，对货物照样加大税收，使外国商人尤其是华商损失惨重，一蹶不振。还有最典型的是海关人员对入境者并没有任何关于携带外汇规定的宣传和提示，又不让人填写申报单，出关时却见外汇就没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会，或是不习惯带旅行支票，而是携现汇出入，海关对其他外国人并不严格查汇，查的就是中国人。

1991年7月8日以前，有一段时间允许外国公司有10名以内股东可以得到临时居留权。又是一夜之间，宣布不给了，要工作签证，还必须到股东母国的匈牙利大使馆去办。千百个中国股东千里迢迢回到北京，而匈牙利使馆又不给办，说是到匈牙利不用签证。等这些中国人再次出国去匈牙利，又被拦在匈的国境上不准进入，说是没有签证不让进。他们投在匈牙利的资本和资产再也撤不回来了。匈牙利外交部和内务部各奉一套政策，对他国公民不至于此，对中国人，简直是在耍着玩。

（五）华人公司知多少

不知有没有人搞过这样地试验：熙熙攘攘的王府井大街，找3个人团团围在一起装作在地下寻找什么东西的样子，这3位的身边会围上30位眼睛同样盯在地上的同胞。这是绝对不成问题的。问题是这30位同胞围上来的速度，是需要20秒还是30秒……

一位在布达佩斯某公证处工作的小姐阿妮塔估计说，中国人在匈正式注册的公司有1400家左右，其中有限公司占1/3。

根据匈牙利投资法，合资企业的外资部分应在5000万福林以上，而本国公司（有限）最低注册资本为100万福林。中国人开办的公司有独资的，也有与当地入合资兴办的，没有一家公司注册资本达到5000万福林（67万美元），完全是按所在国的公司注册资本。这样，中国人的公司既享受不了外资企业的减免关税等优惠政策，也享受不了当地公司的国民待遇。中国人的公司投资额在20万美元（1500万福林）的有5家；10万至20万美元的有7家；3万至10万美元的有88家。其余的公司资本在3万美元以下。中国人总投资额约为16亿福林（约合2133万美元或1.28亿人民币），其中固定资产投资约1/3。100多名取得匈牙利永久居留的中国人中，投资股东仅有30余人，投资总额600万福林（不足10万美元）。这就是说，几乎所有的在匈华商都没有获得国民待遇。

华商投资多半是餐馆、旅馆、进出口贸易、商业零售、批发等服务业项目，所有投资资本都是私人资本。大小中国餐馆有30余家，20余家集中在首都。华人开办的旅馆档次一般较低，旅客主要是中国人。进出口商品以从中国进口轻纺织品为主，商品多批发给中国小商贩，小商贩再拿这些批货到自由市场上摆摊。由于进出口商品大同小异，所以竞争对手都是中国人。于是中国国货价格越来越低，许多工艺品都是赔本销售的。

不可否认的是，华人公司有不少是为办身份证而设立的。1991年7月以前，匈牙利政府给每一个公司10名临时居留权。中国小商贩自由组合，凑齐一定的注册费用（其中一半以上是交给代办人），成立个公司，取得黄卡后再去他国试试或回国等待时机。

国外身份为什么那么值钱？这大概与我国严格的出入境管理制度有关。中国人出国，如果没有国外身份，再出境等于又一次申请护照，手续复杂，费力费时。1992年7月1日进行了一次改革，即公民再出国只要有所去国家的有效签证，不用再到公安局申请出境卡。而在这以前，再次出国是相当困难的，第二次拿出境卡等于重新申办一次护照。

匈牙利政府大概看出来不少中国人公司实际上是虚设办卡的，故取消了全部投资者的居留权。这样，在1991年6月以前申请注册的公司股东（无论虚实）都取得了居留权，而此后的数百家公司，一切投资等于白白扔掉。

（六）全面驱华不断升级

早就有人感叹：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就会变成一堆虫。中国与地球上一百多个国家有外交关系，而华人所持有的那本咖啡色护照，却在许多国家，还不如聋子的耳朵……

1991年7月7日，对在匈华人来说，无疑面临着一场新的事变。按匈牙利原来政策可以获得黄卡的中国人被通知说：他们必须回国，到匈牙利驻中国大使馆办工作签证。许多中国人信以为真，立即打道回京，岂知这是一条调虎离山之计，北京的匈牙利使馆不办工作签证。这些人没有身份和签证，根本出不了国。

所有华人被告之，无论是到匈求学的还是工作的，只要持普通因私护照，都被视为旅游者，只允许在匈牙利逗留一个月，到期必须离境。大部分生意人都傻了眼，有的合同尚未落实，有的货物还在路上。

9月下旬，有整列车的外国人（包括华人）被拦在匈牙利境外，对旅游者免签的政策又成了空文。这当然并非全冲着中国人来的，但华人中有很多是重返匈牙利办事的，误一天损失大了。

在匈华人抗议过、示威过，一切手续合法，就是得不到黄卡。至少两千华人申请了蓝卡（永久居留权），但自5月份以后的申请者根本不批。奇怪的是警察局移民处继续接受申请。申请蓝卡要向匈牙利当局交一系列的手续费，中国人还要花钱（几百至几千美元不等）买一个匈牙利担保人。从1991年5月至12月，中国人在蓝卡申请中又白白浪费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到12月底，全部申请者都以各种理由被拒绝。

匈牙利外籍员工求职要到各劳工局申办半年一更新的劳工许可证。华人大多数都能申请到，但这个许可证不能作为申请居留或延期的理由。要在护照上盖一个延期章，必须疏通警察局关系，每延一天，要按官价在匈牙利银行兑换十美元，凭“水单”延期。入境者必须带足一定数目的美元方可入境。到了11月1日，所有的延期都停办了，包括护照延期和黄卡、白卡的延期。在匈华人一下子成了黑户儿。正在路上准备进入匈牙利的华人都困在边界或改去他国。

华人开始大逃亡了。生意没了的，大胆一点的，仍在“黑”着，接受警察局官员肆意的搜查和敲诈。有的华人上街购物，竟被警察敲诈了3次，不给钱，就在你的护照上盖一个黑章——勒令×日之内离境，×年之内不得进入匈牙利。花钱消灾，只好忍痛被宰。那些家中堆满了货的小贩只有悄悄地拿着货物到自由市场上低价出手，就像做贼一样。

华人公司一下子倒闭了95%以上。撤出的部分流动资金被边境海关以莫须有的名义扣留，破产的华人成千上万。

人权，人权，华人不知什么时候想起了这个词，就通过律师、翻译到佩斯安德拉什街12号警察局移民处论理，得到的只是一副副铁板冷酷的面孔，根本不予理睬。

中国人想起了祖国大使馆，但据使馆领事负责人介绍，他们也作了交涉，但无结果。有的华人传说，中匈官方达成默契，要把在匈华人赶回中国，这一点恐怕证据不足。

最后的希望就只能请求教会和新闻媒介的同情和呼吁了。1992年春节前后，上帝派传教士们看望了一些生活无着落的中国人，送给他们一些礼物和纪念品，但没有送来居留权。“中国中心”、“欧亚俱乐部”于1991年10月2日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匈牙利《佩斯早报》、《匈牙利新闻报》、美联社布达佩斯记者站等记者听取了数十位华商代表的呼吁。

这些都于事无补。华人地位仍是一日不如一日。

华人的困境和遭遇的确引起了匈牙利善良人们的同情。

1992年4月24日《匈牙利新闻报》刊登肯·考什里尔写的一篇文章，题为《中国投资者认为匈牙利仍然是警察国家》，摘要如下：

2月16日将近午夜时分，正当一个贸易公司的经理冯耀汉（译音）将价值1733美元的袜子、衬衣安放在临时居住的宿舍时，他被警察局逮捕了。被拘留5小时后，他成为被驱逐的人。警察局限他和他的爱人（她也是公司经理之一）在两天内离开匈牙利，而且在一年内不准返回匈牙利。

然而，冯在警察局出示了由法院批准的公司合同，他被任命为这家公司的执行经理。他还出示了有效的允许在匈工作的证明书、存款户头和税务申报单。但驱逐冯的决定说，冯的收入“来历不明”。

类似冯这种情况不只一起。现在，国会正在开始审查，匈牙利当局是如何对待中国商人的。然而这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为时已晚。他们原来认为，如果他们获得在匈牙利建立公司的合法权利，那同时也会获得在匈牙利的居住权。

匈领事局和商会的官员们说，匈法律不要求有限责任公司的外国负责人有允许工作证。在第二步骤，即取得居住权方面，对英国、美国、日本、南朝鲜和台湾的商人说相对容易些，可说只是一种形式。

但对中国人来说情况就比他们糟得多。当局批准他们建立公司、征收公司注册有关的费用和税款，但却不允许他们在匈牙利居住。据匈牙利商会中国事务顾问米克洛什·彼得说，法院批准中国人建立公司而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却不给公司负责人居留证的这种事例，至少已发生上百起。

代表中国公司经理的律师斯特罗基·艾斯泰尔说，批准中国人在匈牙利工作而又不批准他们在匈居留是“绝对荒唐的”。在西欧各国，“都必需给公司所有者、经理人以居留权，因这是公司活动的基本条件之一。”

现在搞不清有多少中国人在匈牙利，估计约有3万（此数有些夸大——本书作者）。他们来这里建立公司，起码要有必需的100万福林（约1.38万美元）的基本资金，外加注册和办其它法律手续的费用约1500美元。他们大部分人是做纺织品生意，一些较大的公司则办餐厅，或者做家具和餐厅设备生意。

来匈的许多中国人原来利用免签证的方便在匈长期居留，他们到居留期快满时离开匈牙利一个短的时期，再回来又可居住一个月。但匈牙利自今年3月17日停止了免签，因而也就没有这种可能了。

中国人都怕到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去，因他们掌握拒绝批准在匈居留的申请权。本文作者在经过一番调查之后感到，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在拒绝批准居留申请方面在法律上是模糊不清的，因而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变化多端。

举几个事例：

彭光（音译）的身份是纺织品商人，他有劳动事务中心盖了大印的允许在匈工作的证明，他是在法院注了册的公司的执行经理。几周前，外国人事务管理局职员帕代尔·尤迪特通知彭：由于在建立公司合同上有两名经理，他位居第二，因此他只能是“第二经理”，这样就不能在匈牙利工作。当彭同她争辩时，她回答说：“没有讨论的余地，在匈牙利以外的地方也可完成执行经理的工作。”

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另一名职员拒绝了一个中国公司执行经理李洪要求在

匈居留的申请，理由是“持私人护照者不得担任公司负责人。”但这是根据法律哪一条，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商会的米克洛什·彼得说：“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法律。只是由警察局来决定。”

斯特罗基·艾斯泰尔律师说，去年10月他亲眼看到两名警察威胁、殴打4名中国人，并把他们赶出外国人事务管理局。

外国人事务管理局在信中拒绝执行经理甘东生要求居留的申请，还说什么“这不妨碍您的公司成功地运转”。甘在合资企业中有50%的股份。

一位中国企业家说：“这种做法给中国人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这里的法院仍然给中国公证注册，但警察局却不给他们居留证。就像他们不是同一个国家的机构似的。”

自由民主者联盟的国会代表梅萨罗什·伊什特万是国会人权委员会的成员，他正在对在匈的中国人的法权问题进行调查。他对《布达佩斯周报》说：“他获得的材料都说明，尽管中国人满足了一切法律要求，但警察局总是对他们的申请一拖再拖，或者予以拒绝，警察局提出拒绝的理由都是中国人无法理解的。警察局在制造各种障碍”。

去年秋天，斯特罗基律师给外国人事务管理局的信说：“你们给公司的其他外国所有主和职员以居留权，但在相同的条件下，你们却把中国人当作二等公民加以拒绝，这是违背宪法基本原则的。”

一位中国投资者说：“对中国人来说拒绝在匈居留是一个经济灾难。”一位中国有限责任公司的经理说，正当他运来价值几千美元的球鞋时，警察局却缩短了他的居留期，要他离境。另一位中国人说，正当他开饭店的设备已在运输途中时，匈当局却要他离境了。

尽管对这些离境决定可向法院上诉，但上诉的时间有时可拖18个月。

一位中国商人说：“我回到北京时将尽量说服其他人不要来匈牙利，因为匈牙利对他们和他们的公司都没有保证。”

（七）“集中营”

新华社记者记录了如下一段文字“……院墙高筑，大门紧闭，警卫荷枪看守，警犬虎视眈眈，……中国人集中在一个体育大厅里，男女一起……”回国者控诉：警察敲诈，侮辱中国男女，一个天真的江南少女，回国后自杀了……

阿珍是浙江温州地区的一农家碧玉，说有20岁，长得却像一个初中生，父母交给中间人10万元人民币，让“蛇头”逐国把女儿送到意大利。阿珍和“蛇头”一行到匈牙利后，一个电话打到温州，家里立即让中间人给“蛇头”在国内的代理送去6万人民币，还剩最后两站了，还有4万元放在中间人手里，只等阿珍从米兰打来一个电话了。

与阿珍一批想到意大利的还有两位女士和7位男士，年龄都在30岁以下，都是涉世未深、不通外语、甚至不懂汉语普通话的青年。“蛇头”对他们的生活和安全问题很负责任。在布达佩斯，这10个男女青年住在由“蛇头”租下的三居室套房里，除买食品外，不许他们随便上街，以防走失或发生什么意外的事。

——一旦出差错，“蛇头”不但要赔偿经济损失，而且“蛇头”在国内

的亲属会受到严厉的报复。这是有先例的。中国南方人会做生意，讨价还价艺术高，但谈成的买卖一般还是比较守信用的。

“蛇头”告诫阿珍等，在街上不允许同中国人打招呼，因为“大多数中国人都是骗子流氓，尤其是北方人，嘴甜、手狠，不守信用。”阿珍等默默地点头。在布达佩斯等了一个多月，他们竟不知多瑙河是什么模样儿。

偷渡路线过去一直是走南斯拉夫。自从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进行独立战争后，这条路线就不通了。“蛇头”又开辟了由奥地利进入意大利的新线。一天下午，阿珍等 10 人随“蛇头”来到了匈牙利西部重镇卓尔市。这里原是苏联红军驻扎的大基地，苏军走后，该市显得有点冷清。“蛇头”一行临时住在一家原为苏军家属服务的招待所，立即得到奥地利接应人“已作好准备”的通知。“蛇头”决定当晚启程，时间是 1992 年 1 月中旬的一天。天正冷，阿珍等人带的衣服很少，阿珍突然小腹犯疼，也只好忍着上了汽车。

第二天凌晨两点，他们一行到了边界附近一个废掉的旧车站。“蛇头”已对这条路线很熟悉，“蛇尾”们却只能跟着瞎摸。阿珍肚子疼得走不动了，“蛇头”扔掉了自己的手提公文箱，背着阿珍走了 2000 米，只剩下最后 300 米了，阿珍不好意思，要自己下来跟着跑。

忽然，远方的公路上出现了一道亮光，是匈牙利的边防巡逻队。“蛇头”带的队伍加快了步伐，一个、二个、三个……相继冲过了边界线。这边没人看管，“蛇头”松了一口气，等查点人数时，方知阿珍掉了队，回去接应已来不及了。

阿珍被巡逻队抓获了。汽车上强烈的车灯刺得她睁不开眼睛，两位身材粗壮的警察走上来“例行公事”。偷越边境者常有偷运毒品和武器的罪犯，因此不由分说，搜身检查，哭叫着的阿珍哪有一点力量抵抗？“认真负责”的警察搜查完毕，请阿珍上了警车。在车上，左右一边一个警察嘻笑着欣赏他们的俘虏。阿珍长这么大从未遭到男人的搜身检查，做梦也没料到在异国他乡遭受如此侮辱。

辗转了几个州，阿珍被押送到布达佩斯附近的一个拘留所，等待遣送出境。

关于这个拘留所，新华社驻布达佩斯首都记者周东耀曾作过专门采访，周氏有如下记录：

这原是内务部的一个招待所，院墙高筑，大门紧闭，警卫荷枪看守，警犬虎视眈眈。据拘留所负责人称，目前共拘留有来自 24 个国家的 350 余人，其中主要是亚洲的中国、越南、巴基斯坦、菲律宾，非洲、中东国家的阿拉伯人及原东欧国家少数人。中国人有几十人。

中国人被集中在像似一个体育大厅里，男女一起，水泥地上有一块垫子和一块毯子作铺盖，男女只有一个厕所，得先后依次排队。早饭是一杯茶和一块面包，有点黄油或果酱，有时就光是面包；中午一碗汤、二片面包；晚上仍是一杯茶和一片面包。这些饭食显然不足充饥。这些人绝大多数来自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省份，也有的来自北京、上海内地城市。据称这些人中大多数是企图偷渡去意大利等西方国家时在南匈、匈奥或匈捷边境被抓住的，也有个别是护照过期或出外时没有带身份证在集市或街上被拘留的。

据一位因忘了带身份证而被释的上海姑娘说，她在上海一家纺织厂工作，在橡胶厂工作的哥哥去年年初来匈“练摊”，她来探亲。她一次外出没

有带护照而被抓，既不会英语，更不会匈语，后来经交涉并出示了证件及其兄在银行的存折后才被释放。据她说，有一次，一个中国人在打饭时间同警察发生争执，一些中国人提出了抗议；匈方硬说是这些人想逃跑，于是用了催泪瓦斯，中国人在室内被熏得直流眼泪，便打破玻璃窗透气，匈方派了防暴警察及警犬，多名华人被警棍打伤，个别人被狗咬伤。这名上海姑娘还说：“我再也不想来这是非之地了，一星期内保证离开。”（警方规定她七天内必须离匈）

另据悉，在拘留所里的华人主要是去年10月4日匈方严格限制外国人入境后被抓来的，12月后增加最多。匈警方称，同中方核实后，这些人日内都已被遣送回国。

另据《人民自由报》今日报道，这些被拘留的部分人圣诞节前还闹过事，因而派了警察部队去恢复秩序。《人民自由报》指名这些人是中国人。

经有关方面交涉，目前这些人的居住条件有所改善，男女分开，睡在类似学生宿舍的双层床上。

一位因忘带护照上街的上海小伙子被抓进去关了几十天。据这位小伙子讲，他的公司正在从中国进来两个集装箱的货物，价值100多万人民币。由于他的被捕，而且被押解出境，这批即将到达的货物无人受理，损失惨重。关于拘留所，这位青年人说：“中国人受尽了人间侮辱。中国人单独关押，大概是防止有功夫的中国人进行反抗。”他身上有棍伤和狗咬伤的疤痕。他和阿珍是一批被押解驱逐出境的。

华人都称这个拘留所为“集中营”。

那位可怜的阿珍，就这样在不到3个月内，尝够了屈辱的滋味。回到国内家中刚一周，便用一根绳子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八）四处碰运的中国盲流

可怜，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偷渡越境；可悲，他们冒充政治犯请求避难；可叹，他们把中国护照撕毁在飞机上；可气，“蛇头”夺走了他们最后一元钱……为什么不回家？外国人也不相信一些中国人编造的谎言。

1992年1月3日，匈牙利警察局发言人突然宣布，匈牙利当局今后除极个别情况外，不给外国人发放居留证，已经发放居留证也将不再延长。在匈取得临时居留证的2000余华人和没有任何居留证的数千华人开始了灾难性的大逃亡。

机器、设备、家具，卖不掉的，扔；

餐馆、旅馆，拍卖不成，廉价转让又不成，弃！

堆积的货物，管它本钱是多少，甩！

警察们盯住一户户华商住所，他们轻易不进私宅搜捕，只是等在门口。华人一出门，他们就查居留证。如果没有，只好随他们上警车，去集中营住几日。然后被押解出境。最早被驱逐的华人还可以免费坐飞机，而现在，只把华人押送出匈牙利边境就什么也不管了。

美丽的匈牙利，变成了华人遭殃之地。送行的匈牙利朋友和善良的房东，对临别的华人说：“我们实在想不出办法挽留你们，该说情的说了，该担保的保了。”

绝望的几个华人选择了多瑙河

——华人把“多瑙”之河作为最后的归宿。尸体冲到了岸上，也有的顺流漂到了下游的罗马尼亚。多瑙河上往来频繁的各国游艇上，游客们从望远镜看清了浮尸的黑头发和黄皮肤：“哦，上帝，中国人怎么了？”

不甘心失败的中国人很大一部分撤到了罗马尼亚，这里给外国投资者半年一签的临时合法居留权，但在这儿同样生活艰难。于是又撤到了乌克兰、俄罗斯。不愿走回头路的开始四处撞运。

1992年某月某日，中国驻中东某国大使馆，几个操福建方言的不速之客要求祖国官员照顾他们食宿。

这个刚刚扑灭战火的国家百废待兴，空气中仍然弥漫着硝烟油味，重返家园的本国难民还在靠定量配给维持生计。而远在东欧的“蛇头”们却在盘算新的聚财之道。他们把中东说得比巴比伦乐园还要美丽，劳工每月能挣几千美元。没有取得东欧身份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南方省份的农民，对这样的理想去处宁可信其真，也不思其无。他们一出国，嘴巴和耳朵失去了大部分功能，也没人能说服得了他们，只有唯“蛇头”是瞻，每位交给蛇头一万美元，签证机票费自理，就又从东欧来到了中东。

使馆是外交重地，使命特殊。不管吧，自己的同胞，要管吧，经费精力有限。苦口婆心劝他们回国，嘿，他们死活不回去，最后只好听其自便。

有几十个中国人到了以色列。

以色列人对中国人是友好的。以色列是刚刚与中国建交的国家。这个历史上饱受迫害不幸的民族，为了自己的生存，也弄得巴勒斯坦人流离失所。犹太人重建的以色列国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只早几个月。那时候，西方国家只承认台湾国民党的“中华民国”，而以色列就偏偏承认新中国。40多年来，中国支持阿拉伯国家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而以色列从来不反华，更不与台湾建交。这一点足以反映犹太人的远见卓识和坚定执着。也不知是谁吹出的风，说在以色列挣钱容易。正在东欧无所适从的华人便主动找蛇头办以色列签证，一个蛇头在一周之内就净赚了80万美元。

办以色列签证本来可以到以色列使馆很顺利地申请，以色列使馆又不像东欧穷使馆乱收签证费，但盲流们肩上的脑袋好像只听蛇头的，兼而他们集居一处，不敢上街（语言不通，出去找不到家的大有人在），使馆在哪儿他们连问都不问，在国内辛苦赚的几千美元就这样被“蛇头”们随意抽走。

以色列是诞生“上帝”、“圣母”和基督的地方，但离“天堂”还是有一段距离的。数十个中国南方省的农民来到了圣城耶路撒冷，心里一下凉到底。办餐馆，找不到地方，宗教习惯又不许你什么肉都吃；打工没文化是不行的，做生意没有大本钱很难插进任何一个行当；上学可以，拿钱来，交了学费吃住靠什么？走投无路的中国人想投“死海”一死，无奈死海的浮力又太大了。

前面多次提及，由东欧地区流到西欧的华人，除了吃政治饭的人外，绝大多数人成了中国餐馆的帮工。那些老板们虽是华人同胞，有的还是同族同宗，但役使这些非法雇工来，就像对待牲口一样。要是西欧比东欧更好，就不会有那么多已经进入西欧的中国人又跑回东欧来。

美利坚合众国，是移民想象中最高的天堂。只是进入“天堂”的通行证——签证太难获得了。对于“蛇头”来说，这正是一笔无本万利的生意。

通常的，也是中国人拿手的办法是贿赂领事官员，这一招儿在美国外交

官面前经常失败“蛇头”们就想出了一个新的偷渡办法。

笔者在咖啡厅遇到了一个自称能办去美国的华人蛇头。这位先生方头大眼，端庄高雅，气度不凡，出手大方，有秘书、翻译、保镖拱卫左右。笔者问：“什么价？”对方立即说：“3 万美元。”再问详细些，对方就不大戒备地打开公文箱，里面有几十本外国护照，日本的、东南亚的，西欧华人的，都有美国使馆的签证。他顺便找了一个照片与笔者相像的护照，说：“这个你用合适，到了美国你寄给我就是了。”笔者问，到了美国就发现是假的怎么办，对方答道：“没问题，到美国就说你是政治犯，要求避难的。你像个读书的，还怕不给绿卡？”笔者问：“能不能想点更便宜的办法？”对方说：“那么你出一万美元，我保证你登上去美国的飞机，你上了飞机就把护照撕了扔进厕所，到美国落地后就自称是逃出中国的大学生，你就能得到难民身份。”我问他以前办成了多少，对方说不下 100 人。最后我只好说出不起这笔钱。倒是对方大度，说：“想好了，随时给我打电话，生意不成情义在嘛！”

至少，确实有人成功地进入了美国，或到了美国管辖的塞班岛。也有被美国移民局遣送回中国的。有位福建农民，通过越洋电话了解了哥哥从罗马尼亚混入美国的过程：交蛇头 2.7 万美元，从“蛇头”那里拿到了一本护照和机票，“蛇头”还派人送他上了飞机。到美国前毁了护照，下了飞机，高举双手像投降的军人一样，一言不发，任移民局官员搜身审查，移民局问不出话来，就当无国籍的难民对待。关了一阵，后来与在美国的亲戚联系上了，取保释放了。“关键”在于别说话，说了话要么就装出政治逃亡者，用英语说出个所以然来。如果说得不像，又暴露了是中国人，那么就有被遣送回中国的可能。你说中国人是愚蠢还是聪明？

无所适从的东欧华人不回国，就必须找到“新大陆”。朝鲜族华人去南朝鲜，中国的穆斯林试着进入阿拉伯世界，有本事的去西方发达国家，靠卖力“淘金”的又不知从哪里听说了一个黑非洲。有人还请教过“专家”，了解到这个大陆上有黄金、钻石、象牙，有个与美国友好的国家利比里亚，在那里好办去美签证。笔者见过临上飞机前准备去非洲的华人，有去南非的，也有去尼日利亚、利比里亚、扎伊尔的，去那里怎么样了？难以跟踪采访，就不得而知了。

有人传说，意大利 1992 年对外国人“大赦”，即对没有身份的外国人发放居留证，不怕死的又求上了蛇头，求他们指点偷渡办法。

又有人说，1992 年西班牙举办奥运会，中餐馆需要大量帮工，可赚大钱。西班牙的华人蛇头带大批西班牙华人护照到东欧，东欧华人有长得相近的，可花一万美金左右买一本，能混入西班牙就交还护照。随中国奥运代表团赴西班牙采访的一位记者，曾在一家中餐馆问老板：“你的华人雇员从哪里招的？”回答是：“布达佩斯”。

第八章 贪官污警，华人诉不完的苦楚

（一）公开索贿，抗拒受辱

中国人在国内可以振臂高呼：“打倒官倒、惩治腐败！”而置身海外却只有默念那句古训：“人在屋檐下，那能不低头”。

东欧剧变后，腐败是严重的社会政治弊端。中国人要办任何事，都要受到层层盘剥。入关不贿，就会被故意找岔儿搜身，或找理由拒绝让你入境。办延期居留，则完全是买卖交易。租房、注册公司、申请贸易权、开办实体企业、货物报关、交税等等，官警大都会用拇指搓搓食指和中指，公开要意思意思。在中国，贿风特点是私下送，避开众人耳目，而在东欧，索贿几乎是完全公开的。随便举几例，可见一斑。

与满洲里对关的外贝加尔镇，边警、海关官员进中国旅客车厢的第一动作是敬礼，手未放下就指着桌上的东西，明知故问：“哪是什么？”如打火机、香烟、蜂王浆，见什么要什么。有硬气的中国人不给，“对不起，请走一趟”。这时，无论你的行李有多重，都要跟他下车到一个特殊的房子里接受检查。苏俄海关究竟允许旅客带什么、带多少，完全是官员们口头一句话。翻出几件丝绸，他说：“给我妻子一件怎样？”这时你还说不给，那么，你的内三角就要脱下，看看你那不得见人之处有无“毒品”、“珠宝”或卢布。中国人有时在袜内鞋底藏几个卢布，岂能瞒过训练有素的涉外警员？一般情况下，中国人是主动送礼的，送完后自豪地骂一句“穷毛子啥都要。”殊不知你这一送，他一送，就成惯例，违例者就惨了。那些死心眼的中国读书人没几个钱，难免就要品尝一次“脱感”。读者千万不要想象脱衣时只有同性在场。耍小聪明的女士，如果想把一束不怎么值钱的珍珠链子藏在卫生带上偷运过关，那也是太小看他们海关官员了。送礼，先看看对方盯住你的什么物品，如果一个男性官员盯住你晾在车厢内的内衣，你如有多余的，就把这件给他，他不用，可他的妻子或女儿、情人也是用得着的。反正，在他的伟大国家，原子弹多得不得了，而公用厕所的手纸篓里，都是片片《真理报》、《红星报》。

中国人的贿术是不用教的。比如，用不到票价三分之一的价钱贿赂列车员，就可以不买票坐车由华沙到布达佩斯，你不必担心查票，有人查，指一指乘务员室就行了。查票的心领神会，不多时查完了，就到乘务员室参加“分红”。由布达佩斯到布加勒斯特，正常票价要70多个美元，上车后列车员要25美元，你可以还价到15美元。出匈牙利海关时花10个美元以内的钱物，一般可以免检，这里主要是查你的美元。匈牙利进关时不查外汇，你没有办法证明你的外汇是由国外带入的，而出关时超过1000的，绝对要没收。中国人被没收几千几万美元的岂止100人！打官司，花1000多美元请律师，也是输。因为，法官问你：“最早从中国出关时的报关单上写的只有1000美元（中国人出国时只敢写1000，多了，中国扣下，但中国海关对同胞不搜身，很多人是能多带一点血汗换来的外汇的），这么多的美元是偷来的不成？”结果你要不回来钱，还要坐牢。所以，还是花几个小钱消灾吧！但是，那些没有多少外汇的人也不要以为不贿赂就没有事。中国人已经喂饱了他们，不喂是过不去的，尤其是女同胞们。这里引用一个作者没有亲眼所见的故事：匈南

边界有几个搭伴而行的中国青年接受盘查时，匈牙利官员以搜美元为名，摸一位怀了孕的中国少妇的胸，她的丈夫却被另两个关警按住。同车几位福建青年实在看不过，就拿出匕首、手枪冲过去逼住关警，然后从关警身上搜出手铐和一大把勒索华人的外汇。“没收”了外汇（甚至有人民币），然后把这三个关警铐在车厢内。这几位中国小伙子下车逃了，到了南斯拉夫就把这一幕打电话给在匈牙利的中国人。关于中国女性受辱的事，笔者听到了不少，采访女同胞时，每每能听到：“他们真坏！”还能说什么呢？

笔者吃过不贿的苦头。由某国到某国进关时，几位官员以莫须有的借口索要 50 美元，同车几位北京青年用手式和不流利的英语为我“说情”。“他是作家，刀拉（美元），宁吃（没有）”。对方回答竟然是：“我也‘宁吃刀拉’”。笔者坚持一个子也不给，最后他也无奈，只好把护照交给列车员还给笔者。满以为正义终于战胜了邪恶，并且鼓励同车中国同胞应当昂首拒绝行贿。几天后，笔者离开这个国家时被关警扣留了。原因是在护照上没有合法入境章！这下笔者竟成了偷渡者！没办法，还是送一条万宝路吧，过关要紧。

贿，贿，贿，一贿解千愁。或问：只对中国人索贿吗？答案是 yes。笔者一年中旅行了十几万公里，就没有看见海关、警方敢敲诈外国人的。在布达佩斯卡尔文地铁站口，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越南人（说来他也是中国血统），都在摆摊，这是违法的。警察抓住了，只罚持中国护照的，对越南人根本不理睬。据说，越南人在护照上写明祖国大使馆的电话号码，一有事，就让警察打电话给本国领事。中国人是不敢的，这也许是一个面子问题。

1992 年 1 月以后，按匈牙利的规定，到期不离境的中国人应当被关进拘留所或立即押解出境。但有些警察不这么做。他们见到中国人后，领到一边，先搜身，有东西也要，有钱也要，不给，就在你的护照上盖黑章（限时出境并不得再入境为内容）。不带护照的，立时关到拘留所。小张是 1991 年 12 月到布达佩斯的，按规定 1 月份必须离境，但他黑在该市，到 2 月 22 日，他被警察“罚”了 15 次（每次 600—2000 福林不等），你如果要收条，那就多交 10 倍。小张实在被罚怕了，他被迫到了第三国。

（二）进关容易出关难

中国人都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的俗语，当中国人走出了国门方知《成语词典》还应加上一句：“进关容易出关难”。

新东欧的经济困难是暂时的，这里有丰富的资源、能源，有良好的科技教育基础，又没有中国那样的人口包袱，实现经济腾飞的条件是有的，但如果不提高效率，不革去腐败弊端，那么只会自拖后腿，见笑他国。

随着中国官方与“新东欧”地区贸易的扩大，公派到这一区的官员、国营进出口公司的业务人员越来越多。他们出差时间短，不太了解当地风俗，见了当地一些便宜的衣帽、机电用品、不锈钢餐炊具，就买回来送赠亲友。没有钱就节省出差吃住补贴，省下些钱买东西体面回国，但回国时东欧产的物品常常被全部没收。一位东北地区的厅局级干部，离开苏联海关时被带进没有暖气的小屋内脱衣搜查，他抗议、骂“法西斯”，这又有什么用呢？

在二连、满洲里和北京海关，中国边防、海关、卫生检疫官员对中外出

入境者彬彬有礼，尊重人格，坚持原则，有多少回国的同胞，见到祖国官员，含着热泪，吐不尽一腔苦水，满腹冤仇。

在伊尔库茨克的一位华人妇女，准备回内蒙生孩子，从苏联（当时还这么叫）带回一些小孩子用的衣服、童车、玩具等，被苏方海关全部没收。

一位吉林的朝鲜族妇女到白俄罗斯探亲回来，8000 多美元被全部没收，连收条都没有，连出国时带的两个金戒指因没有填写在入境关单上也被没收。

“打死也不出国了！”这是一个上海女士回到满洲里时，对边防官员小鲁说的第二句话，头一句是，“终于回国了”。

第九章 港、台商人在东欧侧记

(一) 港台商与大陆商

日本经济的成功，给地球人一个最大的感触就是日本国人好似都加入了一个纪律严明的大军团。而中国人最喜欢“画地为牢”，殊不知东欧剧变后政府对付中国人的高招正是“分而制之”……

香港商人很早就与东欧苏联地区建了商贸联系。过去大陆与东欧地区关系紧张，而台湾由于一贯“反共”，也不与苏联东欧集团往来。香港一些商人成了中间商，大赚转口贸易之利。中英香港回归问题解决以后，香港大富户们因在西欧北美有资本有居留身份，对东欧兴趣较少。东欧一些国家公布了吸引香港人作为投资移民前来建厂办第业的一系列措施，大批中小厂商都纷纷前去考察，但是看到这一地区的腐败、懒惰、低效率、落后，投资环境不如中国大陆，故投资者很少。港商与匈牙利关于共同开发利用多瑙河上某个岛的谈判进行了几年，至今仍无成果。

香港居民并不是害怕1997年谁吃了他们，他们也相信香港的社会制度不会发生变化，那么他们急于买别国护照、居留证又是什么原因呢？乔治·区说：“香港人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很多人拿了外国护照和居留证，也不到外国定居，毕竟热爱自己的家园，只是不知将来会突发什么事件。我们香港人不是传达文件就能说服的，他们各有各的盘算，总想留几条退路。”乔治·区先生因不够资本作为投资移民进入北美，便来到东欧试运气。他个人的想法是拿到永久居留证后回香港，可以放心住在香港。万一有变，走也不迟。

台湾商人到东欧备受青睐。东欧政治剧变后，台湾视这一地区为自由世界“新大陆”，是广阔的原料产地和潜在的大市场。台湾当局组织了一个个展销团和考察团，到原东欧苏联显示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五花八门的精致产品。一个个东欧官方团体也被邀请到美丽岛，一展“小龙”风姿，东欧、独联体一些官员们纷纷被“银弹”击中。接下来，台湾一个个完全具有外交使团性质的“联络处”、“商贸事务办事处”在东欧、独联体大都市挂牌树帜。1991年布达佩斯秋季国际博览会，五星红旗和“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都在迎风摆动。台湾展厅门庭若市，正门便是“国旗”和“国父”像。正门用外语写的是“台湾”二字，而厅内中文牌子写的却是“中华民国”。

面对台湾的银弹攻势，中国大陆采取了几个有力的措施：首先是不公开评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东欧的新变化。政府反复申明，无论发生什么变化，都尊重东欧人民选择，维护传统友谊。在东欧很有影响的中国书叫《东欧局势的演变与趋势》，书中对帝国主义的“操纵”、“颠覆”和原苏联在东欧领导人有些评论，引起了不满。这本书（还有一个续集）立即遭到查禁。第二，中国对原苏联东欧的经济困难给予及时的援助，帮助那里渡过寒冬（台湾有人攻击大陆，称此为“金弹攻势”），邀请新领导人访华，承认新独立国家，支持它们进入联合国。同时就台湾问题反复交涉。这一系列措施稳住了新东欧，维护了外交关系，扩大了商贸往来，扼制了台湾的“银弹攻势”。

从另一个角度看，得利最多的当是苏东国家。一方面，它们一致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唯一合法地位，以此让大陆在经济上多让步；另一方面，它们企图与台湾建立表面的民间关系，实质上却是与外交关系无异的“准外交

关系”，经济上也压台湾方面让步。台湾外汇储备超过美日，位居世界第一，是最有实力的投资商。大陆改革十年经济实力大增，两岸中国人都有钱。最善于纵横捭阖的原苏东国家想玩玩中国人。

大陆方面也有远谋。西方以 1989 年事件孤立中国，这个坚定的社会主义国家处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之中，冲破政治围困，不使原苏联东欧参与对华制裁封锁的行列，外交上胜了西方几分。台湾方面在政治上没有安理会的王牌，扬长避短，只有凭经济实力扩大其影响。

前面所述的就是台商、港商进入东欧、独联体的大背景。与大陆国营公司不同的是，港台商人的企业是个人的，经营好坏直接关系到个人事业的成败，赚了致富，赔了破产。大陆国营公司出国人员是最不用担心利润的商人，赢利多了自己不多拿一分工资，赔个精光也不少拿一分奖金，谈判时间不足上街购物时间的十分之一，谈判时“大大方方”，完全是“大国风范”。而台、港商人表面气派，谈判时斤斤计较，软泡硬磨，达不到利润目标，宁可不谈。

台湾宝华公司总经理助理陈先生和大陆某省五矿公司贾副处长，在东欧某博览会外有如下一段对话：

“贾先生，你们的合同为什么签得那么快，是不是原来的老客户，都是‘同志’好办事？”陈先生问。

“我们是按国家统一的买卖合同文本格式填格子，不用从头起草，所以填空就完了。”贾笑答道，“代表团还有参观游览事项没有完成，每个人手头还有个人购物单，家人亲友邻居的，单位同事的，十几天，逛街购物是重头戏，所以，只有加快谈判，先完成任务。”

陈先生不解地问：“如何衡量工作成果？”

贾处长说：“一般来就，成交额是主要的，每年每季度的任务完成了就行了。”

陈先生无不羡慕地叹道：“我们的老板只认钱，只认利润，老板无论在世界哪个角落，都盯住每笔买卖合同的每一个细节，我们手下人办事可是一直也不敢偷闲。稍有差错，炒我的鱿鱼。”

贾处长忙说：“你赚得多，老板给你的报酬不就多了？而我们哪怕是赚了 1 亿，个人也拿不到 1 元。”

陈先生最后说：“幸亏我们不是做同样的生意，否则，我们是斗不过你们的。”

大陆私人投资贸易商的竞争对手不是港台商人，大陆私人资本有限，难与之抗衡。大陆私商的主要对手是大陆国营公司。大陆商品都一样，国营公司出口商品多而全，运输成本相对低，数额大，价格很有竞争性。私人公司的产品只有减少销售渠道，压低价格才能出手，私商产品大都局限在日用百货和纺织品。大陆商人的“双轨制”自相进行竞争，得利者东欧消费者也。台湾相同产品造价高，价格不易被东欧人所接受，所以台湾商人出口东欧地区的多是办公设备、电子产品及玩具，香港货玩具、服装、手表为多。

相比之下，港台商在东欧投资比大陆商少得多。他们往往是先试探对方是否可靠，逐渐选好合资开发项目。大陆国营公司与苏东客户合营的工厂、餐馆、商店谈妥就上，出差时间受限制，来不及细致考察，上级号召迅速占领市场，扩大外销途径，公司党委说要当成一项政治任务去完成，执行者们谈完了，任务就算出色完成了。同是华人，大陆人和港台人打的是完全不同

的套路。

在东欧商场上，先后亮相的中国国营公司干部和私营老板、港商、澳商、台商、中国大陆小商贩，在经商上各展其术，使这一片广大的地区人民对“大中华”世界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来东欧地区经商、投资的，还有来自北美州、西欧和日本、大洋洲及东南亚的华人华侨。过去，东欧苏联是华侨开发图上最大的空白地区，如今，铁幕一开，给各类华夏商人提供了全新的舞台。

（二）港台人士在东欧的生意扫描

把美国“航天号”太空船送上太空的科研大军中，体内流动着炎黄血液的华人占有多大比例？蓝眼睛常常对华人聪慧的大脑发出由衷的赞叹。在商业战场，蓝眼睛对华人的赞叹就又掺杂了许多无奈和焦虑……

港台的中小企业为这两个地区的繁荣作出了很大贡献。进入东欧市场的港台商大都是中小企业，经营灵活，赚钱有道。港台商人的个人经商素质相对来说层次较高，他们搞商品经济的时间毕竟早多了。

乔治·区先生靠军品生意发了大财。区先生原是广东人，1978年偷渡入港。那是名副其实的偷“渡”，要好水性，还要有胆子。到香港后先在码头打工，又当了两年海员，靠自己挣的钱又读了几年书，毕业后受聘于一家大公司当雇员。只干两年就独立注册了一家贸易公司，靠贿赂大陆和海南岛官员大做了几笔“水货”——汽车、彩电、录相机，使公司初具规模，甩掉了“皮包”帽子。

区先生在东欧的生意名目是“废旧回收利用”。“废”是指“冷战”结束后用不上的军用运输机、运输机和运输车，下马后的工程设备。“旧”的东西范围更广，停产的军工设备、器械。收购这些东西的价格便宜得惊人，出卖废旧的单位一般不要钱；因为现汇不能直接解决吃穿问题，所以他们会要食品，冬衣、夏衣来换。如一家飞机制造厂卖架运输机，要价是供全厂十余万员工的越冬食品和衣物。这区先生是变不出来食品和皮衣的，于是就与大陆财方几家食品和服装公司签订贸易合同。这笔生意一边空买，一边空卖，不用半年，区先生就获利百余万。

前文“华人百态图”中提到过台商毕先生。毕先生只有28岁，原来是台湾某工程公司派驻大陆的一名技术监督员。在大陆工作期间（当时毕先生只有24岁），某合作单位向毕先生提出一个“合资方案”，即由毕个人出资与该厂联合成立一家“合资性质”的公司，以使该厂由国营企业变为“三资”企业。这毕先生只是一名技术人员，哪里出得起这笔“外资”？该厂党委书记是出了名的“企业家”，但由于企业内部问题国营体制的弊端，该厂连年亏损，回天乏术。只好求助外力。书记就给毕讲了一堂课：合资只是要毕的“外商”名义，合资的“外资”部分实际上由该厂出，让毕拿出海关境外，再拿回来，就成了“外资”。事成之后，该厂可在三年内享受免税待遇，10年以内还可以减免不少利税。毕先生问如果办成给他个人什么报酬，这家工厂说给他个人十万美元。经过书记的思想教育，毕先生提高了认识觉悟，说干就干。认识上升到了实践。

不到一个月，毕先生就净赚十万。接着，又与其它几家单位“合资”，

几十万到了手，毕先生就到了东欧，成为最年轻的台湾投资商。自从有了“毕太太”与他配合之后，毕先生与当地一家小厂合作，以“来料加工”的合作形式建起一家电子计算机公司。毕氏公司成功的诀窍是四个字：兼容并收。具体地说就是：美国的软件台湾的壳，日本的经验韩国的料；西欧的型号东欧的价，中国的人才大陆的钞。

毕先生的业余生意是军火软件。军火岂有“软件”？看官，过去冷战期间，中国人手中的武器大都不是中国产的。国民党到台湾后，那拳头武器都是美国的，而大陆军工许多是苏援和独立后仿苏制而改进的。大陆武器与华约武器同族同宗，所以，华约武器的一些秘密——即“软件”，对台湾来说有着非凡的意义。这些“软件”，包括退休的设计人员、穷困潦倒的工程师、图纸、各种常用军器“样品”，都是廉价的商品无价的宝。毕先生“业余”的生意比他的表面生意更来钱。

毕先生还有一种“业余生意”。原来借他的名义建立起来的那一家“合资”公司又把生意送到毕先生的门前。这家大陆企业自从由国营变为“三资”企业后，企业留利多了，税也不交了。企业领导进一步假戏真做，按“外资企业”规定，一方面提高职工待遇，另一方面敢借子虚无有的“台商”老板制订的“企业内部规章”约束职工，令行禁止劳动纪律大大加强。那些吃惯了太平饭的“领导一切的阶级”分子再也不敢旷工怠工，工厂效益大大提高，原来的厂党委副书记提升为主管工业的市委书记。这位副书记知道毕先生在东欧做起计算机生意，就请毕先生邀请他和由他率领的一队企业领导赴东欧考察。毕先生和“毕太太”组织力量热情接待了参观团。如今，“毕太太”独树一帜，成为毕先生领导下的专门经销那个参观团中三家企业产品的代销商。

港台商也做服装、轻工产品，价格上斗不过大陆产品，但质量、花色、款式胜大陆品一筹，尤其是包装。有的商人完全是从大陆进货拿到香港包装。一样的货质，大陆包的只能低价卖给东欧的穷人，港台商再一包装，就能卖给东欧的富人。价格当然就有几倍的悬殊了。

目前，港台商人在东欧的声势不如大陆的官民商人两股大潮，但港台商的生意面也很广。买卖商品大至飞机、轮船、钢铁、五金矿产、木材，小至针线、纽扣、酱油、手绢、棒棒糖。

宝华公司在台湾是一家不引人注目的矿业公司，《台商企业名录》上未列其名。该公司在1989年年底就盯住了东欧苏联这片大市场。公司总裁派其得力的助理陈先生驻布达佩斯。陈先生下榻处附近有一个经济研究所，陈先生首先与这个研究所合作，以不大的代价获得了东欧苏联各国最新的商情、产业贸易政策以及与商业有关的法律文件，并把这些信息反馈到了台湾。

根据陈先生的信息和建议，宝华把重点放在苏东矿业资源和木材资源上。前大清国官员称台湾为“化外不毛之地”，也难为台湾的中国人经过多年生聚，把这一地区建成了世人瞩目的亚洲“小龙”。可不足之处是其资源匮乏，当局又拒绝与大陆直接通商，大陆本来有的资源，台湾人民却与之无缘。

苏东地区大变之始，人们的注意力放在政治上，经济事务毫无章法。有人形容1990年至1992年的苏东经济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惯性+地下经济渠道+小贩促动的自由市场。例如稀有金属的出口，在苏联本受到严格的控制，现在开放了边界，小贩们通过地下渠道往外一倒，瞬间就当上了百万富翁。宝

华公司在波兰从一个白俄罗斯小商贩手中购买了 20 多公斤的一种比黄金贵几十倍的稀有金属，只花了不到国际市场 1/50 的价钱。那小贩称是从自由市场上买的，只有鬼知道他是怎么弄出来的。陈先生通过几条类似的渠道搞到了价值上亿美元的十几种稀有金属。就在与他做同样生意的大陆某省五矿公司代表团，考察、谈判、购物、游览的毫无所获的一个月中，陈先生独自一个做成了十几笔买卖。那贾处长回国时的报告写有“虽然合同没有落实，但我们增加了对东欧的了解，扩大了交往，增进了友谊”，受到了上面的肯定。而陈先生带回去交给老板的是一个集装箱价值难估的贵重金属。

（三）以港台人身份经商的大陆人

向内地洞开后，港台同胞的“回乡证”便成了一张魅力无限的“派司”。内地的城里人向来是瞧不起茅屋和农民的，而对港台的茅屋和农民却又视若“明星”。大陆人走出国门便又非常热衷冒充港台人……

在波兰注册的华人公司至少有两家称“台湾××公司”，乌克兰有两家“香港××公司”的办事处。这些号称是港台的资本实际上并不是出自港台，而是正宗的大陆钱。

与保加利亚一工厂合资成立的“保——港合资××有限实业公司”的“港方”老板约翰·张，是一个半句粤语都听不懂的大陆中年男士。认识约翰的人知道他本名叫卫东。地地道道的香港人说：“大陆至少有 3.6 万人获得了香港身份证，其中有少数人恐怕没有在香港住 30 天。”又据某港报称，大陆移居香港的人有财产多少等等。因有些港报谣言真话不易辨清，姑且听之。反正这位约翰有崭新的香港居民证件，能持美金百余万来东欧投资。此君自称是外贸行家，深谈下去，原来是除对如何搞大陆进出口许可证和酬额之外，啥都不精的人。最奇怪的是，他显得比真正的老香港居民更怕“九七”二字。

因贩卖大陆古董发了大财的阿贝，随赴港“1 日游”。一到香港就离团出走。此前，阿贝把巨额人民币换成美元，交给回大陆探亲的台湾亲戚带到了台湾。还有一笔款项由海外买主汇到了台湾亲戚的银行。阿贝离开团体后，立即打电话，台湾的亲戚当晚飞来香港接应。阿贝很快就到了台湾。这亲戚是信义之士，将阿贝的钱如数奉还。阿贝给亲戚 10 万美金，除表酬谢之外，请求尽早获得台湾居民证件和“中华民国”护照。在台湾，阿贝生意做不好，打工又没技能。“总不能坐吃山空。”他下了决心，要到欧洲干番事业。他带了几件不大值钱的小古董真品，又找了几件在台仿造的西周、酒器、秦汉的佩玉、唐代的三彩和宋时的官窑，又装满一箱假冒的古代中国书画作品，幻想能蒙蒙欧洲老外。不料，欧洲人只认古希腊的金币和文艺复兴的艺术品，对远东的东西好坏真假都没什么兴趣。还是西欧一位华人为阿贝指了一条路，阿贝来到了东欧。东欧人更买不起阿贝的“藏品”，他趁此打住，不干那种营生了。他在东欧开了一家：台湾食品公司，从台湾引进设备，利用当地的大豆做豆腐、酱油、豆酱等产品，生意相当不错。当地中、西餐馆、ABC 食品店纷纷定货，产品供不应求。

大陆经济改革后，表面上看似乎是一些个体户和一些农民成了“万元户”，而真正发大财的款爷却很少是靠做小买卖或承包责任田起家的。他们靠批条子，搞进出口许可证，出卖中国经济情报，专控紧俏商品，独霸销售

渠道，利用政界、军界特殊渠道走私，这些事迹国内报刊频频予以揭露。每次打击经济犯罪运动都有几个倒霉蛋被揪出来做筏子。在东欧一位名叫史密斯的“香港人”说这些人愚蠢至极。

史密斯讲的是地地道道的北京话。此君是满汉合璧后代，过去人人羡慕的“史秘书”就是她。做秘书的在中国是一个特殊阶层，当秘书是苦差事，突击写一晚的稿子，第二天讲在别人的口里，捉刀的没有“版权”。但是一旦熬成婆婆，前途无限。做秘书除了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外，还要有完美的做人艺术和识时务能力。死心眼的，读死书的是干不好这一行的。这小史又比一般能干的秘书更聪明一点，她又爱看一些关于秘书的书，如《田家英故事》、《江青和她的秘书》、《周恩来和他的秘书》等等。她得出了一个结论：做人难，做秘书最难。于是她想急流勇退，捞点实惠就不干了。机会不负有心人，她终于成功了。

国内某项大工程得到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向世界公开招标。国际工程承包商蜂拥而来，使尽花招渗入招标委员会。史秘书的一个同学是外商公关雇员（红眼病的人称这类华人为当代“洋买办”），外商便顺线抓住了小史。条件是：只要小史提供的有效标底情报能使该公司中标，外商将按投额的0.75%付给小史本人。此款不打在国内，而是在香港开史的专门账号。另外，外商保证为小史搞到香港身份。这对小史太便利不过了。事办成后，小史办了调动，由人才交流中心申请了出国护照，到香港后取得了数亿多美元的0.75%，又持香港身份证到东欧成了投资商。她的底细是她的前男朋友兜出来的。

布达佩斯有一家“香港酒楼”，后又新开了一家“台湾酒楼”。这两家餐馆是同一个老板开的，老板不是港台人士，而是原籍大陆的比利时华人。老板经营有道，生意兴隆，老板的父亲当大厨。这两个餐馆名称先亮，后来的港台商人想开餐馆，就弄得师出无名了。

第十章 海外华人第一职业——办餐馆

中国人把店内店外涂得红红绿绿，把一个个龙凤标志挂在门口厅堂……但为什么总成不了气候？外国人在挤中餐馆，中餐馆之间又有公开的竞争和暗中的角斗……

据说一位中国记者问一个外国小孩，“关于中国，你知多少？”小孩脱口而出：“中国菜最好吃！”

中国菜确实好吃，华侨在海外最重要的营生就是开办中餐馆。据报道，美国有2万多家中餐馆，法国有1万多家，意大利也不少于1万家，中欧小国奥地利有700家左右。有中国人住的地方就会有中餐馆。

中国与东欧、苏联有近30年的不正常关系，这期间，华沙、布达佩斯、布加勒斯特、莫斯科各都市独一家的中餐馆也改作本地餐馆了。在此期间，苏联东欧也没有与港台发展很多关系，所以，中餐馆也进不来。

80年代后期，有两家官办合资的中餐馆分别出现在莫斯科和布达佩斯。如今，东欧及前苏联地区有一百多家餐馆，多数是华人私人独资所办。今后的发展趋势也是私人投资经营的越来越多，官办的由于诸多原因，一般是竞争不过私人餐馆的。

目前中餐馆的分布很不平均。独联体的亚洲部分增长很快，欧洲部分发展有限。由于物价不合理，办餐馆在一些地区是赔钱的生意。东欧发展最多的是匈牙利，就在首都布达佩斯，平均每个月就有一家中餐馆落成开张。现在，其它国家中餐馆也在不断出现。

中餐馆在东欧和独联体发展潜力是很大的。随着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物价的调整，购买力的提高，中餐馆会有更繁荣的将来。目前，在这片广大的地区，外国菜也只有中国菜站住了脚。中国餐馆就像中国人一样有很强的适应性。

但是，中餐馆的确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已开张的有一些面临倒闭的危险，只有少数几家生意红火，其余大都冷清，盈利有限。

原因何在呢？

官办合资的是没有多大前途的。国情相似，管理流弊也一样；其次，雇员工资起点高（中国的厨师在国外工资差别极大，在日本可拿2000美元左右，在俄罗斯拿500美元左右，相当于1991年俄国总统工资的十几倍）；中国菜原料、佐料从国内进，运费、损失率都很高，成本高，卖出的价自然高，这是目前当地人难以接受的，能进中餐馆的当地人也是一些特殊人物。在日本、荷兰、法国、美国等西方国家里，中餐馆一般不算高档，而在东欧就是堂而皇之的高档饭店了。

私营中餐馆除匈牙利赵氏餐馆集团外，目前没有形成集约型经营管理模式。多半是家庭式经营，“夫妻店”较多，仓促开张，员工业务素质较差。临时在失业的中国人中抓差，大厨师经常更换，没有几家能形成自己的菜系特色。

中餐馆独立为政。由于语言不通，对当地物价、生活水平、服务业网络知之甚少，对中国菜和本餐馆的宣传也十分缺乏。日本餐馆、南韩餐馆在东欧是凤毛麟角，但他们能经常在报纸上发表介绍本国菜优点的文章、烹调制作方法和广告，以此招来不少的顾客，中餐馆不大注重广告作用。

社会安全是这些国家的一大问题，中餐馆常受到攻击。种族主义者、黑手党、贪官污警对开张的中餐馆不断骚扰。早期他们对“中国黑社会”、“中国功夫”之类新鲜词有些畏惧，他们担心中餐馆就是一个黑窝。匈牙利一家报纸在一个中餐馆照片下面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在你品尝到中国菜的可口可味时，是否同时感到了中国黑手党的存在？”这家餐馆就是著名的赵氏集团赵玉伦先生开办的。于是，赵玉伦请律师控告记者侵权，最后以记者登报声明文字与图片无关而告终。在看到众多的中餐馆的虚弱本质后，那些中餐馆的天敌就像虎对驴一样狎而攻之。白吃，敲诈，砸门牌、橱窗、门灯，污辱中国女服务员，偷餐具，耍酒疯，寻事斗殴的事层出不穷。说理，找谁？本国人向着本国人。找律师，他要的律师费比你耍的赔偿费多 10 倍。

最令人伤心的是中国人之间的内斗。商业竞争以质量取胜的风气在国内还没形成，出了国就更是各显神通了。互相诋毁对方的名声，封锁信息，降价竞赛，唯我正宗。结果是两败俱伤，外人得利。

内斗方式还有两个绝招：

A 馆老板为了抢次日节日的生意，派某当地人到 B 馆去“预定”包席。说是某团体 100 多人明日要在此开宴会庆祝什么事，为守信，还交了 10% 的定金。B 馆从当天下午起，接单采购，当夜加班突击，第二天一大早就挂上免进牌，专等“包客”。一等就是一天，哪有一个“包客”的影子？菜都浪费了，直接损失 2000 多美元！

还有一招是利用当地人的仇共心理，散布谣言，说对手的餐馆是中共派到东欧“反和平演变”的据点，对手老板是中国的 KGB 等等。直到当地反共分子砸了那家餐馆，这边就开宴庆功。

至于派自己的人到对手馆子低薪求职刺探情况，甚至破坏的事，都是惯用伎俩。中国人向来与人斗其乐无穷，准确地说，是与中国自己同胞斗其乐无穷。

中餐馆的老板们有的连自己在当地的居留身份也成问题。所在国哪一环没有打点到家，说不准哪一天就要被驱赶，这样，巨大的投资就白白地扔进了多瑙河。而雇员大都是打黑工，不交所得税的、没有居留身份的人，人心惶惶。老板自身不保，雇员应付差事，管理质量无从谈起。

中国饮食本来就存在一个改革的问题。在时间就是金钱的当代社会，中式点菜在国内符合中国特色。外国人大都不愿把时间放在吃的上面，营养要求一样要高，所以，中式菜一定要向快、标准化方向发展。同时外国的东西，美国的麦克唐纳快餐为什么门庭若市？人家的汉堡包、土豆条、可乐、冰淇淋营养不过如此，可是，人家的速度、卫生、管理、标准化的操作及服务，就是能够吸引人。

卫生、服务质量是饮食业的生命。中国人刚出国门，就把国内不好的作风带了出去，严重影响中国菜的声誉。中欧某国某记者，在报上图文并茂地揭露了某中餐馆服务员把顾客喝剩的名贵酒，倒回瓶内再摆上酒台的丑事。外国人读报率是相当高的，中餐馆名声一落千丈。

国外很难找到用公款大吃大喝的好事，中餐馆的生命力在于自己的改革、创新、科学管理和良好的名声，而不是千篇一律的龙凤标志和大红大绿的民族色彩，更不能靠招聘几个漂亮的中国姑娘就能把顾客吸引过来。在国外，严肃而高档的餐馆只用男性服务员，他们会讲当地话和国际性语言，如英语、法语等，服务周到，有礼有节。

在投资办餐馆前，要清楚了解当地经济、人情关系，本身实力和法律税收等情况，不可把国内一套东西照搬到国外，更不必以吃喝来拉关系。因为贪官污警是填不饱的，他们的胃口只会越吃越大，最终受害的是餐馆本身。布达佩斯有一家中餐馆的老板第一次请来一个下级警官白吃，第二天警官就带来全家，一周内又请来警署的一帮同事。老板为了获得保护，不得不笑脸迎送。不久，这名因酗酒开除的警官被开除了公职。一天，他可怜巴巴地到餐馆一坐，见老板势利眼不让白吃，一恼一怒，把酒台砸了个稀烂，还伤了一名服务员。遇到这类事，哪儿说理去？

第十一章 跨国婚姻面面观

空中的大气，地下的石油，还有人间的爱情，这三者是没有国界的。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异族间联姻应受到人们的尊敬。聪明漂亮的混血儿不应受到歧视。

对这些简单道理，恐怕没有异议。

然而，现实生活中那些并非完全建立在爱情基础之上的跨国婚姻，就另当别论了。

现代中国与东欧诸国的姻亲情况大概有下面几种：

一、东欧留学生在中国结识的朋友发展为配偶，同样中国留学生和在原苏东各国也与当地异性由恋至婚。

二、原苏东国家在华外交官、专家、中东铁路员工、驻中国东北之苏联红军与中国姑娘的婚恋。

三、自 1989 年以来，苏联、东欧的小商人（中国人称之“国际倒爷”），从北京带走的女性。这种结合，爱情成分相对较少，大多是以带出中国为条件的。当然这与完全是金钱关系的老夫少妇也不一样，因为能长期在国际铁路上搞跨国贩运的大都是青壮年。东欧小伙子对中国姑娘有一定魅力，中国姑娘也令东欧小伙子倾慕，心中喜欢就说爱对方，由认识到结婚出国，用不了多少时间。

四、近年来出国的中国人为了移民东欧而嫁娶当地人的情况。这里半数以上是纯商业性的交易，交几千美元，办一个假结婚证（不少已婚中国人还能花 40 美元左右买到一个假未婚公证），移民手续办完后就离婚。跨国“婚姻介绍所”已是东欧一个公开行业，生意一直不错。

（一）来自大连的老大娘

她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失去了东北姑娘天生的勇敢和泼辣。遥想当年，年轻的蓝眼水兵说“我爱你”；遥想祖国，卢布不够半程的路费。

1991 年初，笔者在莫斯科街头买东西，见到一个来自制酱菜的中国老太。一瓶卖 5 个卢布（当时 1 美元换 30 卢布），生意清淡。前去一问，老人中国话已说不流利了。同行的翻译用俄语与她交谈，原来，她的俄语也不怎么样。中国文字她是忘光了，比手画脚两个多小时，笔者才听完她的故事。

大娘今年 60 岁，大连人。18 岁时在某基地当服务员，与一位高大而英俊的苏军中士认识并由热恋到结婚。

“当时结婚也很难。”大娘回忆说。

不管怎么难，还是恩准了。苏军离开东北，她就跟着中士回到了苏联中亚某加盟共和国。中士在部队干得还不错，回国不久就提升为少尉。不过，官是越做越大，而他对妻的态度也就越变越坏。

“到了国外我又没有娘家势力，没有语言也就没有社会活动能力，只能在家里侍候他和几个孩子。伊戈（她的丈夫）最早认识我的时候，说东方姑娘哪儿都比苏联姑娘好，可生了孩子，”大娘一笑，“就不好了，什么都不好了，脸更黄了，眼也没神了。”

“他酗酒，打我，说我只花他的钱。他在外面有不少女人，我要离婚，

又不知找谁告状，不懂语言，我成了一个哑巴。他不再称我‘漂亮的小鸽子’，而是骂我蠢，骂我黄皮母狗。”

翻译女士插话说：“你怎么不找中国大使馆？”

“找了，”大娘说，“没用，我已丧失中国国籍，中国大使馆不管。”

大娘的丈夫 1968 年随军到过东欧某国，去镇压那里的“反革命暴乱”，受了重伤，回到苏联，受了勋章。“现在退役在家，这一改革他每月养老金吃不了几天，孩子们都单过了，我又没有工资养老金，就这么将就着过。”大娘说。

“他还打你吗？”笔者问。

“他还打什么？瘫在床上，没酒喝就装疯，我现在也不怕了。”大娘略有一点儿得意。

“像你这样情况的其他中国人，你都了解吗？”笔者问。

“刚来时，有不少华人随军家属还串串门，后来各有各的难处，那些姐妹彼此也不走动了。有的离婚回国了，有的死了，有文化的混得还不错。早期和我是邻居的一个姑娘嫁给了一个苏联军官，她丈夫后来当了将军，到阿富汗国打仗，死得很惨。现在的领导人说那场战争打得不对了，死的就白死了，活着的家属连个抚恤金也没有。物价这么高，卢布不值钱，她怎么活？死在家了。十几天后才被查电表的人发现了。”大娘伤心了，但没有眼泪。

大娘的唯一心愿是回大连看一看故乡亲人。她后悔在 1992 年元旦以前没有下定决心。笔者第二次在街头遇上她时，是 1992 年 2 月初，由莫斯科至北京的车票要 153 美元（上涨了几十倍！）。153 美元相当于 2 万卢布，她丈夫的养老金每月不到 1000 卢布。“现在改革了，有本事的人能倒卖东西，工厂、商店里的工人也偷出东西到自由市场上卖。我那老头子没有任何本事，我又没有正式工作，只有等死了！”大娘在苏联活了快 40 年了，说话声音很低，且不时东张西望，总怕有人听见似的。据说，过去在苏联的老华侨大都曾被 KGB 监视过。

这位大娘的境况绝对不是最差的。一位入籍苏联 30 多年的华人老工程师说，她的一位女同学在嫁到苏联后不久，受不了同事的歧视和丈夫的虐待，发了几次脾气，被关进“疯人院”，至今还没死，但彻底疯了。

东西方民族传统不同，风俗习惯也有很大差异。欧洲人不像东方人那样含蓄，一眼看中，也不管对方是否结婚，就要求爱。小伙子会在认识姑娘后十秒钟就说“我喜欢你，我爱你”之类的滚烫的语言。现代姑娘喜欢这样的浪漫和热烈。不少老一代华侨都说：“他们说爱你或喜欢你，千万不要理解为‘我只爱你，我只喜欢你’。”在东欧的一些没见世面又没读什么书的中国当代女青年就有深刻的教训。

（二）北京和华沙姻缘

“一见钟情”是世界上任何角落少男少女的倾心相恋的爱情公式。“一见钟情”之后，又该是什么呢？

小迪原是北京秀水街附近一家杂货店的店员。秀水街是外国人常光顾的市场一条街。她 23 岁，已婚。关于她丈夫，她是这样评说的：“哪儿都好，就是少点热情，太听话了，没意思。”

笔者初次认识小迪是在国际列车餐车上。这时她已冲破重重阻挠，离婚，并与一位波兰商人结婚，与家人断绝一切关系，办了护照。总之，已经登上了国际列车。

她连一句英语都不会说，更甭说讲波兰语了。只是她的新夫学了几句汉语。说来好笑，现在她急需翻译是想进一步了解她的丈夫。

“你问他，他是真爱我呢？还是随便？”小迪求笔者说。

笔者如实问她的丈夫。她丈夫喝得眼红红的，只用中文说：“中国姑娘，好，好！”

没办法谈下去了。笔者好奇地问小迪：“你怎么生气了？”小迪说：“他的那帮倒爷朋友都来要和我那个那个，他也不管管，什么意思！”等笔者扭身再问她的丈夫，她丈夫正端着酒找另一个中国女士调情。不过，那位女士身边有一位中国先生，这位中国先生边骂着边飞起一脚踢在小迪丈夫的肚子上。小迪丈夫这才悻悻地回车厢去了。小迪气得国骂都上来了：“到了华沙我就跟他离。”

“离了怎么办？”笔者问。

“走一步说一步呗！”小迪说。

再次见到小迪时，笔者几乎都认不出来了。时隔半年，她是“一步一步”走到了东欧另一个国家的苏联大使馆，她要办过境鉴证回中国。笔者问她丈夫可好，小迪只说了一句：“他妈的，不是东西。”据小迪说，在华沙，她认识的远嫁波兰“倒爷”的中国姑娘有十几个。

（三）婚姻介绍所见闻

做媒是成全男女的好事。可一旦与商品经济挂了钩，就能引出很多的故事来。无论中国人在东欧将来会怎么样，反正介绍东西方婚姻的公司一时是不会倒闭的……

根本不懂外国语就跟外国人同居或结婚的人，部分是形形色色的婚姻介绍所促成的。有一个以“介绍婚姻”为营生的公司就这样草率地办过几十件跨国“好事”。

小汤到东欧较晚，办身份已很困难，她要办一个假结婚，给介绍公司 300 美元，给“丈夫” 1500 美元，条件是办完移民证后立即离婚。“丈夫”是一个 50 多岁的离异者，他也有一个附加条件，当着众人的面，他讲了一堆谁也听不懂的当地话，边说边用手式解释他的“条件”：左手食指和拇指围一个圈，右手食指插入抽出圈内几个回合。众人都很难堪，小汤只说：“别理他。”

小汤也是有夫之妇，丈夫在国内。她的未婚公证是花 70 美元在当地买到的。小汤终因该国一律不给中国人移民而前功尽弃，而她的“丈夫”不仅得到了 1500 美元，还满足了他的附加条件。不过小汤也免费找到了吃住之地。后来小汤要办离婚手续，对方不同意，上了法院。后文就不知了，可以推想：小汤再到其它国家之前，必须处理完这件事，哪怕花几百美元请律师，否则，在法制国家里，犯重婚罪是要坐牢的。

华人通过联姻解决移民身份问题是很常见的。周先生也是如此。

周君的未婚公证是北京市公证处出具的，他要婚姻介绍所介绍一位漂亮的东欧姑娘并且能帮助他移民，他出价较高，介绍费给 2000 美元，给姑娘

3000 美元，移民费用在外。他很顺利地娶了一位当代漂亮的单身女子，并把她带回国内探亲一次。美中不足的是俩人没有能共同交流的语言，日常生活靠比画加表情，商讨重要问题还要请翻译。

另外有一个新开张的婚姻介绍所，曾接待了一对中国夫妻，他们都买了“未婚公证”，又各办了一次“买卖婚姻”，然后都拿到了移民证。如今，夫妻二人都去了西欧。

（四）惨遭毁容的“杨”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攀登爱情之巅时，这句古诗或许能指点迷津……

小杨在摆摊时结识一个男朋友叫尤利。她一眼就看上了他：一米八五有余的身材，一脸英气，满身性感，他那宽厚的胸肩给人以“绝对的安全感”（小杨语）。一问年龄，才 24 岁，比小杨还小 4 岁。初次见面后，两人就约期幽会了。

尤利没有职业，也没有住房，小杨在佩斯八区租了一个单间公寓房。搬走那天，原来的同伴都不知道，还以为小杨失踪了呢。

这尤利酗酒成性，还有制妇奇术——有人也许适应，对小杨未免就是性虐待了。同居第二天晚上，尤利就借着酒性，把小杨扒光衣服绑在长凳子上，用胶布封住嘴，尽意胡来。末了，还把酒瓶砸碎，用碎玻璃把小杨从头脸至脚心割得皮绽肉裂，鲜血淋漓。酒稍醒，尤利也慌了，为了灭口，他竟然操起另一个酒瓶猛抡在呻吟的小杨的后脑勺上，然后用地毯连尸带凳一裹，拿走小杨钱包和钥匙，关上门扬长而去。

谁知这位杨小姐命大，并没死，到第二天晚上，她居然活了过来，只是嘴封身绑上下是血，求救无应。偏巧，这天晚上房东来送一只门廊灯泡，才发现奄奄一息的小杨。

活是活过来了，房东写了一个索赔单子：毁坏家具 6 件、毁坏地毯 1 张、房锁、楼道锁、大楼安全门锁等总共价值 2600 美金。警察局还以“卖淫”为名拘留了刚出医院的小杨，凶手逍遥法外，小杨还不知如何投诉。7 天后小杨出狱，可护照被房东扣留，房东要她赔偿损失。

一个月后，一同出国的伙伴们在街上看到了满脸疤痕的小杨，大家凑钱从小杨房东那里赎回了护照，并让她搬回来一起住。

小杨接着摆摊。在自由市场的角落，满脸伤痕记载着她的得失。

（五）超生“游击队”在国外

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续集是，“吐鲁番”姐儿仨又有二十几个弟妹，名字叫：“华沙”、“基辅”、“布达”、“索菲亚”……

仅仅为了多生子女而出国的人自然很少，而在国外多生是可能的，只是，国外谋生困难，一般人不愿多养孩子。

有一个访问学者和他的妻子不得不延期回国，原因是他妻子来保加利亚探亲期间又怀了第二个孩子。如回国，只有做人工流产，否则公职保不住。

在国外出生的孩子，一不占国内生育指标，二则可以申请外国护照，将来有出入自由。

Q君是极少数为了多生一个而出国的女士。她的丈夫在中国算得上是“千万级”富翁，公婆都是高级公仆。丈夫是独子，Q君头胎生个丫头，眼看革命的香火就要断在她的手上，Q对丈夫发誓说：宁可开除公职也要给夫家生个儿子！丈夫一家是明白人，多生一胎可不只是一个人的公职问题，而会毁了一家老小的前途。想来想去，还是丈夫买了一本旅游护照，把妻子送到了东欧某国。妻子过去后买房置地，注册了一家公司，取得了当地居留身份，再邀请丈夫出来探亲。1991年秋，争气的Q君终于生下一个儿子，接班人问题自此无虞了。

东欧有的国家禁止堕胎，这样，中国人无论是合法夫妻，还是一般同居的（有人称是“膀肩”，也有人称“抗战夫妻”），一旦有喜，要么忍耻回国堕胎，要么就地生产，由此而出现了“超生”问题。

相比之下，在国外生孩子没有指标，户口等麻烦，东欧生活水平较低，卫生福利条件也不错，抚养也不难，只要收入有靠，一般中国夫妻是希望有两个孩子的，这跟当地人可不一样了。东欧诸国晚婚、不结婚的多，婚而不育的多，生一个孩子还能领到国家补贴，多生多奖。

（六）夫妻店

不要一看见中国年轻貌美的女孩子远嫁“老外”，就捶胸顿足地大发牢骚。中国小伙子娶了年轻貌美的“洋妇”，绝不像《天方夜谭》中的故事那样遥远……

尤迪今年21岁，可她已经有过了一次婚姻。一年前，丈夫酒后开车出事丧命，留下了几瓶剩酒、无业的尤迪和三间住房。寡妇失业的尤迪把母亲接来家住。母亲是离婚索居的，40岁还差一年，在街区房产委员会打零工过活。尤迪在家门口摆摆小摊，日子苦一点，倒也十分安逸，有时母亲出去约会男朋友，尤迪还笑着帮她打扮一番，末了，借亲吻母亲的机会，尤迪对母亲说：“小心，艾丽，喝酒的男人不是有寿的，你可不能嫁给他。”母女活像一对姐妹。

一天，房产委员会来了一位中国人，他个头不高，皮肤黝黑，当他看到在门口倒碎物的艾丽时，便走上前来打出一张名片，上写“远东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后又亮出一张已经请人用当地语言写好的纸条：要租一家商店，出售中国轻纺产品。艾丽读完名片和纸条，就把张拉到一边，两手一张一合，表示问要多大的房子，张就拿笔写了“15—20m²”。艾丽点点头，边用笔画也说：“我家有一处不错的房子，离市中心很近，一间最大的临街，有12平方米。”张虽听不懂，倒也明白了大意，尤其是艾丽在掌心画了一个“12m²”以后。

一件本来公办之事变成了一件私下交易。张立即叫出租车同艾丽回去看房子。

房子不大，位置很好。张的“头衔”很大，本钱却很有限。一人独办公司，注册款的一半还是借的，注册完了就还了，剩下的兹罗提可以号称上亿巨额，可折成美金就不值一万了。张的理想就是照着他在北京的模式在华沙

再开一个铺面。

艾丽母女俩的楼上住着一位半瞎的汉学家，曾在中国工作了8年。老来无事，常与邻里谈谈东方的美食、美事或美德什么的，这使艾丽母女对中国人有了好奇感和一定的信任。

艾丽把张请到家中，让尤迪请下来汉学家作翻译。汉学家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带点山东口音，原来他的汉语启蒙教师是山东人。张记不住汉学家长长的名字，既然尾音有个“斯基”，双方一致认为，就叫“好司机”好记。

通过“好司机”，张租下了尤迪的临街一间12平方的房子，每月租金300美元，相当于艾丽半年的工资，张一次交了半年的租金。从即日算起，不用签合同，勤劳灵巧的张不到一周就把一个小铺面装修完毕，商店正式开张了。为了省钱，他索性退了原来租的住房，把二十几包从国内带来的货存在尤迪家的里间，白天开张卖货，夜里就在店里打铺睡觉。

起初，尤迪仍旧在门口摆小摊，可顾客一到门前就被张氏店内的各种鲜艳夺目的中国商品所吸引。尤迪一家两口靠房租就过得不错，也不在乎张“抢”了她们的的小生意，相反，她们希望张的生意越办越好，只要张不走，母女不用上班，生活也可以“小康”。张的货销得很快，晚上总要去一些华人批发公司上一些新货，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尤迪常常为张做点吃的，张也把一些装饰品、中国丝绸什么的送给房东母女，时间一长，尤迪完全就成了张的后勤。语言不通，不碍事，张要吃牛腿肉，就对尤迪这样比画：两拳放在脑后，突出大拇指表示长了角，口里发出一声牛叫。尤迪笑得弯下了腰，张还指了指大腿，手作刀状一劈。尤迪不一会儿就买回了牛腿肉。

像东欧不少女孩一样，尤迪也抽烟。一天，张夺下了尤迪的烟头，咳了十几声，摆摆头，尤迪点点头，表示她也知道抽烟不好。从那天起，尤迪就真的不抽烟了。她在张身上每天都能找到新发现：他不抽烟不喝酒，不逛街不赌博，拚命工作，进货卖货。这个地段销售得快，不少批发货的中国人主动送货到店，张氏“远东”小店月纯利近2万美元。

踌躇满志的张通过“好司机”告诉尤迪，想正式雇她为店员，每月工资500美元，尤迪惊喜的连忙答应。自此尤迪主内，除销货外，还帮张做帐，上税，还做饭。张包上货，有时还批发给其他中国小贩。尤迪对中文产生了兴趣，张可不愿白教：“我教你中文，你要教我波语。”一拍即合。

一晃半年过去了，“远东”店生意渐渐有些淡了下来，原因是货源不对，张决定亲自回中国采购货物。尤迪母女准备了一桌丰盛的话别晚餐，临行前，尤迪问张：“你结婚了没有？”张说：“结过，两年前离了。”

尤迪没问为什么，可张陷入了深思。10年前，张就是北京个体户中闻名的“服装大王”，他与一个常来的顾客，年轻貌美的女大学生恋爱结婚了。婚后，张一心做买卖，妻一心要复习英语准备出国。结果，妻子留洋，一去不回。张拿到离婚证后也发誓出国看看。为了争这口气，张交给朋友一万美元办了护照签证。

分离的20天对张和尤迪来说，好像过了几十年。张回国后，周围想与张一起出来的女孩子何止十几个？可每当他想起纯朴美丽的尤迪时，他就打消了各种念头。那边尤迪天天守着铺子，张的一什一物都是那么亲切。勤劳聪明的张，使她再次体会到了思念的滋味。

张走前说要一个月才能返回。提前返回的突然让尤迪高兴得跳了起来，俩人紧紧地抱在一起，彼此轻轻地说：“我们再也不要分开。”

“远东”商店成了跨国夫妻店。尤迪由张的房东和雇员变成了张太太。

(七) 跨国分居者

贾宝玉吟唱过“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一位在东欧的浙江人却吟唱着“女儿贱，悔逼夫婿多赚钱”。

绝大多数出国的在婚华人没有带配偶。

北京火车站国际列车候车室。星期三早上7点、星期五晚上8点，往莫斯科方向的3次、19次列车启动前，难舍的拥抱、无声的泪水，无限的恩爱缠绵，这分离的场面感人肺腑。直到列车启动，才想起还有千言万语的嘱托，列车带走了爱人，留给站台上妻子、丈夫、恋人的是无期的盼望和担忧。

目睹这摧魂断肠的场面自然不好受，但旁观者大可不必为此伤心，一是他们久别的重逢自然会带来另一番爱意，二是此一分别，为的是更美好的生活，为的是赚更多的钱。至于赚钱会带来什么副产品，那就自得其果了。贾宝玉说：“女儿愁，悔教夫婿觅封侯。”可巧一位叫阿进的浙江人给笔者讲了一个故事，题目可叫：“女儿贱，悔逼夫婿多赚钱”了。

阿进认识一对夫妇，丈夫姓祝名福，钱不多，但有一副运动员式的身材，文化不高，却有一个大专文凭，这很能吸引一些出国的中国富女。阿进上火车前看见祝福的妻子在哭，祝福也眼中含泪。阿进、祝福还有一个叫康庄的女士共一个包厢。康庄是北京兴旺大街出了名的成功的个体户，30岁左右就是百万富女了。她把北京的天下交给了丈夫，只身到国外“闯一闯”。头12个小时，三人在车厢里和睦相处，谈天说地，天下事能说的差不多都说了，想一想漫长的路，茫茫的前程，三人过去虽不相识，但相似的命运却使他们同病相怜，话也显得更加亲切投机。阿进是南方人，北京话说不来，也听不全，渐渐地就退出三人话局，那祝福和康庄穿得很薄，后来俩人目光也炽热起来，阿进全看在眼里。车到哈尔滨，康庄就说车厢太热，还说隔壁包厢都是空的，阿进虽未结婚，男女之事知道得比结过婚的还多。他早就留意这二人眉目传情，挤靠缱绻，此时他正好让位退场。阿进给俄国列车员，塞了二百卢布，就搬到了隔壁一间空包厢里。阿进讲到这时，就起个死誓说，他们俩当夜就有云欢两爱，“因为，”阿进接着说，“第二天凌晨过了国界，苏联边防海关就开始搜车厢，他们可比中国方面严多了。你瞧这俩儿干事也忒大意，完了也不打扫，弄得俄国海关人员硬是怀疑床头几团卫生纸包的是毒品白面，哪里是什么白面，倒有几亿个情种是真的！”

这小祝、小康一出国门就结成了膀肩儿，彼此照顾、相依为命。俩人租房在一起，进货卖货在一起，和谐默契自不用提。这康女士是有经验有胆魄的，她出资租了一栋小楼，在莫斯科开了一个旅店，她当老板，让小祝前台经营，生意很红火起来。小祝每月托人给在国内编什么杂志的夫人和孩子带来钱物，她夫人见人就夸丈夫敢闯。夫人每周至少有两封厚厚的信寄到国外，鼓励丈夫好好干，好好学，她在家“要把孩子养好，长大出国帮你一把”。康老板一日翻到这些信，同祝大吵一顿。后来，一个国内出来的穷研究生来找康老板求职，康见此人文水平高，会讲俄语、又老实，就纳为新宠。随后找个岔儿，给了小祝一笔钱，让他滚蛋了。这小祝原来给朋友吹牛自己开饭店，这一下羞于回国见人，就从一国混到另一国。手中有几个钱，倒不敢

赌，但失过脚的人是不大怕摔第二跤的，他开始嫖了。先是养了一个新的中国“膀肩”，后来初试了一下洋妓女（价钱更优惠），渐渐就把几个子儿风流光了，又得了那死不了活不好的风流病。妻子给他写了很多信，他也回了一封，说是：商场如战场，最近受了挫折，希望产生于“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

有认识小祝的人说小祝的妻子太苦了，像阿进这样知道内情的人却不这么看，说：“她早知道了，如今也打自己的主意喽！”

更多的传统型夫妻可没有祝、康那样开放，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普通中国人一次买不下两本出国护照，只好忍状分居之苦，各自保重自己了。华人在东欧最爱唱的歌儿之一是：“没有我的岁月里，你要保重你自己。”

还是阿进的故事多。阿进自己的买卖越做越大了，就雇了一个来自中国北方的男士做帮手，这帮手与中国内地的太太分得太久了，阿进发觉他常有“指头上解消乏”之事，就给他钱让他“打鸡放松放松”。据阿进说：东欧鸡比中国鸡便宜多了。阿进讲他帮手的故事，他的帮手就在他面前。阿进讲完了，他的帮手又讲阿进的事迹。阿进说：“我和你不一样，我是单身自由者。”

第十二章 华人与卡西诺赌场

(一) 华人输钱何其多？

答案是超过一亿，不是人民币……

到 1992 年元月，东欧各国都有了赌场 Casino，几乎都是德国老板开的，最早也是最有名气的当数位于布达佩斯市中心的“帝国卡西诺”。布达佩斯一市还有四个大赌场，原来的“四川饭店”因饭店停办也被赌场老板包下来开了张。

赌场是利用人们侥幸发财的心理坑人钱财的地方。有赌史以来，没有听说有人靠赌发财的，也没有听说哪个赌场老板不发财的。关于赌红了眼造成家庭、社会悲剧的事例不知有多少。东欧华人中关于赌的故事也足以写一本专著。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东欧赌场半数以上顾客不是本地人，而是华人。有人说，这些赌场总共吞进了中国人一亿美元以上的财物。在匈牙利问中国人，著名的历史博物馆在哪儿，知者甚少，而赌场位置几乎是无人不晓。奇怪的是住在赌场附近的很多匈牙利人对赌场竟一无所知。

赌呀赌！赌场每个轮盘四周，每个牌桌外侧，每个老虎机面前，每天从开门到关门，都能看到我们的同胞，中间夹杂一些来自西方、阿拉伯的赌客，却很难找到所在国的顾客。每个赌场的服务员都必须会用中文说：“你好！”“祝你运气好！”“赢了吗？”等问候语。“帝国卡西诺”赌场索性雇了一位中国女士做广播员。一位朋友说：“要没有中国人，赌场开不了多久就要关门。”赚中国人钱最多的“帝国”老板终于从 1991 年 10 月期间开始为赌客们免费提供酒和快餐了。

论起人生，也无处不含“赌”的含义，但这种“赌”与赌博有质的区别。总统候选人花大精力参选，当总统的希望不也是二分之一、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商场上，哪个商人敢说买卖就稳操胜券？战场上，将帅们调兵用计，战争就一定能取胜？还有决斗场上、考场上……每时每刻都在“赌”。大凡有开拓精神的人，大多是敢输的勇士。

这么多中国人到东欧，绝大多数都是首次出国，能跨出国门，也需要一种勇气。但谁敢在出国前就夸口一定会衣锦还乡，这也称上一种“赌”吧，一种人生的博弈。

赌钱本身，百害而无一利，世人皆知，但赌场却从未绝迹。国人的赌义岂在海外，日益兴旺的“垒长城”就席卷了中国大江南北，男女老幼。

东欧华人进赌场也有不赌的。因为这里也是约友、打听信息、谈点买卖的良好场所。赌场是较文明安全的地方，决不是电影里描写的魔窟一般的黑暗天地。正相反，男士不著西服革履，女士衣裙不整的是进不了大门的。由于语言不通，中国人看的电视、电影、戏剧与看无声片无异，到赌场来，中国人之间讲个话解个闷也不失为一种消遣。即使赌上一把，只要不上瘾，也是一种娱乐。

中国人就是聪明，时间不长，便发现一些赌场有“穿门牌”的空子可钻，不赌也可以赚 5 马克，相当于一个人一天的吃住花销。原理是：花 10 马克买门牌，门牌当码子，如果赢了，可得 15 马克；这样如果买 15 马克的码子与

门牌对押在二分之一胜败可能的格子里，无论哪一注胜，都得 30 马克，扣除门牌加码子 25 马克，一秒之内就赢了 5 马克。有人觉得摆摊费力不赚钱，索性每天来“穿门牌”，就像每天要“上班”一样。5 马克，聊聊天，免费喝一杯干白，吃一盘快餐，何乐不为？但问题也有，不少人原是为“穿门牌”下赌场，然后出于好奇试赢，胜了还想胜，输了还想捞回本，结果，几个月穿门牌的几百马克又在几秒钟之内输个精光。赌场老板原想用 5 马克吊一下初赌者的胃口，后来发觉中国人每天几百人来“穿”，就索性取消了这一优惠。这样，如果在盘上出现了零，那么就可能白丢门牌。其中细节，不必多述了。以穿门牌为业的大多是北京人。

动真格赌的中国人就不光是“大款”们了。赌技是最易学不过的了。三种轮盘，一看就会，十三点牌局，老虎机，无师也可以通。百分之一的人当天可能赢几万马克（这不等于说他每天好运），这消息一传，多少人不想去一赌！赌客的想象力是极丰富的。结果呢？据一位福建朋友讲，他的一个朋友是输了 30 万美元的，他本人也输了 3 万美元。中国在东欧赚了钱的人是不不少的（无论是赚中国人的还是赚外国人的），但最后拿回中国的钱是不会多的。钱到哪儿去了？正常开销外，就是被警、匪掠抢，被人骗抢，最大的损失就在赌场。到 1992 年 5 月底，至少有成千人因赌光了钱，连买回国车票都买不起，仍然滞留在东欧几个大都市。细心的人偷偷观察收场后赌场老板的流水账，每天晚上一个赌场平均有 20 万马克的收入，这其中约 50% 是中国人输的。所以，有人估计，中国人在东欧列国十余个赌场共输了至少一亿美元。1991 年，中国发生大水灾，匈牙利人为此向中国捐了 1000 万福林（约 13 万美元），而在匈华人总捐款不足 1 万美元（根据《旅欧导报》第二期第一版报道）。

（二）赌场以外的故事

中国的“长城”搬出了国外，赌红了眼的中国人六亲不认，什么事干不出来？

费君到达匈牙利时身上只有 50 美元了，受朋友的启发开始“穿门牌”，白赚了 5 马克。第三次就手痒真赌了，连连大赢，2000 多马克就到了手，如果就此打住抽身，他就可以把买护照的钱抵销了。可是，想不赌就好比戒毒一样难。第二天，第三天接着赌，还真算他走运，上万马克进了他的腰包！

此时的赌客每个细胞都充满了赌的基因。接下去自然就是一夜输光所有的马克和仅存的 50 美元。

赌徒输后心理是不服。“胜败乃赌家常事”，孙子的后代是不服这口气的。

死乞白赖地向同屋朋友借了 500 美元，再次下赌场。他不信他再就不会有更辉煌的战绩。

头一夜赚回 100 美元，他得意了。

第二夜，600 美元尽输无余。

朋友不再借了，还要他还 500 元的债。

费君于是就动了心机，不是对债主，而是对自己新来的表姐夫。

费君的表姐夫带来一万美金注册公司，做贸易的赚了一些，姐夫坚决反

对他下赌场。费君赢钱时曾在表姐夫面前炫耀过，表姐夫一气之下赶他出门。费君在中国人面前到处骂表姐夫六亲不认。二人反目。但他在走投无路时又来找姐夫。因表姐夫与女“膀肩”的事被他抓住了把柄，费君就以此讹诈，表姐夫不得不给了他 2000 美金。费君一夜就输给了“帝国”。事后，他在表姐夫面前痛哭流涕表示再也不进赌场，乞求收留。表姐夫无奈，让他搬了进来。

一个月过去了，费君果然不赌了，姐夫也就放松了戒备。

某日，表姐夫一早起来，呆了。人不见了。保险柜大开，钱，贵重的中国古董（偷带出国的），都不见了。

红了眼的赌徒是六亲不认的。偷、抢、骗、杀人越货。布达佩斯那些被谋杀的中国人，据警方分析，多半是被中国人杀害的。个别自称知道内情的人（他们当然不会向警方报告以免自己卷入无休止的传证事务中）声称，某案中的凶手就是赌输不能自拔的中国人。

被赌场扭曲了人格的国人常在赌场受到侮辱。

一位好奇的中国记者想到某赌场采风，刚进赌场大门口，就看见一个粗壮的门卫汉子像老鹰捉小鸡一样把一个中国女子提出门外，扔在了街上。原来，她穿的旅游鞋不符合该赌场的要求。这位中国女子还用中国话骂赌场守门人，反正别人也听不懂，在门口排队的其他中国男女视而不见。这位记者一点儿采风的兴致也没有了。

赌场有赌场的规则。然而，据赌者自述，赌场老板经常赖中国人的帐，明明中了，偏说没中，这里又没有仲裁人员，语言又不通，中国的赌客们根本不相互帮助。一发生争执，老板的几个保镖不由分说，就把中国人架出赌场。一个中国赌徒在人群中高喊要炸掉赌场，反正外国人听不懂，中国人理解这种阿 Q 式的口号，听了跟没听见一样。

谁能理解白天辛苦地在太阳底下摆摊卖得的一点钱，到晚上就白扔给赌场呢？外国人是很难理解的。

有人回国内后找到了奇怪的答案。一位在东欧输光了的华人，是借钱回北京的。回家接着赌，从春节到元宵节，清明到大伏，他整天价在家里“玩玩”——麻将而已。一个赌徒输了不服，告到派出所，全抓起来，各使关系又都陆续放了出来，出来就动刀子，一死一伤。

赌，赌，赌，赌客们不是在赌中震醒，就是在赌中灭亡。马尔萨斯再世的话，他要把赌博列为人口自然减员的一个新的因素。

第十三章 华商在俄罗斯

苏联境内的外国人以华人最引人注目，超过 50 万人口的大城市都有了华人。苏联解体后，俄罗斯联邦境内华人最多。

几年前，中苏关系解冻，漫长的边境线顿时活跃了起来，跨境贸易、旅游的苏联人越来越多，中国商人也学着他们走出了国门。先是只在对方边境走走，后来胆子大一点，也敢深入其广袤的腹地。当时，苏共掌权，苏联人民对“契达伊达瓦里希”（中国同志）十分友好热情。

东欧一些国家限制、驱赶华人以后，那里的华人至少有一半退到了原苏联，除一小部分到了乌克兰的基辅和敖德萨、白俄罗斯的明斯克和中亚、波罗的海地区外，其余的滞留在俄罗斯。

（一）阿朋的无本生意

资本的积累方式有多种，无本也能赚大利。阿朋在东欧从囊中空空变成腰缠万贯，此人的生意经是……

莫斯科，当年“世界革命”的中心，如今成了世界黑市交易的中心。中国人以前在这里“取经”，如今在这里“掏金”。

到 1992 年 7 月，莫斯科内务官员提供了一组关于华人的数据：长年在莫市经商的华人有 4600 余人（包括中国官方公司驻莫斯科办事处或子公司的人员——笔者注）。游商 5000 以上，半商半学的留学生（公费和自费生）1340 人。该官员说明，在莫斯科的万余华人绝大多数是持因私护照（有一些人身揣因公因私两本护照），半数以上的人是办“过境签证”而滞留不走的。

过去，苏联政府对逾期不走的外国人一律驱逐（特殊的原因当然是另一回事）。如今不那么严格，只要不触犯当地安全法规，外国人想多留些日子也可以，只是离警察远点。警察查看护照，一看签证到期，会警告你必须离境，这时你只要送点“苏芬尼尔”（礼物），他就还你护照，一笑走了。多半是他主动向你举手行礼后，手不全放下来，而是变成手掌，然后笑着对你说：“苏芬尼尔。”给他一支笔，一块小电子表，有时几块泡泡糖也能打发，大方的中国人给他几个美元，警察会高兴得跳起来。这等于他一个月的工资呀！一位从上海来的庞朋先生还靠贿赂警察发了财。

庞先生衣冠楚楚，但却囊中空空。在中国，上海是最难出国的地区之一，这都是过去“日本热”、“澳洲热”给闹的。庞先生在上海日子过得不赖，花 5 万人民币卖了担保到葡萄牙，路经匈牙利时听说西方不好混，就留在匈牙利做了一些人头生意，不仅赚回了自己出国花的钱，还有不少积蓄。像其他一些上海人一样，庞先生有节制地去赌场玩了几次，见赌场只输难赢，就再也不去了。本想在匈牙利开一个快餐馆，这是因为他看到在布达施卡拉商场旁边有一家“上海快餐店”，生意特别好。可是庞先生机遇不佳，居留到期，警察在他护照上盖了黑章。他被驱逐出境，贩人赚来的上万美元由于没有藏严实，出关时被没收，到莫斯科时已所剩无几了。

庞朋买好了由布达佩斯到北京的全程火车票，并凭此到俄罗斯大使馆办过境签证，到了莫斯科。他想办居留延期，有中国人说只要出 60 美元，就可以帮助他办，可是庞先生的衣袋里只有 40 多美元了。办不成延期，只好“黑”

下来，混混看。

做生意，没有资本，可是，他会讲点俄语——这就是本钱。

警察不找他，他敢找警察，通过警察认识他们的警官上司，送上礼物，先办了自己的延期，后又通过这个“关系户”帮其他“黑”在莫市的中国人办延期。每办一个收 50 美元，给警官 5 美元，其余自得。一个月内，庞先生就办了 80 多个。

通过警官关系，庞先生还能办两年居留证和移民证。莫斯科办这两种证件很难，庞先生就打通外地关系，到边远城市去办，每办一个可赚 800 至 1000 美元。庞先生不愁没有顾客，因为在俄华人有好几万，还有人不断涌来。

庞朋继续做人头生意。

在国内的朋友和家属为庞拉生意，办一份俄国人担保和邀请可赚 3000 至 20000 人民币不等，依地区而论，依办护照难易程度而论。这些文件一旦要中国大使馆认证，价格立即翻两番。认证，不过是要使馆领事部门一个公章，认证了的文件并不等于比没有认证的更真更权威，俄国人认这个，可是国内有的公安机关非要这个，使认证的文件身价倍增。庞先生在莫斯科成立了一家公司，公司“产品”就是一份份邀请书和担保书，部分“产品”还有领事部公章证明该“产品”是“合格”的。做这类生意是阿朋的“拿手戏”，不到半年，庞先生通过办延期、办居留证和办邀请信又“发”了起来。

（二）批发商柳大姐

男人称女人为“小姐”，总给人一种居高临下的感觉。一个女人，如果无论比她年幼还是比她年长的男性，都尊敬地称之为“大姐”，这个女人就不寻常了……

柳大姐今年 40 岁，一般中国人看她像 30 岁，俄国人说她像 25 岁，无论怎么说，她是有魅力的华人女强人。她不仅有风度，还有才干，俄语精通到能分别俄国人讲话带什么方言口音的程度。学了多年的外语的人听外语歌都有困难，而柳大姐听俄语歌词的能力超过了一些俄国听众。

她有个俄文名字，叫尼娜，中国人无论大小都叫她“大姐”。

大姐是文革中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干了听力活，后转行干外语教学工作，评职称工农兵学员受挤，再考研究生又总因政治不及格而三度落选。十几年都没评上中级职称，为了考研究生把个婚姻大事也误了。大姐着实走了多年背字儿。

大姐家住北京东城，东城有个秀水街——东欧商贩们无人不晓的商品一条街。大姐在校教课很松，讲一学期停几学期。在家闲不住，也到秀水街逛逛，与东欧商贩聊聊，中国的摊主们见她能讲外国话就花大价钱雇她做生意。先是每月 800 元工资，后来见她能招来成队客户，货到她手能大包大包地批发出去，就与她分成。她很快就“发”了。起初还到海淀参加学校政治学习顺带领工资，后来就干脆不去了。在摊上站半天的收入有可能超过她一年的薪水。同事们那为了奖金、职称、工资等事勾心斗角，只有开会时大家才正话连篇。口不对心的种种场面，如今在她看来是多么可笑。

1991 年初，在一个苏联商贩的帮助下，大姐到东欧各国旅游了一圈，最后定居莫斯科，在莫斯科大学附近租了一个两居室公寓。大姐开始独立做生

意了。

苏联产品大而粗，中国产品巧而精。苏联人特别喜爱中国的商品，尤其是中国的轻工产品，哪怕质量不过关的，在苏联一般不愁卖不出去。

与华沙、布达佩斯等东欧都市情况不一样的是，莫斯科华人极少“练摊”，货物大都是批发给俄国的商贩。自由市场上中国货应有尽有，秀水街有什么，莫斯科自由市场就有什么，但这里的没有中国人练摊。

秀水街的原搭档给大姐做后盾，定期由白沟上货由北京发，大姐雇用了几个莫斯科郊外比较纯朴的小伙子，免费让他们到北京旅游，只是返回莫斯科时每人要押护十几包甚至几十包的货物。这条铁路偷抢严重，有人押货才能防范。大姐还在莫斯科帮助国内朋友办邀请，不收手续费，只要他们去时押送货。无论是俄国人还是中国人，都乐意效力，他们能出国逛一次，也是一生的乐事。

随着边境对“倒货”人员施以越来越多的限制，大姐不再凑夹克、羽绒服的热闹，抓住体积小、利润大的小商品，如防风打火机、圆珠笔、头针、胸花等。在莫斯科的土耳其、罗马尼亚商贩也定期找大姐批货，批发给他们的价格比批给俄国商贩价更高。在匈牙利、波兰、捷克的中国小贩有时也懒得回中国长途奔波，而在莫斯科找大姐批货。大姐生意很是红火。

雪球越滚越大，不到半年，大姐净赚了8万美元。

出于安全需要，大姐请了莫斯科大学生阿辽沙做帮手。这个出生在立陶宛农庄的青年个头不很高，但壮实健美，忠厚朴实，大姐说他长得和大卫一样。阿辽沙每天在校外一个小广场看书，见一位东方女士出入一个公寓，就主动搭腔。两人认识一个月后，大姐见他老实，就聘他当助手。除上课外，阿辽沙就到尼娜大姐处上班。每月工资5000卢布，是当时戈尔巴乔夫总统工资的5倍。晚上，阿辽沙就在大姐处读书、休息。大姐有时为他炒中国菜吃。

“尼娜，您做的菜真好吃，您就像东方的神仙，会做生意，对俄国文学的了解比我还多，还能当一个主妇，我真崇拜您！”

这天晚上，阿辽沙对大姐说。大姐一边教他用筷子，一边笑说：“快吃，你这个坏孩子！”

“别叫我孩子好不好，我都21了。”阿辽沙抗议道。

暑假到来了。阿辽沙毕业，国家不包分配了，他全日到大姐处上班。正好到了两批“阿迪达斯”运动装（非正牌货）和文化衫，运来运去换了两个库存点，凡搬运事阿辽沙不让大姐另雇人，他一人全包了。到8月19日前，货物全部批发完毕。

8月19日，莫斯科发生了举世震惊的事变。事件发生十几个小时后，阿辽沙随大姐到市中心购物。街上气氛十分紧张，两个人小心地远离游行群众和士兵，街面上交通工具都停开了，两人大步流星往商业区方向走去。

忽然，一队坦克冲了过来，后面还有看不到尾的装甲车，民众愤怒地围了过去。大姐看到此景，大叫一声阿辽沙，就投在阿辽沙怀中。阿辽沙抚摸着她，叫她别怕。大姐拉他快走。阿辽沙坚持不走，嘴上尼娜长尼娜短低声叫了上百遍。大姐没法子，只好依偎着他，深怕失去了他似的，这样直至回到住处。

这几日，大姐不许阿辽沙出门，连楼都不让下，厨房里的食品够吃一个月的。他们讨论的问题完全不在生意上。由生命说到自由，由自由说到爱情。为了不让阿辽沙上街，大姐少不得迁就他些。阿辽沙虽小，但他懂事不少，

不至于遇事莽撞猛来；大姐虽大，却是真情初发，始涉爱河。两人闭门不出，蜜月开始。

大姐随阿辽沙来到了他的家乡。在那里，她得到了大批日用品订购单。从此，柳大姐开始与国内一家有进出口权的公司和其下属的三家工厂合作，联合在波罗的海三国投资建厂建店。在这个由中方独资注册的公司里，柳大姐个人股份占 35%，是最大的股东，出任董事长和总经理。阿辽沙出任经理助理。

（三）旅游商人的生意秘诀

谁都明白旅游是要支出的，中国人在东欧旅游却能谋得暴利，这不能说没有秘诀……

东欧各国政治经济转轨后，东欧成了华商关心的热点。

不只是工厂、公司的负责人想出国，多少机关团体的干部干了大半辈子，别的没想头了，也只想在有生之年能走出国门看一看外部世界，看看外国月亮是个什么样。西方国家去不起，东欧苏联离得近一点，可以坐火车，企业出钱，主管部门沾光，组个团，大家一同逛一逛。改革十年来，个体经营至富者甚多，出国旅游正是他们多年的梦。

旅游公司应运而生。

吕先生名尤，是东北某大学访问学者，期满后没有回国，取得了苏联移民地位，在莫斯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公文纸印好，公章一盖，一份份邀请考察商务的信函便发到了国内。函请内容当然不能说是旅游，只说是参观工厂，洽谈合作项目，甚至可以寄一份某厂的合资意向合同。总之，国内主管出国的部门说要什么文件，吕氏公司都能造得出来。邀请内容中必须写上往返国际旅费由外方承担。

东北某县经贸委劳主任主管外贸工作多年，竟是没出国过一次。如今快到了退休年龄，劳主任再不抓机会，就终生遗憾了。这个县不是开放县，虽设外贸局外经委，但进口出口的有限商品都是省里公司办的。本县外贸口不过是省里的收购站罢了。

吕尤当年在该县插过队，与劳主任有交情。吕尤成立公司后立即由莫斯科给劳主任打了个电话（在莫市打国际长途的价格比中国国内长途还要便宜）。劳主任要吕尤报出组团去苏联考察一个月的价格，吕尤说每位约需 2000 美元，包括路费、住宿、伙食、参观、请客等几乎全部的费用。劳主任一算，2000 美元约 1.2 万人民币，给下属企业分配名额，让每个企业负责人出资 2 万人民币是没有问题的，不仅承担了他和翻译的费用，还有一部分结余。

吕尤发来邀请函和担保书，以劳主任为首的 16 人代表团在 20 天内办下公务护照。吕尤从莫斯科寄来了车票，并让代表团每位成员按单子带两包商品“样品”，厂商们巴不得产品能找到外销渠道别说两包，就是 20 包，他们也愿意带。

代表团到莫斯科前，吕尤在几个大学中招募了几个中国留学生当导游，又预租了三个套间的居民楼。代表团到达莫斯科车站时，吕尤带着两名女留学生早就恭候在那里。

一个月 30 天，12 天在火车上，4 天逛商店（当然这也是商情调查）和自

由市场，与一家冶金工厂谈了两天，达成了一个合作协定书，莫斯科市容参观3天，列宁格勒市、基辅市各玩4天。时间安排得满满的，代表团在莫市的住处由吕尤及几个学生下厨做中国饭，代表团中绝大多数吃不惯面包，能吃上中国特色的馒头和白米饭，都夸吕尤招待得好。

吕尤收3.2万美元，净赚2万，代表团带来30多包“样品”由吕尤代销，利润一半归吕尤，一半分给代表团成员，由他们采购俄国裘皮衣、貂皮帽、西服、呢子大衣带回国内。各有所得，皆大欢喜。代表团所乘的列车回到沈阳停车，劳主任望天叹曰：“我怎么觉得还是咱们的月亮圆一点？”翻译说：“劳主任，今日农历十六，在莫斯科上车是初十。”说完大家一笑散了。

中国沿海地区享有特殊政策的优惠，内地不少地方很是不服。“同在太阳下，人为地让一片地方日照长一点，而在另一片地方制造阴云。”这是某市副市长路过莫斯科时对吕尤的抱怨。副市长和吕尤是77级同班同学，他此行是去东欧某国参加一个展览会的。出差时间短，特意会见老同学吕尤，除鼓励他好好干外，与他达成了口头意向：让吕尤代办邀请，副市长回国后，将分批组织所辖数万家企业中的2百多个优秀企业负责同志来苏考察。一则早日开拓苏东市场，二则鼓励他们工作中有成绩的人。这些赢利企业资金雄厚，有能力走向世界。副市长不仅把旅游考察的接待工作委托给了吕尤，还让吕尤按苏联企业名录代拉客户，在适当的情况下租下场地，主办一次该市产品展销会。

由于国内政策对公费出国考察的限制和苏联形势的恶化，参观考察团只有100多人先后成行。仅此一项，吕尤获利30多万美金。展览会改在苏联某加盟共和国一城市举行，这次盛会在当地产生了轰动效应。吕尤组织这次展览会按摊位收费，且对每笔成交合同收1.5%的佣金。除去场地租金、苏方合作单位分成及人员劳务费用外，吕尤获纯利10万美金。

吕尤还组织苏联旅游团体到中国旅游参观。

苏方旅游团有三类：一类是有钱人，多为掌权人。他们有权使用国家外汇，苏联改革前有权，变革后只是不当党委书记、委员，却仍是行政长官或厂长经理什么的，依然大权在握，而且没有党纪约束他们。这些人能拿出旅游观光费来，尽管是公费出国玩一玩，理由却和中国人公费旅游一样——“工作需要”。第二类官小一点，或者是非涉外单位拿不出外汇，但只要吕尤觉得与他们能在别的合作上能获得好处，也邀请他们到中国来，费用本来就小，在中国的住宿由对口的接待单位承担。第三类是普通百姓，多为吕尤在苏的同学朋友和同学的同事，朋友的朋友，他们的旅差费由吕尤出，但每人要安全地押运一批货回到莫斯科。提货发货由吕尤在北京的代理去办，旅游者只回国的路上照顾一下自己负责的货包安全就行。火车到站，吕尤组织人到车站点货接货。

吕尤成功了。他如今指挥着十余名中外青年知识分子，管理着接近现代化的旅游业务。在独联体中10个国家设了分支机构或协作办事处，旅游范围扩大到了东欧其它国家，并在彼得堡（原列宁格勒）组织赴北欧七日游。旅游淡季，他创办的商店成了国内十余产品的代销点，营销人员都是临时雇的，在俄国不愁得不到廉价劳力。

问及下一步打算，吕尤说：“我正与一所大学合作开办私立学校，他们有教室、宿舍和教师，我公司招生，在俄华人已经不少了，如果他们想在此有所作为，必须学习俄语或其它专业知识。同时，他们取得学生证后也可以

在当地办居留证。我和大学对半分。如果这一届办成功了，就可以以学校的名义到中国招生，国内苏东热只增不减，想自费留学的人会有很多。到西方国家留学越来越难，俄国的大学就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加上在俄国的留学生有许多做生意机会，这里的教育水平较高，预计生源不会少。”

吕先生今年 43 岁，原是国内某大学讲师，带着 1000 度的近视眼镜，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时势造就了这位知识型实业家。问到他成功有何秘诀时，他谦虚地说：“我还算不上有什么成功。如果说经验，就是遇到机会就立即行动。中国知识分子长期以来表面上耻于经商，实际上不少人是信心不足，或者怕吃苦。从商风险大，体力脑力消耗极大。我主要是靠赚同胞的钱进行原始积累的，同时也为同胞做了一些事。做生意第一步是资本积累，我只是刚刚完成这个初级阶段。”

“可以问你积累了多少吗？对不起，这是你的秘密。”笔者笑着追问。

吕尤其一伸出 5 个手指，一笑。

“5 百万？”

“没有，50 万。”

“不是卢布吧？”

“当然不是。”

（四）猫、劳务商和血

这是一桩至今未破的杀人案。这里记载的是一些知情人提供的线索……

秋卡年龄只有 8 岁，却经历了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和紧急状态委员会各个朝代。如今，秋卡已是风烛残年，虽从出生起就随主人一直住在列宁格勒，却由一只挑肥拣瘦的苏联猫变成了一只无食可择的俄罗斯猫。

秋卡不懂什么叫公开性，也不知什么叫改革和演变。毕竟是只猫。它只知道吃鱼，陪主人上街逛公园，年轻时也闹过春。十月革命没有把养狗养猫等资本主义生活方式革掉。在原苏联，猫口与人口一样多。

秋卡的主人是一对年近 7 旬的退休夫妇。老两口无儿无女，老来全部的慈爱奉献给了这只猫。吃饭时秋卡上桌，主人宠它到了与他亲嘴撮舌的程度。从 1990 年 10 月起，物价上涨，供应奇缺，秋卡每天的主食——一种北俄河鱼，就从国营食品店消失了。自由市场倒有，每盒要 50 卢布，秋卡一天要吃一盒，可是两个主人退休金加起来也不足 1500 卢布。主人只好用一个人的退休金用来买鱼，而秋卡每日只吃个半饱。秋卡一天天消瘦下去，主人心里十分难过。

1990 年年底，物价再次大幅度上调，主人的每月的退休金加起来只能买 10 盒秋卡专吃的那种鱼，不懂事的秋卡就是不吃除鱼以外的任何食品。主人偏偏把它看得比自己的生命都重要，只好动动多年的存底了。

苏联人民生活很节俭。过去相对较高的工资加上优厚的社会福利，使普通家庭都存有几万甚至几十万卢布。苏联银行存款不给利息，反而让存户按比例倒交保存费，所以老百姓一般不把钱存在银行里，而是把成捆成包的卢布藏在家里。秋卡的主人嫌小面额卢布点起来费事，藏起来麻烦，就将存款中的一半换成 50 和 100 大面额的卢布，总数有 8 万之多。苏联突然宣布废除

大面额卢布，秋卡主人除按规定换了几千新面额卢布外，其余 7 万多全部作废。小面额的 8 万卢布过去至少值十几万美元，贬值后已不抵 1000 美元。

秋卡断食了，奄奄一息。主人喂点牛奶，苟延可怜的小生命。

秋卡的主人，靠养老金养活人也吃紧了。两口子一商量，决定把楼下空着的房子租出去，以赚点租金改善生活。这两间空房原来是一家犹太人住的。苏联开放后，允许犹太人出国，这一家欢天喜地移民去了以色列，除了随身能带走的外，房产家具全部低价卖给了秋卡的主人。而在当时，要不是多年的朋友，秋卡的主人还不愿花这大一笔钱呢。可是，犹太人要到新国家定居，太需要钱了。当时苏联允许出国人员按官价兑换一些外汇带出国。

租房告示贴出去了，老先生刚回到家，就来了两名年轻的中国人前来看房子。房租每月 6000 卢布，水电、电话费在外，租期暂定两年。

6000 卢布！秋卡得救了，主人脸上露出宽慰的笑容。

两名中国人是中国某大公司派驻东欧的代表。国内对海外投资有一定限制，该公司屡次上报的项目都没有批准，所以，就派一名东欧部副主任傅君到东欧筹建分公司，款项由海外走账。该公司在海外有多处账号，这是为了取得灵活经营的便利。该公司决策干部思想开放一点，胆子也大一点。既然正常渠道不通，就命傅副主任申请因私护照去东欧，以个人名义进行海外投资，为公司在东欧“开个窗口”。

傅君，硕士毕业，经济管理系毕业，是公司少壮明星。该君精通英、俄两种语言，办事老成，深得公司领导信任。美中不足的是，傅君个头矮点，在国内没有找到合适的对象。

傅君在东欧各国作了细致而广泛地调查。他是“公费自派”者，既有私人出国的充分的自由活动自由，又不担心在国外没钱花，生存不下去。他觉得俄罗斯地大物博，潜力巨大，应把公司的“东欧窗口”设在俄罗斯。他嫌莫斯科华裔太多，生意多有冲突，就来到了列宁格勒。当然，在考察过程中他物色了一名中国四川来的女留学生、个头比他还矮一点的柳芭（这是她的俄文名字）作搭档。柳芭刚毕业，不想急于回国。两人一见如故，不必多述。

傅君代表的公司是国内一家背景深远，实力雄厚的国际开发公司。以劳务、工程承包为主要业务，有对外贸易权，能代办公私护照。该公司在亚、非、北美、西欧设有多处分支机构，有良好的国际信誉。公司在东欧处女地开拓的重担就落在了傅君身上。他把公司驻东欧办事处的牌子挂在了办公室门口。

傅君的办公室设在最豪华的旅馆，但据一老华侨介绍说，原来苏联的涉外旅馆有监听监视的小玩意儿。傅君不用怕这些东西，合法从商对该国有利，是正大光明的事，只是私生活有些不便，才把宿舍搬到了私人住宅区。办公仍旧在旅馆。

第一个项目是农业开发项目。俄联邦某州与傅君的公司联合开办一个新农场，引进中国作物品种和种植技术，俄方投入机械和化肥，中方派出 60 位农民作为专家赴俄工作两年，由俄方按外国专家待遇支付工资。俄方给中方公司农用薄膜作为补偿。俄国缺粮，收获粮食归俄方；农膜是中国紧俏物资。总公司嘉奖小傅做成了这第一笔成功的交易。

小傅只负责草签合同。其余工作由国内总部去落实。

一天，柳芭从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招标消息。一处旧军用基地需要拆除并修建一家服装加工厂。小傅把信息传真发到国内，总公司第三天就派出了两

位专家前来协助小傅。

投标项目极为复杂。小傅和两位专家仔细研究了招标文件，认为可以与美国、韩国及东南亚的近十家承包商一争高低。招标单位接受了由小傅起草的投标书和由银行出具的投标保证金。小傅通过了投标资格预审。中方标价中的材料、机械设备价格占有明显的优势，小傅等大胆把人工费用提高到总标价的30%，大大高于国内工程的比率。招标单位的支付条件，是将拆除的旧设施中的废钢铁折价抵付。中方最后中标。小傅为公司扩大了在东欧的影响。

独联体国家外汇紧缺，对外贸易多以易货、补偿为形式。这些国家重工业发达，生产资料价格便宜，仍有力量用钢铁换服装，用化肥换食品，用旧军械换民用工厂设备，用木材换鞋帽，用燃料换投资。凡此类合同，小傅代表总公司草签了一个又一个。这类大买卖，成交额大，周期长，结算复杂，只有大公司才敢问津。小傅为公司每做成一笔，都会获得2.5%左右的提成。而办事处的一切开支均由总公司支付。小傅在东欧华人中可不是“小富”。

也许是事业太顺了，也许是求富心切，小傅忽视了财神后而常常隐藏的死神。

小傅常对别人“侃”道：“商品经济要有资本积累，资本积累史是一部血泪史。当年资本主义早期在英国兴起时，资本家靠圈地运动，把农民赶出家园；两欧资本家靠贩卖黑奴和殖民掠夺起家；日本资本家靠贩卖像阿崎婆一样的妓女；美洲人靠抢印第安人的财富和贩毒发的财。中国资本家已经没有了这样的机会。要想快一点致富，只有‘大倒’和劳务。‘倒’要权，不是一般人能干的，但劳务是取之不尽的财源。”

什么叫劳务？这位傅君的解释是：“说穿了就是贩人。在中国别的资源没有剩的，人有的是。中国人力资源便宜，国际差价大。我公司国际承包工程的劳务利润达100%以上，不然，公司哪来这么大的气派？”

小傅在东欧的气派引起了江浙、福建、两广“蛇头”的注意。蛇头们最苦恼的是国内护照难办，而小傅的母公司是国内几大护照公司之一，是“蛇头”们梦中都想接上头的公司。

前文交待过，从浙江福建贩人的价格高达一至二万美金，而贩人的最难的环节是护照。

小傅的公司最快能在3天、最慢也可以在30天内拿下护照。程序是：任何一封来自国外的工作聘请书外加任何一个外国注册的企事业，与小傅的公司在固定的劳务合同书上签字盖章，向公司方面交1400至2400美元“劳务管理费”。护照要快一点，可交“加快费”。该公司不仅有公安局的“公民因私出国申请表”，还有公安局盖章的出境卡。小傅在国外与蛇头办有关文件，国内公司和蛇头的代理人就等待文件一到办护照。

蛇头们一般也有在东欧注册的公司，起码也有一个代理公司。小傅与蛇头公司签订的“劳务合同”究竟有多少，他自己恐怕记不清了。一般来说，小傅通过国内公司，每办成一个护照，除按国家制度给总公司的法定“劳务管理费”外，小傅个人从“蛇头”处净得1000美元。

沿海地区护照不易申请，小傅的公司能从别的省市公安局办浙江、福建、广东人的护照。短短半年，小傅个人靠业余时间为蛇头们办下了千余护照，为国内公司赚“劳务管理”200余万，他个人从蛇头处共拿了100余万“好处费”。总公司党委号召向“标兵”小傅学习。

在经过小傅办理的千余名因私护照持有者中，有5名来自福建某小镇。哪5位？为首的叫阿甲，当过兵，一身武艺，劈起砖头就象切豆腐，在部队因打人立过功，也因打人受过处分。老二是阿甲的弟弟，原无固定职业。老三阿丙是精于江湖黑道的“智多星”，他讲的话中国人听不懂，外国人不能破译——完全是中国江湖的黑话：爸爸叫“老馊”，外国叫“色唐”，警方叫“柴把”或“雷子”，脸叫“盘儿”，钱叫“杵儿”，不洋不土的叫“十三点”，等等。连表示数字的词儿也有专门术语，如5叫“中”，一百叫“张”，一万叫“方儿”等。这5兄弟在一起时，不入“道”的中国人，根本不知他们在嘀咕什么。

这5兄弟每人花了6万人民币办出国护照。连路费行装请客每人至少也花了10万。5个人50万元在中国本来也可以成立个兄弟合股公司做点生意，可是他们都想到西欧开开洋荤。一个个抛妻别子，先到了苏联。蛇头把他们接应到匈牙利，突然告诉他们由于南斯拉夫打仗，不能由匈牙利入南。后又由蛇头领着到了罗马尼亚。哥儿几个一不会做国外“贸易点子”（经商），二又不能打工“衬衬点子”，就随蛇头到赌场试试“奎把”。无奈这“奎把行子”（赌博）也是各国不一特色，5兄弟身上几个钱很快就输得差不多了。蛇头也看得出这几位不同于一般被贩的中国人，惹不起只有躲开，一溜烟回到奥地利去了。可怜5英雄无用武之地，又撤到俄国。准备回中国找蛇头的代理人算帐。

也是这小傅活该要倒霉。他与这5兄弟在莫斯科国旅中心自助餐厅偶然相遇了。这一日，小傅带着搭档柳芭来俄京办事，5兄弟问傅回北京国际列车票在哪买，傅详细教他们如何乘地铁，如何到加里宁大街问路，末了还画了个草图。自古无赖好缠不好甩。这5兄弟中的阿丙连忙说：“先生真是我们出来遇到的最好心的中国人，先生贵姓，有没有名片呀？”阿丙先递过去自己的名片，上用中英文书有：东亚兄弟公司经理助理某某。这小傅回送了自己的名片，上有设在列宁格勒办公室地址电话。这也罢了，还补充一句：“晚上给我打电话时用另一个号，让我写在名片上，有事尽管找我，我们明天就回去。”这兄弟5个道谢告别不提。

阿甲一行人山穷水尽了。国内的招术在国外玩不转，举目无亲，只有这一个傅先生给他们一点温暖。阿丙细细地读着名片，忽然眸子一亮，说：“大哥，这‘火点’和蛇头是一路的，你我诸位的邀请公司不就是这个公司，劳务合同的‘戳朵儿’不就是这个‘傅先生’签的吗？”大家不看则已，一看气得牙祭也不打了。阿甲把对蛇头的仇恨完全移到了小傅头上，恨不得马上就“青”（杀）了他。阿丙说：“不急，有了地址电话，先套套，看他是‘溜子’还是‘空子’（是否黑道人物），只要是个‘空子’，还不好对付？这回要挖挖伊的色唐杵儿（敲他的钱）！”

这日晚上，小傅和柳芭在住处看电视，苏联改革后电视剧不再有反14国围剿、卫国战争或保尔开发西伯利亚的内容，而几乎是每片必脱，每剧都露，房东两口子带着宠猫秋卡来看望他们，柳芭特别喜欢秋卡，开了一瓶鱼罐头和一盒鱼子酱招待它。这鱼子酱在自由市场的价格贵得一般议员也买不起，何况公民了。这秋卡也吃点鱼子酱。房东见柳芭如此喜欢猫，就割爱一夜，把秋卡留在这里住一晚。

送走房东，两人继续看电视。那荧屏内男拼女斗，无衣无袜，由床上滚到了地板。看得柳芭一个劲地催小傅睡去。小傅说：“下午阿甲他们说晚上

来谈劳务合同，说不定又是几万美金送上门呢！急什么，办完公事叫你服我。”这柳芭求也没用，嗔也没用，只好脱了衣裳，在小傅的怀里装睡。

又过半小时，门铃响了。柳芭赌气不穿衣服，小傅只好把她抱到床上用毯子盖住，走到外间去开了门。

柳芭在里间床上逗着猫秋卡，外面的低声交谈她不大关心。她轻轻对秋卡说：“秋卡真乖，你比他好，能通人性，他只知道赚黑心钱，一点也不理解人。你说他是不是个挨千刀的？”这猫连俄语也未必听得明白，华语就更不懂了。这时外面传来一声：“你要多钱？说个数吧！”平时这是别人问小傅，今天怎么小傅问别人了？柳芭的衣服还在外间，反正里屋门关着，灯也没开，她蹑手蹑脚地走到门边偷听外面的讲话。对话声没有了，只听到开保险柜的声音。后又听小傅说：“这是十万美金，你们拿去，告诉你们我不是蛇头，是国家公派的商务人员，从今以后我们两清了。”这是小傅声音。另一个声音说：“什么公派官员，你这护照和我们的一个颜色，骗得了别人骗得过我们？一个人要我们6万，又不把我们送到意大利，让我们在这里吃黑面包！”柳芭全身都紧张起来了，打劫的！急得一身冷汗都出来了。没衣服，又不敢出去看看，接着，就听到外屋几个陌生的声音，对讲一通连她也听不懂的像是中国方言的黑话，甚至相互对吵了起来。最后，就听一声鼻音发出的惨叫，柳芭再也顾不了许多，赤身冲了出去。就在她开门一刹那，猫秋卡先从门缝冲了出去。

秋卡的主人这夜也晚睡。老两口子几年来第一次与秋卡分居，还不习惯。彼此谈着楼下的中国人。夫人说：“中国人搞社会主义还那么有钱。我们倒好，越变越连牛奶面包都买不起了。”先生倒有主见，说：“我们从生下来就搞社会主义，全俄罗斯最老的人也不懂商品经济。《真理报》上说中国只在1956年和1976年没有商品经济。依我看，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际上——”话没说完，就听到门外有爪子抓门声。“秋卡！”老太太说，“还是秋卡好，离开我一刻也不行！”先生说：“哪里是离不开你，是离不开我。”两位老人几乎同时起身去开门。

刚开门，秋卡就蹭到了主人的怀里。

“天哪！”秋卡身上哪来这么多的血！”主人说完细看地下，见门口、楼梯都有猫留下的血印。主人顺着血印来到了楼下，下死劲也叫不开中国人的门。

“柳芭，柳芭！”房东记不住傅的名，只叫柳芭。

“你快回去拿钥匙，在门后。”老头对太太说。不一会，钥匙拿来了，门一开，女房子就吓瘫在丈夫怀里。

几个月过去了，警察还没有破案。两名死者护照、文件包都不见了，连名片也没有留一张，保险柜开着，像是当地黑手党干的，又没有任何指纹。又像是华人干的，该市华人流动频繁，没有线索，哪儿追去？警察预算有限，工资都难确保，每月案件堆成山。此案只好暂停。房东只知其中一个叫柳芭，原名原姓、干什么工作，一概不知。于是，警察警告市民，不允许再次发生私自将住房租给外国人的事件。

据一些中国人讲，小傅肯定是几个南方人害的。但没有任何人敢向警方提供线索。没有房租收入，秋卡断了顿。这位高贵的前朝遗猫终因适应不了新形势，饿死在一盘牛肉旁边。女主人伤心地哭了一场。

第十四章 华人安全问题和华人社团

（一）华人社团初探

华人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出路，然而，目前的小帮会令人失望……

东欧华人面临各种各样的难题。按理，有应运而生的华人团体，但由于中国人生来难抱团，至今没有几个能团结广大侨胞的团体组织来解决华人的生存、居留、就业、诉讼最现实的问题。目前的华人组织情况如下：

一、西欧华人社团向东欧的扩展。主要是组织偷渡，接应人货。以福建、浙江同乡派别为主，多为来自一市、一县或一个乡的同乡的自发组织。

二、台湾、香港商会。台湾商会是半官方机构，他们的任务是维护台商权益，与官方进行政治经济交涉，有不少大陆出去的中国人到台湾企业谋职。被录用者不多。

三、远东宗教组织，以南韩、台湾传教士为主。大陆出来的人多数是不信上帝的，他们关心的是居留和生计。有一些人参与了教会，传教士们在节日也到自由市场等中国人集中的地方送贺年片、小礼物之类东西，也通过当地的宗教关系解决少数大陆华人的居留问题。

四、西欧华人知识分子的组织，有政治色彩，想向东欧扩展。但在东欧的华人对主义什么的毫无兴趣，因而在东欧华人中未能树起任何“民运”的旗帜。

五、江湖帮会组织。这也是公开的秘密。据当地报纸报道，大陆桥（即北京到东欧的铁路）已成为重要的国际贩毒渠道。破获的贩毒组织中有个别华人，东欧警方对此没有大肆声张，他们在严密地注视。华人在欧洲好认，便于侦视。江湖组织的起源大多不在中国大陆，一些是西欧过来的。他们组织严密，纪律森严，告密或中途不干者休想活命，活像意大利黑手党。这些组织的成员也干一些帮人讨债的生意。华人社会中，有人卷走合伙人的钱，也有些人借人钱后逃之夭夭，于是，被骗者宁可许诺将一半追款交给讨债组织。追到了目标却讨不回来钱的，讨债组织就替上当者出气：欠上万元美金者可以命抵，欠几百至几千的轻者放点血，重者卸下身体一个部件。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一些内耗的华人临时性的地方帮会，尽管不成大气候，却产生了极为消极的影响。浙江人打了福建人，“我们福建人要团结起来出这口气”，临时抢团，一哄而上，彼死我伤，贻笑欧人。内斗似乎是华人的拿手戏。更有一帮人，声称中国大使馆没有保护他们的利益，要给中国外交官“放血”，简直是无赖。

（二）危害华人的东欧黑手党和种族主义分子

国外的黑势力多被统称“黑手党”。华人世界的黑势力多被帮会控制。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黑白两道可走。华人要当心……

保护华人的组织没有多少，危害华人的黑手党分子却有很多。
东欧黑手党这两年犹雨后春笋，茁壮成长。

欧人称地下黑社会组织为“Maffia”，中国人称之为“黑手党”。据说早期黑手党源于意大利，是为抗击法国侵略者而自发形成的民间地下组织。当代的黑手党却是杀人越货、贩毒走私、绑架劫持、无恶不作的黑帮组织。东欧以前也有黑手党，但在各共党政权的强压之下，难成气候。如今不同了，黑手党不用集会宣言，他们用行动让社会公众知道他们的存在。每日见于报端的黑手党壮举，如抢劫银行、杀外国游客、逼良为娼等等，令人不寒而栗。

黑手党严重威胁外人的生命财产。

来自中国内地的中国女子小张是不幸的受害者之一。她出国之前是一名编辑，丈夫做生意先富起来。张的丈夫李老板，一天找人算命，那“瞎子”竟“算”得出李老板的妻子长相不仅“克夫”，而且阻了他的财路。丈夫说休就休了妻子。（据很多华人说，生意人特别信这个。）李老板拿出了10万人民币给小张作为补偿。孩子抚养费3万人民币也一次给了小张。这小张想争口气，就花1万人民币办下护照，换了1万美金，准备到东欧做生意。有的人被抛弃后放得开一点，而这张小姐偏偏不是。不信任何男人，出国后也不要任何男朋友做“保护人”，单单选了一位会讲外语的大姐做帮手。两位东方女子每日走出走进，终于引起了黑手党的注意。一日，门铃响了，自称是查护照的“内务部官员”冲了进来，用刀子逼住两女子，把所有的钱和值钱物品全部抢走。小张两个还以为是警察搜查什么，在这伙人走后哭向邻居诉说：“波离塞”（警察无礼查对她们的财物。邻居摇头说：“Maffia, Maffia!”）她们纳过闷来。可是，一切都晚了。好心的华人借钱让小张回国了，大姐留下来没走，逢人还讲小张的故事，说她长相的确是一幅“倒霉相”。

1991年4月，在布达佩斯某自由市场附近一处中国人批货点，一群自称要批货的黑手党分子与华人发生了冲突。有所准备的中国人见来者面目不善，几个列阵，几个埋伏，见对方动手抢货，就主动攻击，黑手党力大，中国人会打，黑手党亮刀，中国人操棍，一场混战下来，中国人没有人吃大亏，黑手党中有一只眼睛都被掏了出来。打劫者退后，中国人立即动手搬了家。

不少中国人都有手枪、匕首，一半为内斗，一半为防黑手党袭击。

东欧黑手党活动又以原苏联各国最为猖獗。

早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就有了不少黑社会组织，但当时还只是一些鸡鸣狗盗之徒，犯罪规模很不起眼。到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前夕，苏联专门成立了专门对付黑手党的反恐怖警队——“奥蒙”，外部世界才感到了苏联国内黑手党的存在。

黑手党如今可是鸟枪换炮了。苏联黑手党组织结构、作案手法、插手的行业、残忍性都与美国黑手党毫无二致。每一个城市几乎都有黑手党的存在。他们职业就是敲诈勒索、贩毒、开妓院或兼干合法的职业，如自由市场摆摊，开办旅馆、餐厅，承包出租车和建筑工程等。配备的武器从短剑到马卡洛夫手枪，乃至乌兹冲锋枪。

西方黑手党组织以家族成员为组织骨干，而苏联黑手党则是不同种族的利益集团，其“战士”大多来自“健身房”。这些人成天价锻炼肌肉，一身力气无处发泄，专门寻衅闹事。他们爱穿皮夹克、阿迪达斯运动裤和高统球鞋。无事便到高级餐厅厮混。1990年某日，在莫斯科一家著名的餐厅里，发生了有200名不同帮派的黑手党参加的一场械斗。顷刻间，血流满地，杯盘狼藉，而警察局就在附近，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苏联解体后，黑手党乱中称雄。失业者，尤其是从前干秘密工作的人员，武艺高强，迫害人的招术无所不精；如今失业，虎落平阳，便加入到黑帮组织为非作歹。过去，苏联只有外交外贸或干情报工作的人学外语，一般学校外语课都不上，在苏联不懂俄语的外国人问路可是麻烦。而黑手党由于要外国人的钱，颇能说些英语、德语。自从来了中国人，那些炒汇的、炒票证的、开黑车黑店的恶少们大都能说几句华语，以便于勾引华人落入他们的圈套。

黑手党的大头目常常是道貌岸然的企业家、官员或“人民代表”。莫斯科有个出名的黑手党头目叫“诺达”，过去是摔跤运动员，现在的公开身份是受人尊敬的企业家。帐下事业包括金融、地产、果菜市场等不一而足。

警察，一部分是黑手党的天敌，一部分是黑手党的盟友。莫斯科东方火车站是黑手党的天堂。华人无一日不在出站口“黑车”停车处向警察求援，却没有一次得到了帮助。有两种可能，一是，警察就是黑手党的盟友，二是受了黑手党的警告或贿赂。莫斯科市警察局的侦探凡地姆·诺瓦塞德，曾化装到黑海边一处旅游胜地，想偷偷拍下一名黑道人物与当地警官对饮交欢的场面，不料蝉未捕到，暗中黄雀先下手，诺瓦塞德被打成重伤，在医院住了几十天。他的一个同事被黑手党杀害，死者亲属只领 1000 卢布抚恤金（约合 7 美元）。

由吉林第一次出差到莫斯科的两名公派干部，车一停稳，就见一大群身着制服的车站“搬运工”挤上车来，帮旅客提行李。两名中国干部相互说：“还是苏联人好，看人家服务多周到。”他们随着一名“搬运工”走出车站，满以为给一百卢布小费就完了，没料到“搬运工”要 50 美元！不给，一大群“搬运工”上来，扣下行李，嘴里还咕咕呱呱地骂个不休。两个中国人一人看住行李，另一个叫站外警察。这警察很谦虚地表示管不了。没办法，讨讨价吧，给 30 美元外加两瓶锅头酒了事。接着就喊出租车。“到哪里？”“普希金大街。”“30 美元。”两个人不坐了，想走出车站一段路后再喊出租。又没料到这些黑帮车尾随不舍，跟出一站多路。刚叫停一辆车，这黑帮车靠到那个司机面前，低声说了一句话，出租司机扭头就把车开走了。（据说一旦出租车司机抢了黑手党势力范围的“生意”，他就要车翻人亡。）两个中国人没办法了，见路边有地铁站，管他的，下地铁，甩掉他们要紧。在地铁里转了几个圈子，竟转到了红场，索性上去看看这个世界闻名的红场，还有费拉基米尔·伊里奇。不料，还没出地铁，尾随而来的黑手党走上来，抢了一个双卡录音机盒子就跑了。两个人苦笑了一声：“这下可没吃的了。”原来，这个纸箱子里面装的是方便面。——公派出去的人大都带这玩意儿，省下几个美元，回来可以买个指标件儿。打发走了黑手党，他们才花 20 个卢布叫辆车到了普希金大街。

香烟涨价时，爱抽烟的俄国青年买不起，就在街上向外国人讨。这一天晚上，刚从克里姆林宫大剧院看完芭蕾舞剧的两位中国留学生，想在红场附近散散步。走着，说着，就见一位漂亮可爱的俄国姑娘走过来要支烟抽。中国小伙子顺手从上衣里面掏出一包，没想到拿错了，是钱包，就又放回原处。谁知斜刺里冲出一条好汉，一眨眼功夫，就把中国小伙子刚放回去的钱包掏了出来，慢悠悠地走开了。另一个中国小伙子赶上去夺，立即被四面围过来的一群人推推搡搡逼了回来。两人没办法。这类事他们在莫斯科天天都听说。

住久了的人对黑手党的把戏都习惯了。这名中国学生的钱包里面半个卢布也没有，除了钱包本身值点钱外，里面鼓鼓囊囊的东西都是在戏院里擦痰

擦鞋的纸。不过，这类玩笑也开不得，贼不得手，恼怒报复，要你吃不了兜着走。最好的办法，留学生们说：“别惹他们。”

几个从匈牙利回到莫斯科想继续摆摊的中国人，在自由市场因听不懂黑手党叫他们交“保护费”的话，被黑手党打个半死，抢得只剩下背心裤头。匪徒的这一切作为都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抢完了，打完了，还回头说：“打死匪打你呀！”（俄语再见的意思）。不懂俄语的人还以为还要来打呢。

报纸揭露，黑手党案件只有不到 1% 诉诸法庭。依照法律，谋杀罪也只判 7 年徒刑。打手犯法坐牢期间，家属会受到头目很好的照顾。关于黑手党内的行情，杀一个人的报酬是 1000 卢布，打断一条腿 100 卢布。在黑手党势力范围内从商必须交 10% 的“保护费”。与东欧其他国家情况不一样的事，华人小商贩从来不敢到自由市场去“练摊”，宁可在家便宜点批发。有一个郭氏华人斗胆到自由市场转转，回来时只剩下身上的背心裤衩。

东欧黑手党也开始在无业华人中雇用“人才”，令华人教他们常用汉语和中国人习惯以及提供中国“大款”的线索。一位自称是“差点上了当”的女华人，指名道姓地说一个中国人骗她到黑手党窝门口，后来她借机逃走了”云云。匈牙利一场华人之间的械斗中，有乙方势弱兵败。不久就花钱请当地黑手党报复，在一家华人办的旅馆偷袭另一方华人。结果“多国部队”把甲方一个人的腿打断了一条。

除了黑手党外，种族主义分子，反共组织，法西斯主义分子也与华人为敌。在匈牙利街头，多次出现高呼“中国人滚回去”的人群。

1992 年初夏，美国种族风波波及欧洲。因德国合并而拒不回国的某中国青年学者，在德国东部（原民主德国）被种族主义分子打伤致残。

在俄罗斯，两名中国人被狂热的反共分子绑架私审。“问题”真好笑：“你说说，究竟有多少前苏联官僚现在中国？”这两个小买卖人哪里知道这个。

1992 年春节前后，在捷克某市一个停车场，一个中国人见广告墙上把希特勒、斯大林以及中国某位领导人和朝鲜某领导人的漫画像贴在一起，说明文字上写明“独裁者屠夫”字样，就愤怒地撕下中国领导人的漫画像。一群仇共分子顿时围上来，把这个中国人打个半死。

中国人出去爱称人为“同志”，为这个吃亏的人有不少。一广东人在罗马尼亚问路，等对方指完路后说：“谢谢你，同志”。那人转过身来猛一拳打在他下巴上，还恶狠狠地说：“你这个该死的共产分子，你的‘同志’让我们处死了。”可怜这人根本不是共产党员，只是在火车上请教了一个词叫“达娃里希”，他记不住，还用粤语写在手上背了几十遍“打娃累死”。这位广东人约他的同乡会面，被打时同乡刚好赶到。同乡会说罗语，质问打人者何故打人，那人说：“他侮辱了我。”

（三）东欧华人为什么连遭惨杀

自 1990 年 3 月 3 名中国人在东欧被谋杀截止到 1992 年 5 月 20 日为止，根据海外报纸的报道，至少已知有几十名中国男女被惨杀，占东欧华人总数的万分之五……

自 1990 年 3 月 3 名中国人在斯洛文尼亚被谋杀以来，到 1992 年 5 月 20

日为止，根据原东欧，苏联的报纸报道，至少已知有 34 名中国男女被惨杀，占东欧华人总数的万分之五。这个数字是保守的。第一，有些国家根本不作报道；第二，根据一些已被发现的中国人尸体的情况看，还有些失踪的人很可能是被肢解后投入河湖中或塞入下水道、垃圾箱。

华人被害的三个主要地方是：原南斯拉夫，原苏联的俄罗斯、乌克兰，匈牙利。这三个地方的被害华人占被杀总数的 70%，其余大都死在一些国家的边境地区。

根据当地警方分析和一些华人提供的线索，被害华人大多数是被华人所杀，少数死于当地匪徒之手。死者中有几名是较出名的“蛇头”。被外国人杀害的原因不外乎是杀人越货，或是强奸后灭口，而被华人杀害的原因就要复杂得多了。

“蛇头”被杀是因为他们鼓吹出国等于进“天堂”，代办出国手续，收入大笔手续费。出国后有人混不好，大呼上当受骗，扬言报复。走投无路的人岂有惜命者？有位姓 D 的“蛇头”正和情人睡觉，一个电话打来，说又有生意；穿好衣服出门，就再也没回来。后来被发现卸下了十几块，装在塑料袋扔进了多瑙河。有一对男女被杀死几天后，才发现，略有反抗的迹象，遗物中还有未发出的“单子”，上面还有领使馆的认证章。死者照片登上了报纸，单放的照片贴在华人集中的地方，号召认识死者的人提供线索，就是没有人敢去认。当地警察就突击搜查华人，见了通讯小本（华人每人都有）就查有无死者电话号码，如有，就当嫌疑犯抓起来审问。

被害者多是财主。公开露财是最愚蠢的，在同胞面前更要小心。去苏联东欧的华人发财的不少，破产的也多。破产原因很少是生意做不好，只要勤劳都能赚点钱，主要是嗜赌如命的中国人把自己的钱白白扔给了卡西诺赌场。破产后怎么办？偷、骗是华人社会中最普遍的现象。骗子也有低级、高级之分，那种铤而走险敢于谋财害命的匪徒也不在少数。人在国外，桔离淮南，立即走了形质，亲朋为仇，兄弟反目，输了钱，亏了本，不敢去抢银行，杀当地人难逃一死，就把雪亮的尖力刺向了自己的同胞。

被合伙人杀害的已肯定的有 3 起。中国商品经济还不发达，做生意不守信用又是一个普遍现象。做生意，以劣充优，交货不守时，分利不按合同办，甚至独吞，欠债不还，多角扯皮，“宰熟”等等埋下了一个个祸根，非动刀子解决不了。更有在国内不方便的职业水平杀手出国谋生，没有保镖的财主自然就又添了一层危险。

死于情杀的大概有两类：一例在波捷边境，一具中国男尸的口中塞着自身的阴器；一例在莫斯科郊外，一华人女青年尸首上全由金银饰品装扮。让自己的女儿单身去东欧的父母真是大胆，敢让妻子只身去那里闯天下的丈夫更是了不起。并不是女子出去就一定危险或染点“自由化”什么的，而是环境太恶劣了。没有一点生存本事的女人，除了与人“膀肩”或卖点笑，怎么付房租伙食？没有一个保护人怎敢独立做生意？一般来说是互相需要，只是龙的故乡出龙种，一龙九种，种种各别。“膀”上一个好人是福份，遇上一个混蛋就同伴上了虎狼一般。中国人出去的总的看来是男多女少，又有不少坚定独立的女士就是洁身自好，余下的物希为贵，离乡更贵，争风吃醋之事就难免发生。还有一种人，以换女友为乐者，或以女友为赌注者，或聚鹿轮欢者，哪有一点人的味儿！更甭提什么怜香惜玉之柔情！有一位先生让哥们儿把他妻子办到国外，后听人说这位哥们儿竟与妻子同居了。于是他自办了

一个护照，带着凶器出国出气。后凶器被海关查出，他就又在那个国家买了一把更便宜、更锋利的凶器。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三人又和好如初了，也许是他理解了在国外的艰难，也许是他们之间搭成了什么交易，未便细考。

更有一种贪图享乐，不想靠劳动挣钱的女士甘愿以身试狼，谁有钱就“膀”着谁，难免就引起一场狼咬狼的争斗。

在原南斯拉夫死于非命的还有因黑夜偷渡发生交通事故的，有匪徒杀人夺财的，这还不是最惨的。越境时被边防军队当贩毒走私而开枪打死的，白死。

东欧及原苏联各国大都废除了死刑，现在的刑法大部分是延续前共产党执政时期的。而当时的刑法除对政治犯外，对一般刑事犯罪的处罚都是很轻的。苏联的谋杀罪判刑不过7年，波兰、匈牙利不过10年。在社会大动荡、大分化的变革时期，乱者为王，盗、匪、贼无法无天，黑手党横行城乡，当地警方对付国内犯罪力量本来就有限，哪有余力去甄别成千上万中国人中的罪犯？需要时就欢迎中国人投资经商，不高兴时就不分良莠一律驱逐。中国人被杀案件没有一件破获，而以搜查为名敲诈勒索拘捕中国人的事件，天天都有几十起。有一位华人对笔者说：“东欧‘波里碎’（警察）就认钱财，就要抽头，公开索取，毫不脸红，而且只敲中国人。”

国内是不是放了一批有前科的人出国呢？一位女警官信口开河地说：“到匈牙利的都是大狱里放出来的。”有人就把这句话当作权威的定论到匈牙利后给警方，这给成千上万在匈中国人带来了一场劫难。那些规规矩矩的生意人一夜之间被没收财物，投入集中营，不几日赤条条押送回国。

不可否认，是有一些走黑道的中国人进入了东欧。他们有携带大笔公款出国挥霍的权贵，也有满口黑话、刀枪齐备、浑身横肉的打手，也有逃刑、逃税的暴发户。而中国出国政审只要看“六·四”表现，别的哪有钱买不到的章子？中国人能做收费代办“未婚公证”、“出生公证”、“无犯罪公证”等生意，足以说明权力和金钱在我国的特殊关系。在东欧一些国家一次又一次的排华浪潮中，那些做小本生意的华人只好听任命运的摆布。而黑道人物是治不了的，他们敢于斗争，同警方周旋，有的甚至买通警察，联合敲诈中国人，共同分脏。更有胆大的，敢把警察痛打一顿，然后越境逃往他国。这些人毕竟是极少数，但他们能量大，影响大，中国治不了他们，所在国也奈何不得他们。

尽管中国人在东欧连连被杀害，但丝毫没有影响国家关系和民间贸易，中国去东欧的热情有增无减，罗马尼亚《火焰》周刊第20期（1992年5月20日出版）刊登原中国人民大学苏东所教师，现任中国人国际协会罗马尼亚分会主席李玉殊女士对该刊记者发表的谈话，题为《为什么在罗马尼亚的中国人被杀害？》，全文如下：

问：尊敬的女士，目前在罗马尼亚的您的同胞有多少？

答：四、五千左右，可能甚至更多。总而言之，很难提供一个准确的数字，因为他们中许多人是往来经商的，也就是说，他们在这里建立了贸易公司，他们涉足于罗马尼亚商界，但是，他们在西方也有生意。

问：中国人在罗马尼亚的日常生活是怎样的？

答：非常困难。我们原认为，罗马尼亚是奉行开放政策的。中国人开办的贸易公司过去和现在都不能进入开展贸易活动的场所。迄今为止，中国人

在这里只能从事零售商业活动。由于缺乏商业场所，不管愿意不愿意，他们被迫到旧货市场去做买卖。在市场上有被盗的。

问：中国人中有取得成功的吗？

答：有。那些同阿拉伯人、香港同胞、同富有的罗马尼亚人进行联营的人取得了成功，否则一事无成。

问：迄今为止，中国人被证明是来罗马尼亚经商的外国人中最弱的。这是为什么？

答：由于缺乏在国外生活经验。中国人——他们中的一些人，自然，特别是中国南部的，他们只会说本地话——成为来自泰国、缅甸、孟加拉的不可靠的投机商的猎物，这些投机商甚至是毒贩，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问：您认为就是这些人同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国人打架吗？

答：不清楚。很难说，我们的记录是按中国的地区作的：有多少人来自北京地区，多少人来自上海地区。

问：您是否知道罗马尼亚当局对最近几个星期来有关中国人的暴力案件的看法吗？

答：我同检察院官员进行过一次交谈，官员对我说，来自中国的商人、中国公民搞的非法交易最多。

问：在布加勒斯特会建立一个中国社区、一座唐人街吗？

答：如果我们能创造一个中国环境，建立一个带宝塔的小中国城，那是非常好的。

问：不久前在布加勒斯特的某些湖中发现的装在箱子里的两个中国人（亚洲人）尸体，这一犯罪活动会对来罗马尼亚的您的同胞产生影响吗？

答：不，影响不会太大。这是一次教训，它提醒人们到国外要小心谨慎和有良好的素质。

（四）“中华商会”

“团结就是力量，这力量是铁，这力量是钢”。当因私出国人员的各种困难无法解决时，当地中国使馆也无法帮他们解决时，“中华商会”就架起了凝聚力的桥梁。

东欧的华人不断遭到排挤和驱赶。

东欧华人不断遭到敲诈、勒索和侮辱。

东欧华人不断遭到抢劫和杀害！

他们就是难以组织起来，为生存权力而集体抗争。

问题在哪里？首先是分散游商的华人很难组织起来；二是不少华人图小利，内部倾轧、坑骗、互不信任；三是中国人传统习惯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四是缺乏一些财力影响力都大的核心人物；五是缺少官方、半官方的中国商会机构的有效支持（港澳台除外）。一位使馆商务官员说：“我们只接待因公出国的。”

如前所述，大陆华人中有一些自发的小团体，但这些“同乡会”、“兄弟会”多半是为对付中国人而形成的。原因是华人生意都差不多，人头生意、餐馆、服装、化肥、旅馆、中医诊所几大类，内部竞争很激烈。

这些自发小组织抗争起来也时常不循章法，不知如何进行合法抗争，而

是偶尔武装报复黑帮恶警，甚至破坏有些公共设施（如砸电话亭，切断加油站管道等等），反而被当地当作中国来的黑手党给予更严厉的制裁。这些小帮派之间又是水火不容、睚眦必报，动辄打群架。这些组织对华人有百害而无一利。

1991年9月29日，在匈近千名华人，自发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2周年。在这个大会上，由“新兴”、“海外”、“欧亚”、赵氏餐馆集团等公司发起的“匈牙利中华商会”，宣布正式成立。这是东欧华侨史上的一件大事。“中华商会”告同胞书上说：

“随着东欧各国体制的变化，经济形势和商品商场的发展，各国商人云集匈国，商业竞争渐趋激烈。面对新的形势，我们华胞怎样求得生存和发展，这是我们每一个在匈华胞十分关注的问题。

为了
提高自身的竞争能力，
维护华胞的合法权益，
保护华商利益。

我们呼吁：在匈牙利成立中华商会，使大家团结起来、组织起来、互帮互助、共同发展。”

中华商会的宗旨：“繁荣匈牙利商品商场，促进中匈贸易往来，维护华胞的合法权益。”

根本任务：“扶持华胞开展各种商业活动，协助华商解决疑难事宜。”

这是一件好事。参加这次集会的中国戴大使也表示，成立华人组织“是正常的”。

也许是人们对商会要求过高，也许是准备不足，该商会成立近一年来并无很大影响，也没有得到当地政府的正式承认，实际工作也没有太大的进展。自成立以来，没有多少华人和外商知道这个组织的存在。

难在哪里？

商会要有强大的财政支柱。中华商会的创办单位自身实力有限，中国商人中的大财主根本不出面，也不出一个子儿。商会也不可能得到像台湾商会那样的官方资助。

除了财政还有很多问题。仅在匈牙利注册的华人公司就有1000多家，比在北京中关村一条街的公司多出几倍。可是管理中关村公司的有多少机构？而“中华商会”没有专门的组织机构，没有职业律师，没有固定的信息网络，没有定期的出版物，没有几个专职的翻译，也没有与当地其它商会组织发展固定的业务关系，所以，尽管这家商会创办人的出发点是为华人做点事，但它的实际效果是有限的。这个商会没有港台商人参加。

为华人谋利益，首先要保证会员单位遵守当地法律。这么多的公司，良莠难辨。每个公司有自己的背景，有自己的营生，有自己的套路。如果一个公司干非法事，被当地起诉，商会如出面，就要有自己的调查班子和专职律师，这些实际上是做不到的。到目前，商会组织的活动也是几家大单位凑份子集一笔钱，搞一次集会什么的而已。

尽管如此，这样健康的华人组织还是一个好的新生事物，代表华人社团发展的趋向。

1992年5月8日，在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200多名华人代表集会宣布成立“欧洲华侨华人社团联合会”，声称在欧数十万华侨华人谋利益，这也表明华人华侨在争取民族平等权益方面又迈出了新的一步。只是，这个联合会帮不了东欧华人多少忙。

（五）外交官

“清官难断家务事。外交官呢？……”

数万华人涌入东欧、独联体诸国，使为数不多的中国外交官们一下子增大了工作量，许多新的问题摆到使领馆面前，有些是他们也无能为力的。

去新东欧地区的中国人大都抱着闯一闯、试一试的态度，赚到钱算走运，赚不到也落个出过国留过洋见识广的美名，他们对当地情况了解很少，守法的看不懂当地法律规章，不守法的任意胡来，更何况无法可依、有法不依、朝令夕改的现象在这些国家里并不罕见。中国人与当地官良的摩擦、冲突、诉讼每日不断，不出事便罢，有了事，这些人才想起了祖国大使馆。

一位华人从国内带出来十万美元，为了躲避中国海关检查，他把钱藏在身上“最高主权”部位，中国海关一般不对同胞搜身。出中国海关后，此君又误以为可如法炮制混别国海关。和其他国家一样，某国对出入境者申报外汇有明确规定，但该国海关检查人员在执行公务时，就远比不上中国海关工作人员那么彬彬有礼了。此君进入该国机场海关时，一分不报，海关也没在意，等离开这个国家时，他把剩下的两万美元（其余的赌输了）仍藏起来，准备混出海关。可不曾想出关不比进关，他被带进了搜身室。在海关工作人员的监视下，他不得不脱下一件又一个衣服，几乎要赤身裸体了。这时不由分说，两个关警走上前来，将他强行按倒，从内裤里把两百张一百元的美钞掏了出来，并以“入境分文皆无，出境携带来路不明的巨额外汇”为名，将他拘留审查。此时，此君丢掉的不只是两万美金，也许还要坐牢。他要求请律师为自己辩护，海关同意先放人，但要扣留他的全部财物。律师说的唯一办法就是让中国大使馆证明他的外汇是由中国带入的，此君如梦初醒，想起了祖国还有一个使馆在这里。

像这种案件，领事部已经接到几十起了，由于使馆人员少，精力有限，不说去调查真相确有困难，就是听听每个求援者的一番陈辞，也是赔不起时间的。不巧，此君去领事部这天，三位官员一位生病休息，一位主管官员出差未归，接待他的只有一位年轻的随员。因为处理这类案子必须由主管领导证明盖章，年轻的随员建议他等领导出差回来再说。谁知此君听罢，竟当场破口大骂，先是骂人，未了连“中国”都骂，好像他是看得起“中国”才找中国使馆的。这位爷后来还真是硬着不求使馆，也不打官司，用他自己的话说：“钱我就直当在赌场赌输了。”两万美金，整整十二万元人民币。对他来说也许来的容易，去了也不心痛，但对每个月仅有两百多元人民币收入的普通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整整50年的血汗钱！

比此君更大胆的中国人还不少。一个贩毒者被抓后，也毫不犹豫地要警察打电话给使馆，求大使出保，并且亲自写了一封求救信，信中把“违法”二字写成了“为发”，这种有“胆”无“识”的洋相真让中国人掉价。

那些自杀的或者被杀的中国人，其后事要使领馆人员出面交涉。死者家

属长跪不起，哭求“祖国青天老爷”“我现在身无分文，只有靠组织了”，听起来辛酸又荒唐。外国人也到中国使领馆办事，见此情景，由于听不懂中国话，还以为中国恢复了清朝的磕头大礼呢！

貽笑国外的事远远不止这些，使馆官员每谈到此，就要长叹数声。

华人与房东发生纠纷，拔退就走，留下的新地址竟是中国大使馆的地址！前面提到的巨额电话费一例中的房东老太太，就是无法找到逃之夭夭的中国人，才找到中国大使馆评理的。光接待就是几个小时，可是，使馆除了表示同情之外，又能做什么呢？

国内公安局面对成千上万份国外邀请书、各项公证材料，难辨真伪，要各大使馆认证，仅此一项业务，就使领事部疲于奔命。有人抱怨说使馆认证收费是赚同胞的钱，岂不知这种手续费是一分不留要上缴国库的。当所在国官员看到这些材料时，也啼笑皆非。他们不解的是：由我国法律机关公证的材料，贵国使馆有什么权利让证明它的真假？

1991年夏日的一天，驻某国大使馆领事部接待处挤满了等候认证的中国人，那人多的和国内在公共汽车上等着上早班的人群没什么两样。使馆人员让大家排队，按顺序办理。开始还好，不一会儿，夹塞的与反对夹塞的吵了起来，三句话没说完，就动了拳头、刀子，最后枪也亮出来了。无奈，使馆不得不请来当地警察帮助平息。

外国人在笑，使馆人员心中很不是滋味，怎么开放出来的同胞就像开了锁的猴子，丑态百出也不拣个地方？

中国正在看好东欧、独联体广大的市场和资源。民间贸易固然重要，但是，中国外贸部门要想从近几年来由良莠不齐的新华人那里得到什么实际帮助，恐怕希望不大，值得重视的是一大批老华侨，还有就是要全面调动外交官们的积极性。

和平时期的外交任务主要就是维护本国的商贸权益。但这要同解决外交官的实际问题结合起来考虑。

扩大商务机构，成立相对独立于使馆以外的商务机构，以分担有关商情、商务交涉、商民居留咨询等业务，同时也应从贸易利润中得到分成，以减少国家开支。这个办法是有先例的，中国使馆还未一试。

使馆人员家属分居问题是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国家浪费那么大，不知哪一笔子省下的钱就可以补贴使馆家属的生活。何况，国家外贸的损失很大的原因就是对他国国情、法律、商务等了解不够造成的。如果调动起外交官家属的积极性，让他们剪报、翻译、广收公开消息，这要比在国内望夫兴叹的贡献大得多。

外交官的子女应当跟随父母受正常教育，有利于社会安定，更有利于长远培养人才。外交官大都能精通一两门以上的外语，培养一个小语种人材国家要花多少钱？乌克兰有5000多万人口，中国会讲乌克兰语的人只有一两个，堪称“国宝”级人材了，让孩子们跟着父母到所在国学语言，胜过在国内专业院校重点培养。如今在北京的外国外交官，有不少是老外交官的后代，他们从小在北京受教育，普通话说得像中国人一样，在我国又有很多的关系（老师、同学、邻居、朋友等），对我国国情了如指掌，同我国交涉时有理有情。这也是一条可以借鉴的经验。

与50年代情况不同，中国新一代驻东欧的外交官已经很少是部队抽调出来的干部，他们大都是外语院校（包括外交学院、国际关系学院或大学国际

政治、国际贸易专业院校的毕业生)的毕业生。子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我国外交官是全世界最优秀的外交官。外交队伍就像一个战斗的集体，组织生活、政治学习与国内一样，他们担负的责任要比其它国家外交官重得多。

不了解内情的人想象外交官在国外是活跃在洒池舞海中的风流人物。实际上，气派场面任何外交官都经历过。但谁会相信，时下除了军人之外，只有外交官是有奉献精神的人员？80年代中期外交改革后，外交官待遇大大改善，月薪也是80—200美元之间而已，年轻一点的外交官每月百十美元左右，在国外够买些什么？一干两年才允许探亲，个人问题是根本无法顾及的。有配偶的，要到一定级别，由随员升到一秘，没什么特殊情况，正常的话要等十来年，家里老小谁照看？分居在外国人看来是最不人道的现象，可是，我国现在的客观困难是一下子解决不了的。所以，国内一个知道内情女士竟说：“宁可嫁给海员，也不嫁给外交官。”

外交官的妻子是了不起的女性。

L大姐是驻东欧某国一位高级外交官的夫人。丈夫自60年代末起一直在使馆任职，直到80年代后期夫妻才在异国团聚。丈夫以前根本没有钱寄回家来。L大姐在家里要奉养5位老人(自己的父母、丈夫的父母和丈夫的爷爷)，丈夫每月几十元工资是要分别给老人寄去的。自己几十元工资要养活自己和两个孩子。这些年里，她要把一筐筐煤从煤场拉回家，还要搬上5楼。一年，北京流行感冒，一家老小病在床上，L大姐抱病照看老幼，呼夫不应，累得死里逃生。18年过去了，L大姐吃尽了苦头，可这又能对谁诉说？如今，才刚50岁的L大姐已是满脸皱纹，18年艰难岁月烙下的痕迹抹也抹不平。

北京某街外交部宿舍区。负责治安的派出所片警Y君说，这个楼群犯罪率直线上升。根据他的解释，这是外交官们“有几个臭钱”把子女惯坏了。另一位在外交部工作的年轻干部不同意这个看法，他的理由是：外交官哪来的“臭钱”，家人成年看不见，就更谈不上“惯”了。

小冯是而立之年的女孩子，至今没有谈过朋友。她才貌双全，是一位翻译，个人问题的延误完全是父母长年在外任职，而她要抚养两个小弟弟成人的结果。不过，她们姐弟三人是外交官子弟中比较争气的。

据说，明文不让外交官携带子女出国的，现在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笔者起初不信，后在东欧几个国家试办进入平壤、哈瓦那、河内签证时看到这三个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使馆内也是子女成行时，才有些信了。

中国自九十多年前成立外务部时起，班列各部之前的是外交部，这一定制一直没变，各国亦是如此。130年前中国派到国外的夷务官员的月薪是现在外交官的5倍还多。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官的月薪是现新中国外交官的10倍以上。可能有专家会找出证据驳斥这个统计结果，提醒一下，要考虑物价上涨指数。

旧中国外交官是可以携带子女出国的。

横比就更没法比了，东欧H国驻北京大使馆的平均工资水平为中国驻H国外交官的12倍。

尽管如此，中国的外交官没有一个为待遇和生活向上级写请调报告或为此而离职出走。一位过去当外交官、现在是更高级的领导同志说了：“当年我们的待遇更差，现在的大使有200美元左右补贴，相当于1200人民币，国内哪来这么好的待遇？国务院副总理的工资才多少？”

国内研究外交的人不少，但专门研究外交官(当然不仅是驻东欧的外交

官)问题的人恐怕没几个,外交官的生活待遇,夫妻分居时间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感情伤害,还有父子之间的裂痕,似乎没有多少人注意。外交工作说一千道一万,最根本的问题还是人的问题,调动外交官们的积极性,是开创外交新局面的重要前提。此书多此一笔,也是敬告在东欧的同胞要有点外交常识,别把使馆当作国内的居委会,更要理解在国外辛苦奉献的外交官们。

第十五章 神奇之旅

在历尽千辛万苦赴东欧淘金的中国人“队伍”中，竟有这么一位戛戛独造的画家老张，去俄罗斯、波兰等，纯粹是为了游山玩水。山水依旧，人事已非。没有领略异国风情的闲情逸致，只有在异邦的惊恐与悲凉……

（一）引子

在中国人东欧“远征军”浩浩荡荡的行列里，可以说是什么人都有，参差不齐，行当各异。但有一条对每个人说来都极明确的，那就是：赚钱。非常难得发现他们当中有像日本人到中国那样纯粹为了旅游而活得潇洒、玩得地道。

张雨轩，老张，偏偏成了这支大军中极少数的极少数。

老张本是北京某美术学院的副教授，教西方美术史。称他老张，是因为他为人迂厚，加之悉心钻研学术，四十有三便秃了前半个脑门的缘故。

老张早早地就跟美术结了婚，到现在还是孑然一身。他带的几个学生只是在课堂上称他老师，更多的时间里跟他搂肩搭背，没大没小，老张倒觉得这样更自在。

有两个学生从东欧回来，执意要在莫斯科餐厅宴请他。几个学生兜里有几个子，老张是很清楚的，能在如此高档的餐厅请客，说明这几个月去东欧没白转悠。席间，老张对俄式菜并不十分感冒，对两个学生大侃如何把羚羊角带出境听得也似懂非懂的，但对美元在东欧非常值钱听得入耳，明白了用人民币换些美元，再拿美元换东欧当地货币，立马成“大款”。

教西方美术史的，去不了西方，到东欧转转也不枉此生。

“我也想去一趟。”老张语出惊人。

两个学生对视了半天，半晌犯嘀咕，终于他们几乎要跳将起来，击掌称快。一个答应帮老张兑换美金，另一个帮跑出国手续。

三人举杯，一饮而尽。

（二）泪洒赤塔

一阵急促的敲车窗声把老张惊醒。到赤塔了。同车厢的人早已下到站台上了。

赤塔是列车进入俄罗斯境内的第一个较大城市。赤塔为契丹人的故地，有人说赤塔一名由此而来；还有人说赤塔系鄂温克语中“粘土”，因为赤塔河两岸皆为粘土，城市因此得名。

赤塔曾有过一段辛酸的历史。17世纪二、三十年代，这里不过是个屯落，只有南北相交的两条街和散布在街旁的几十间房子。十二月党人于1826年被押解至此，开始流放生涯。他们每几十人居住在一个大房间，像沙丁鱼罐头一样，一个紧靠一个，十分拥挤，连翻身都困难。所有的十二月党人都昼夜戴着脚镣，只有进教堂和澡堂才能卸下。尽管这样，他们还得在鞭子的驱赶下干农活。赤塔一带属贫矿区，过去人们以务农为主。说起务农，前两年黑龙江省的一批菜农到赤塔承包了几百亩地种菜。“老毛子”人懒，种子往地里一撒，秋天来收，这样永远没有高产。中国菜农先大棚育苗，再移栽到大

田，天天到地里转转，除草、追肥，总有活干，当地人纳闷：中国人瞎忙活什么？可到了收获季节，这肥沃的土地就是不亏待人，什么黄瓜、茄子、西红柿，地头堆积如山。“老毛子”羡慕得不得了，也有人照中国人样子干，可就是不像。中国菜农送给他们西红柿种子，经他们种的西红柿结的果实都跟鸡蛋大小。他们愣说中国人留一手。其实“老毛子”干农活缺乏精细，还犯懒，没别的。

苦役使十二月党人渐渐团结起来。尽管他们中许多人以前并不认识，现在却成了朋友、亲人。时间长了，囚徒们的妻子们帮助他们与外界建立了联系。相传有位叫穆拉维约娃的妇女，冒着生命危险带来了普希金的诗《致西伯利亚》、《我的第一个朋友》。这两首诗对十二月党人是莫大的鼓舞，坚定了他们与沙皇斗争的信念和决心。

1830年8月7日，十二月党人被押往彼得罗夫斯克工厂苦役监狱。赤塔居民自发为他们送行，望着十二月党人背影，赤塔人泪如雨下……

老张走下车来，发现站台上满是忙着与旅客交换物品的当地人。因为他下车晚，人们没有注意到他，而老张一个心思来旅游，没带什么“宝物”。

“达瓦里西！”（俄语：同志）

老张懂俄语，循声而去，发现车窗下站着一个俄罗斯老太太，显然刚才是在敲窗。

老太太带着一本大画册，递给了老张。老张翻了翻，是一本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及风光的画册，过了时的东西。

老张并没有马上表示买不买，只是蓦然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生活得很好，用不着拿东西与外国人交换。俄罗斯老太太以为老张犹豫，便解释说，这画册对中国同志有用，因为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如果确实想要，可以少给一点钱。

老张几步便蹿回车厢，旋即出来了，从腰带包里拿出一叠卢布递给老太太。老太太双手接过，埋头数钱。450卢布。老太太的手颤抖了，这可几乎是她一个月的退休金啊！老张明白，总共不过才十几元人民币，因此又拿出些准备路上用的火腿肠，还有一罐啤酒给她。老太太不住地点头“哈拉少，哈拉少”（俄语：好），老泪横流。老张眼睛也湿润了，急忙装着去翻看画册。

车就要开了，同包厢的人骂骂咧咧地数着卢布，觉得一套“背靠背”运动服到莫斯科怎么也得2000卢布，今儿1500就出手，亏了。老张凝望窗外，俄罗斯老太太并没走，泪眼注视着老张，叫人心酸。

喧闹的车站向身后退去，老张望着窗外广阔无垠的原野，良久无语。

中国人过去也有过一面大谈伟大成就，一面老百姓却缺吃少穿的历史。毕竟是历史了，但愿不会再现了。

（三）贝加尔湖，永远的梦

大轿车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飞驰。从伊尔库茨克出发穿过现代化的建筑群、古老的乡村、连绵的丘陵。突然，发现了与地平线连成一片的平静、蔚蓝的水面。到了，贝加尔湖。

天边像撒上一层雪一样呈现出一片白色。贝加尔湖——西伯利亚的明珠，简直就是一望无边的大海。贝加尔湖湖形狭长，从东北向西南逶迤。

长 636 公里，平均宽 48 公里，最宽处 79.4 公里，面积达 3.15 万平方公里。湖面海拔 456 米。湖水深邃，平均深 730 米，中部深达 1620 米，蓄水量 2.3 万立方公里，是世界上最大最深的淡水湖。

老张还是在中学时就知道，贝加尔湖中国古称“北海”，曾是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主要活动地区，汉代苏武牧羊即在此地。“贝加尔”一词源于布里亚特语，意为“天然之海”。大约在 2000 万年前，这里曾发生过强烈地震，很大的一块土地整个塌陷下去，形成了巨大的盆地。所有的动物、植物都葬身地下，只有湍急的河流向盆地奔流，形成大瀑布，不断注入盆地。大小 336 条河千百万年来源源不断注入贝加尔湖，只有安加拉河源于此湖，向北汇入叶尼塞河。

湖水出口处，有名曰谢曼斯基的巨大圆石，兀立中流，离两岸各约 500 米。当河水泛滥之时，水面几乎淹没巨石，圆石宛如滚动状。相传远古大力士贝加尔，有独女名安加拉，听到海鸥赞美英勇的青年叶尼塞，便生仰慕之心，终日思念。其父不允，反命其嫁给丑汉伊尔库特。一天夜里，安加拉乘父酣睡，偷偷出逃。贝加尔醒后觉察，大怒。急忙投以巨石，想拦住女儿去路。巨石坠落湖口，即为现在的大圆石。

贝加尔湖湖岸群山环抱，溪涧错落，原始林带苍翠欲滴，风景奇丽。在东岸，奇维尔奎湾像王冠上珍贵的宝石一样绚丽夺目。从湖的一侧驶向奇维尔奎湾，可以看到许多郁郁葱葱的小岛，它们像卫兵一样守卫着港湾。湾里水并不深，在夏天克鲁塔亚湾是浴场，冬天是溜冰场。在西岸，佩先纳亚港湾像马掌一样钉在深灰色岩群之中。港湾两侧矗立着大大小小的悬崖峭壁。

有一种称为高跷树的松树是贝加尔湖的奇观之一。它们生长在沙土的山坡上，大风和雨水从树根下刮走和冲走了表层土壤，而树根为了生存拼命扎入贫瘠的土壤中。老张孩子般从架空的树根下钻来钻去，攀上跳下。

贝加尔湖湖水含杂质极少，透明度达 40 余米，仅次于日本北海道的摩周湖，享有“西伯利亚明眸”之美称。伟大的俄罗斯作家契诃夫写道：“贝加尔湖异常美丽。难怪西伯利亚人不称它为湖，而称之为海。湖水清澈透明，透过水面像透过空气一样，一切历历在目。温柔碧绿的水色令人赏心悦目。岸上群山连绵，森林覆盖。”

贝加尔湖又有“富湖”之称。湖中有水生物 1800 多种，其中 1200 多种为特有品种，如凹目白鲑、奥木尔鱼等。湖畔辽阔的林地中有多种动物栖止，如黑貂、松鼠、鼬、马鹿、熊、猞猁、水獭、野猪等。湖中还有两怪，一是有名为鲑鱼的稀有鱼种，绯红色，无鳞，鳍像大蝴蝶的翅膀，身子透明，在亮光下整个骨骼清晰可见。该鱼奇在不产卵，而生小鱼。另一怪是湖中海豹，即北欧海豹。这种海豹原本生长在北冰洋，毛皮色泽美丽，质地优良，是上等皮货。它是如何来到贝加尔湖定居的，虽然有过无数种推测，但迄今仍是未解之谜。传说贝加尔湖和北冰洋之间曾有一条地下河，海豹乃循地下河游来。但现在地质学已证明，过去和现在从未有过这样的地下河道。不管怎样，神奇的传说和怪诞的现实给贝加尔湖平添了魅力呼唤着人们去了解她，热爱她。

（四）让历史告诉未来

目前在独联体国家，尤其是在俄罗斯、乌克兰等国，纪念列宁、斯大林

的建筑物，越来越难以见得到了。有的列宁塑像倒是还在，但不是被喷涂了油漆，就是被推倒在地。

列宁和斯大林毕竟是无产阶级的导师，确也领导了一个国家走向强盛，是影响了几千万人的理论家、思想家。他们的功过自有后人评说。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在苏联、俄罗斯史册上，他们应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否则便无公允可言。

正是基于这种思想，老张很希望到列宁墓和列宁纪念馆看看。

红场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著名广场。包括中国人在内，许多人以为“红”场与革命性质有关联，其实不免牵强。15世纪90年代莫斯科发生了一场大火灾，火灾后的空旷之地便形成了广场，曾被称为“火烧场”。17世纪中叶起称“红场”。究竟为什么称红场？老张问了许多俄罗斯人，他们自己也讲不清。

红场长695米，宽130米，总面积为9.035万平方米，呈长方形，南北长、东西宽。红场是莫斯科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17世纪莫斯科从波兰贵族军队手中解放出来时，米宁和波扎尔斯基公爵的军队曾从红场开进克里姆林宫，历史上反封建起义的群众曾不止一次从四面八方冲进红场；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中，这里曾发生激战，工人和士兵从红场攻下了克里姆林宫；十月革命胜利后，红场成为苏联人民举行庆祝活动、集会和阅兵的地方。1991年“8.19”事件，这里更是人山人海，热闹非凡。

列宁墓就在红场克里姆林宫墙正中的前面。1924年1月27日装有列宁遗体的水晶棺安放在此。当时陵墓为木结构，1930年改用花岗岩和大理石建造。卫国战争后，更新了水晶棺，陵墓内部重加修葺。1974年在红场改建同时，对陵墓进行了修整。陵墓结构与色调肃穆凝重，外面镶嵌贵重大理石、黑色和灰色的拉长石、深红色的花岗石和云斑石。墓前刻有“列宁”字样的碑石净重60吨。陵墓一半在地下，一半露出地面。墓顶是平台。全民节日里，往往在此检阅游行队伍和武装部队。沿黑色大理石台阶而下，转弯进入陵墓中心——悼念大厅。列宁安详地躺在水晶棺里，身穿黄色上衣，胸前佩戴一枚红旗勋章。四季常青的杉树围簇在水晶棺周围。陵墓每周开放两次，来自各地及国外的游人排着队肃穆进入大厅瞻仰列宁遗容。看完列宁墓，许多人会再待一会儿，观看墓前守陵的士兵换岗仪式。仪式庄重而威严，令人肃然起敬。

一般人以为列宁是在克里姆林宫内的住处逝世的，其实不然。1924年1月21日18时50分，列宁在莫斯科东南35公里的哥尔克村逝世。当时他居住在十月革命前曾是莫斯科市长赖因博特的庄园里。列宁的房间在庄园北边小楼的第二层，房间面积约12平方米，陈设十分简单。写字台上放着报纸、杂志、书籍、信封和印有“人民委员会主席”字样的公函纸。列宁生前使用过的桌椅、手杖、眼镜等均按原样陈列。列宁逝世前两天，夫人克鲁普斯卡娅读给他听的杰克·伦敦的小说《热爱生命》一书，也原封不动地摆在桌上。列宁卧室旁是列宁夫人及列宁妹妹的卧室，另一间屋是客厅兼饭厅。一楼还有一部列宁使用过的老式电话机。庄园里古树参天，景色清幽，列宁和高尔基等常在园中散步。园中有一长椅，是他与同志及家人休息和笑谈的地方。

老张曾十几次地看过苏联电影《列宁在十月》。其中有一段列宁被刺的故事。现在老张在中央列宁博物馆里，看着那件列宁被刺时穿过的大衣，大衣上有暗杀分子用手枪打穿的弹孔，大衣旁是凶手的手枪、子弹及4个空弹

壳。这个博物馆是纪念列宁的规模最大的博物馆。馆内有 34 个展厅，共有 12.5 万件展品。收藏有大量的列宁的手稿、遗物和著作。老张前往参观这一天，正碰上一些群众抗议有人提议关闭此馆而挪作他用。他们举着标语，上书“列宁和我们在一起”、“誓死保卫列宁”等口号，在馆前静坐示威。

老张向游行募捐箱投了一叠卢布，他自己也没数有多少。提笔在留言簿上写了“让历史告诉未来”几个字，末了又用俄文写了一遍，旁边的人看懂了，纷纷过来与老张握手。老张又感到有些像在赤塔与俄罗斯老太太打交道的感觉，很不是滋味。

（五）接受不了的艺术

在莫斯科老张可有熟人，他的一个老同学王磊，现在被尊称为王先生，就在莫斯科的一家美术馆工作。前两年，这位他曾称为“大迷糊”的王先生来到莫斯科进修，由于成绩优异，破格被一家美术馆聘了去，后来就匆匆地在这里成了家。老张听说他搞过两次个人画展，在莫斯科已小有名气。此次来莫斯科当然要去看看他。

王先生的家十分宽敞，装饰也很华丽，“他乡遇故知”，两人相见倍感亲切。在老张的眼中，王磊和从前没什么两样，还总像睡不醒的样子，那时同学都叫他“大迷糊”。岁月不饶人，转眼都已步入中年，两人感叹岁月的无情，不知不觉中聊了好一阵子，最后王磊执意让老张住在了自己家中。

其实，来到莫斯科，老张除了要看看老同学外，最感兴趣的就是能去莫斯科大剧院观看一场芭蕾舞。对于舞蹈，老张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他认为，舞蹈如同绘画，必须反映真实，唯有真才能体现美，他在绘画中就一直遵循着这一哲学。

一天晚上，两位老朋友从莫斯科大剧院观看芭蕾舞出来，开始谈起了舞蹈。王先生告诉老张说，现在莫斯科最盛行的是脱衣舞，许多夜总会、酒吧、咖啡馆等每天晚上都有脱衣舞表演。培养这些舞女的学校在莫斯科已有几家，而且生意都不错。老张虽从未看过脱衣舞，但知道这在西方一些国家十分盛行，却没想到在莫斯科也这么普遍。

事情也的确如此。俄罗斯向西方国家的全面开放导致了性商业的泛滥；加之国内物价飞涨，经济萧条，致使俄国越来越多的年轻女郎从事性行业。脱衣舞培训学校也就是迎合了这股浪潮。它就像一台机器，源源不断地向社会提供一批又一批舞女。

王先生答应带老张去参观一所脱衣舞学校。

某个星期六下午，老张跟王先生来到了一所名叫拉普洛夫的脱衣舞学校。这所学校是由妇科病专家叶甫根尼·拉普洛夫创办的，校名也由此而来。拉普洛夫曾一直研究与妇女有关的各种问题，职业对象就是妇女。他认为无论是事业，还是家庭，一个女人的全部世界就是用她们的身体来作交易。他说，脱衣舞是肉体的交易，靠肉体来挣钱，但与卖淫不同，因为对她们来说，展现舞蹈才能才是最重要的。

老张对此不能苟同，他只想知道莫斯科的脱衣舞与西方相比到底有没有不同。

其实，莫斯科兴办脱衣舞学校才刚刚开始，迄今只有几家，而那些崇拜西方生活的少女就已把它当作自己实现梦想的大摇篮了。因此，这些学校获

得了非常理想的经济效益，并且其中一些创办者也以高贵者的身份步入了社会的名流。

这所拉普洛夫脱衣舞学校不是很大，只有几间训练室，学员也不到 100 人。王先生介绍说，这是短期培训学校，一般 2—3 个月一期，分为初、中、高三级，学费比较昂贵，每期大约 3000—5000 卢布。听着王先生的介绍，老张在一间初级训练室的门口停了下来，里面正放着动听的乐曲。他看见 20 几个姑娘正在跟着音乐的旋律，练习舞蹈的基本动作。看来这的确是艺术。在老师的指导下，姑娘们练习着怎样扭动腰肢，怎样熟练地解开衣服的扣子等，每一招，每一式都富有挑逗性。王先生常来这里给姑娘们画像，因此，他这时已经摆好画板，开始为她们的素描了。说句老实话，老张对这种舞蹈还真有点接受不了。他不明白，难道就是为了钱，这些来自莫斯科和俄罗斯其他地区的年轻姑娘就成群结队地涌到这里来，希望能学到脱衣舞的真技，然后到国外去出卖自己。老张不想再想下去，转身走出训练室。那富有刺激性的音乐声仍在继续着。

可别以为这家脱衣舞学校是容易进的。有专门的招生委员会负责招生工作。这里的招生条件十分苛刻，应招的姑娘身材必须匀称，身高要在 1.70 米以上，体重不能低于 60 公斤。而且她们的腹部、背部等部位都不能有疤痕。如果哪位姑娘具有舞蹈才能，委员会就将考虑优先录取。除此之外，这些女郎还不能有诸如吸烟、酗酒、吸毒等恶习。如果过了这几关，就可在脱衣舞学校学艺了。被录取的学员中，有刚刚毕业的高中生，有厌烦工作的服务员、理发师、护士等，还有妓女。

王先生这时也跟了出来，“老张，随便画几张，留个纪念，机会难得，这些姑娘都是很乐意配合的。”在王先生的一再要求下，老张来到了一间中级班教室。恰巧这里的姑娘们正在休息，王先生上去说明情况后，教室里立刻吵了起来。老张也听不清这些姑娘们叽叽喳喳地说些什么，就看她们中有几个竟围了上来，争着摆姿势，有的甚至只穿着内衣让老张给她们画像。老张真有点尴尬，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这些姑娘都喜欢接受画家的画像或记者的采访、拍照，让他们去宣传自己的身体，因为这样可以使自己尽快出名，以便毕业后能被国外的哪位老板或阔佬聘请去。由于休息时间不长，老张硬着头皮和王先生抓紧时间画了三、五张，都赠给了画像的主人。这些姑娘高兴得过来拥抱老张，吻老张，老张紧张得一动不动。见老张这种憨相，姑娘们又叽叽喳喳地说笑起来，教室里沸腾了。

后来老张又了解到，这所学校开设的课程以舞蹈为主，其次还教一些美容、服饰等知识，但学校绝不教学员外语。校方认为，学校是她们的经济人，一旦她们自己掌握了外语，就会私自与其他外国经济人联系，这对校方是不利的。而且，学校还认为，跳脱衣舞，动作、手势、语言和面部表情才是与观众交流的最好方式，作为一名脱衣舞女，会不会外语是不重要的。

老张从这所脱衣舞学校出来，感觉不是很好。“也许自己不够开放，太古板，还是生来就与此格格不入？”老张自问着。

老张虽接受不了，但莫斯科的脱衣舞学校却越办越红火。目前，莫斯科的各脱衣舞学校培养出的舞女都十分抢手，她们除有固定的舞台外，还经常得到外国商人的邀请，参加一些晚宴和晚会，经常会看到几个商人出高价争一名舞女的事情。舞女的收入一般都很高。一个名叫维娜利娅的舞女说，有钱人都喜欢看这种色情舞蹈，她们凭借自己的身体可以征服整个世界。除了

俄罗斯本国外，意大利、沙特阿拉伯、西德等国都争着向学校“订购”毕业学员，以丰富他们国内的“夜文化”。如果你随便地问一位外国人：“俄国的什么企业在不停地工作？”他们就会随口说：“把少女推进火坑的色情业。”

（六）阿尔巴特街“巡礼”

在莫斯科没有去过阿尔巴特大街，就如同到了北京没有去王府井大街一样。

阿尔巴特街起自布拉格饭店，一直延伸到外交部大楼附近，近两千米长。这条街原本并不出名，只是近年来才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现在连一条与之平行的较宽阔的加里宁大街也改名为新阿尔巴特大街了。

老张几乎没有理由不去阿尔巴特大街，因为那里不光是可以买到紧俏货和便宜货（其实越来越不便宜），而且还是个艺术品的集散地。

阿尔巴特街禁止一切车辆通行，是步行街。街两旁店铺林立，房屋建筑均为 17、18 世纪的风格，古朴而庄重。在阿尔巴特大街上，游客们往往不是去走进商店购物，而是在街旁、店前与提篮、摆摊的卖主打交道。

这里什么都卖。你想要什么有什么，有美国的香烟，日本、南韩的小电器，印度的香料，非洲犀牛角，中国的避孕套，甚至原苏联军人的军装、望远镜及皮靴。当然有不少东西是很有俄罗斯特色的。

茶炊是俄罗斯人传统的饮茶器皿。茶炊兼有使用及收藏的价值，外国人对它的收藏热有升温趋势。老张在一个地摊上看到一字排开有五个茶炊，大小不等，做工精细。卖主标价从 800 卢布到 4000 卢布不等，并表示欢迎支付美元。

“套人儿”是俄罗斯传统的集雕刻和绘画于一体的工艺品。过去“套人儿”的绘画单一，画的一般是娃娃脸，故也有“套娃娃”之称。其巧妙在于一个约 15 厘米小人里面套了几个甚至十几个更小的人儿，一个比一个小，然而每个之间衔接得松紧适度，绝无紧涩而套不进去或过于松垮而荡空的现象。这不但归功于民间艺人高超技艺，也与俄罗斯优质的白桦木有关。

老张在北京曾见过“套人儿”，当时确为这看似简单，实际工艺复杂的玩意儿惊喜了半天。今天更让他惊奇的是“套人儿”的图案。老张发现不少“套人儿”最外面一个画的是现俄罗斯总统叶利钦，接着里面依次为戈尔巴乔夫、契尔年科、安德罗波夫、葛罗米柯、勃列日涅夫、斯大林、布哈林，最后是最里面的列宁，自然中间有些老张叫不上名字的原苏联主要领导人。这恐怕也是公开性的一种表现吧，没发现有“套人儿”画上美国历届总统的。

阿尔巴特街街头诗人算是比较有煽动性的人物，其实这些人是业余诗人。但不能否认他们无论从诗歌艺术还是政治见解，都有较深的功底。有时候当你正在街上漫游，远处会间或传来喝彩和鼓掌声，那必然是诗人在“大放獠词”。听一位诗人在高声朗诵自己的诗：

你仅仅给人民以自由，
人民已不习惯忍耐。
大好形势在明年，
人民还得勒紧裤带。
见鬼去吧，500 天！（指政府 500 天紧缩经济计划）
我们要牛奶，

我们要面包，
今天，就是现在！

相比之下，有一块较安静而高雅的园地。老张找到了同行，街头画家。阿尔巴特街的画家以给游客画像为主，有的也卖风景油画。画一个素描头像，用的时间较短，成本也低，买卖双方都容易接受。现在画一张头像要花 200 卢布左右，相当莫斯科人月平均工资的十分之一多一点，还是很便宜的。

老张发觉街上画像及买卖画的画师并不像别人告诉他的数量很多，便与一位画师攀谈起来。画师告诉老张，有许多人到以色列作画工去了。原来以色列商人发现了阿尔巴特街这块藏龙卧虎之地，发现这里的画师能给自己带来财运，于是大量招聘画师到以色列国专门从事绘画工作，月薪 600 美元。600 美元在以色列是低得可怜的，一般技术人工月薪约 2000 美元，但对俄罗斯人来说，这笔收入简直是“天文数字”。当时在莫斯科 1 美元可兑换 150 卢布，那 600 美元就得折合为 90000 卢布，难怪画师们趋之若鹜呢。但与此同时，他们那种自由的艺术风格，便荡然无存了。

老张很想练练笔，便提出帮那位画师给顾客画一张素描头像。他拿过画板，端详了一会儿坐在面前的一位中欧妇女，开始画起来。老张虽教美术史，绘画的功夫毫不逊色。画惯了东方人细腻的脸庞，再画这位大概是德国或是奥地利女人的线条分明脸庞更是不费功夫，不一会便画完了。俄罗斯画师显然被中国同行的技艺折服了，不住地称赞老张。那位妇人更是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老张把像画得很象她本人但看上去更年轻漂亮些。女人喜欢的就是这些。她立即付了 200 卢布并拿出一枚两马克的硬币送给老张，两马克要比 200 卢布值钱多了。老张悉数送给那位画师，作为交换，请他带路买一个望远镜。

画师领着老张来到“维克多·崔墙”附近，这是阿尔巴特街比较乱的地段。维克多·崔是朝鲜人，生在苏联，专唱现代摇滚歌曲，是青年人最喜爱的歌星之一。崔不幸于 1990 年在拉脱维亚海滨公路车祸中身亡。歌迷为之悲恸不已，便在阿尔巴特街的一面墙上画了崔的像，写满了纪念他的标语，花花绿绿涂写得乱七八糟，此墙因此得名“维克多·崔墙”。这里出售望远镜的多，有的还是正宗的军用品。画师帮着老张大肆砍价，以区区 4 美元买了一个单筒拉管望远镜。老张早有买望远镜之意，也相中了单筒拉管式的。在国内时曾专门到北京西郊双榆树中友公司购物中心选购，因觉得标价 130 元人民币太贵而未买。今天则以不到国内价格四分之一的钱买了心爱之物，也算是遂了一个小小的心愿吧。

（七）难得当一回“名流”

索契是俄罗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城市，位于黑海东海岸，北依大高加索山脉西段，人口 30 余万，是俄罗斯也是原苏联最大的海滨温泉疗养地。

索契原为古希腊和罗马商人的贸易重镇，8—10 世纪，宗教很发达，至今近郊仍有当时的寺院和教堂遗迹。19 世纪成为乌比赫部族所在地，称沙契，“索契”之名即由此而来。1838 年在此建立亚历山大军事要塞，后改称纳瓦金军事要塞，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被摧毁。1896 年在原址建市，称索契。

索契属湿润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温度为 13.3℃，夏季日平均温度为 21.3℃，日照充足，索契作为疗养地，是因为有名泉马采斯塔矿泉，马采斯塔意为“烫水”。这里自然涌出的水，温度可达 22℃，人工钻探涌出的水，温度

高达 38 米，有医疗奇效，早在古罗马时代就闻名遐迩。索契沿海疗养区延伸到 150 公里，大小疗养院、休养所、宾馆、别墅星罗棋布，每年有 250 万国内外游人来此度假休养。

老张在国内曾去过黑龙江五大连池市，领教过温泉的滋味。因此对马采斯塔矿泉兴趣不似很大，径直奔索契市内的里维耶拉公园了。

索契里维耶拉公园内有索契人值得称道的两大奇观。

老张倘佯在“作家小径”上，仔细端详着小径两旁的雕像，以艺术家独有的敏锐去感受。

“作家小径”是维耶拉公园为纪念苏联及俄罗斯著名的作家而设计建造的雕像群，有列·托尔斯泰、契诃夫、阿·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等，形象逼真，神态各异，仿佛他们正在构思新作。有趣的是在已建成的雕像中，有不少作家已经是“外国”人了。

里维耶拉公园的“友谊树”是世界级的一大景观。

1934 年，著名的植物学专家费多尔·左标培植了一棵柑桔树，并在树冠上嫁接了日本橘子、意大利柠檬、美国穗桔、西班牙橙子、中国金桔等。这棵桔树每年 5 月份开花，10 月末至 11 月初便结满 45 种形状、大小、品味及颜色各异的柑桔果实。1940 年原苏联著名地极专家施密特院士首先在此树上嫁接了一个树枝作纪念。在此之后，来自 150 多个国家的元首、社会和政治活动家、议员、科学家、艺术家、宇航员等名流，亲手在此树树冠上嫁接了树枝。迄今，在这棵象征着友谊的神奇之树上，已嫁接了约 600 个纪念树枝。“友谊树”成了“名人树”。

大凡来此参观“友谊树”的客人都随身带来本国的一小包土，撒在“友谊树”下。老张没带土来，可他想嫁接一个树枝。这要是在从前，甭说老张，就是比老张再高贵些的中国人也没有这福份，而现在就不同了。

“友谊树”前熙熙攘攘的场景已不多见，只有慕名而来的闲散的俄罗斯及外国游客。老张试着与“友谊树”管理人员搭讪，称赞“友谊树”如何如何好，他本人如何如何向往，希望能为“友谊树”做些“贡献”等等。管理员是位年纪约 60 开外的园艺师，对这位来自中国，却能讲俄语的人印象颇好，欣然同意了老张的“非份之举”，但暗示老张要有“破费”。

老张即掏出 5 美元递给管理员。

“请跟我来。”

绕过“友谊树”树丛墙，又有一个小园子，几株桔树约有一人高。零星结着几个青桔子。

“看见东边这一棵了吗？这是西西里柠檬，旁边这一棵是日本蜜橘。过去意大利人和日本人追随德国人，都是法西斯，你把它们嫁接到一起吧”。

老张明白了，不光他一个人有“名人”瘾，难怪老头那么痛快应下来。也好，权当在那棵“友谊树”上嫁接吧。

说是嫁接，其实不过自己选定一树枝，由管理员剪下来，再到要嫁接的树上选一枝叉劈开，将削得扁平的枝条嵌入叉中，捆扎好即可。至于老张选中这一枝能否成活，很难说，且不说夏季不是嫁接的季节。那老张是何许“名人”？不会有人再去理会这棵替代树上的无名枝的，但老张确实确实也当了一回“名流”。

（八）华沙郊外公路之劫

盛夏的华沙并不十分炎热，老张在这里参观参观画展，看看文艺节目，偶尔还同街头的画师攀谈几句，交流一下绘画艺术。时光过得很快，老张的心情这几天也格外舒畅。当他准备乘车游览与波兰接壤的俄罗斯布列斯特城时，却听到了这样的传闻，华沙——布列斯特的公路上盗匪横行，游客遭勒索、抢劫的事情不断发生。目前这条公路已令游客望之生畏。

过去的华沙——布列斯特公路曾是一条繁忙的旅游热线，7、8月间每天从这里去俄罗斯布列斯特城旅游的人数以千计，而今天这里却失去了往日的风采。老张从来没有遇到过强盗，不知是好奇还是喜欢冒险，他就偏偏想去瞧瞧强盗到底长的什么样。

他简单地收拾了一下，随身带了些零花钱，放在了自己认为最安全的鞋帮里，又背上了一个素描夹子，匆匆出发了。

事实上，随着东欧和原苏联经济状况的日益恶化，这些国家的社会形势也十分危机。早已绝迹的黑社会组织、武装匪帮又纷纷抬头，一些地痞流氓则趁机更是为所欲为，气焰嚣张，而警察对此却无能为力，人们就只好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心理，是绝不敢以卵击石，白白送命的。令人奇怪的是，华沙——布列斯特城的公路大部分在波兰境内，但这里经常出没的强盗、黑帮却都是原苏联人，他们拦路抢劫的“生意”真是越做越大。

大概老张有点不识趣。

从华沙乘上了去捷列斯波里城（与布列斯特城很近的一座俄罗斯城市）的旅游车，车是崭新的“奔驰”牌大轿车，挂着波兰的车牌号。车上的游客不到20人，大多来自于西方，老张用艺术家的眼光打量着每个人，心中暗想，看来这些人大概都和他一样，“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第一站来到了华沙郊外的一个自由市场，其实这里是一个规模庞大的商业区，由于近来秩序混乱，大不如以前繁荣了。车就停在了一家收费停车场中。正当老张准备下车时，从车下突然上来一个年轻人，从外表上看，这名男子好像是白俄罗斯人，或是乌克兰人，个子高高的，皮肤很黑，但两眼看上去很亮，挽起袖子的胳膊上清晰地刻着一个鹰的图案。只见他把手向上一举，然后又慢慢地压下来，示意大家别乱动。“这个停车场归我们保护，每辆车要收费100万兹罗提（相当于75——80美元），如果你们合作，我将保护你们的车和你们物品的安全，但如果你们拒绝的话，就谁也别想离开半步！”这名男子操着一口浓重的地方口音。老张看看四周，发现谁也没动，自己就只好当作什么也没发生。“快点，你们这群一毛不拔的犹太人！”显然，这个年轻人有点不耐烦了。这时，车下又上来两个男子，每人手里都拎着个包。“少跟他们废话，每人10万。（兹罗提）”其中一个边说边开始强硬地从第一位游客收起……老张就这么糊里糊涂地让人抢走了10美元，他见其中一个男子闲在那里，就搭讪地用僵硬的俄语问：

“你们是一个组织吗？”

“是的，我们是‘雄鹰旅’的成员。”这人也许认为老张是一名受人尊敬的学者，就认真地告诉了他。

“雄鹰旅”，老张刚到华沙时就曾听到过，这是一个很有势力的黑社会组织，抢劫、绑架、暗杀无所不为，最近警方又透露说，这个组织有贩毒嫌疑。

“难道你们不怕警察吗？”

“我们不怕穿制服的警察，只怕便衣，但我们知道怎么对付他们：给点钱，贿赂一下，一切就都没事了。”老张听了，真是有点无可奈何，后悔自己当初不该这么冲动。

从每人那里收上来的钱，几乎都装进了这三个人的腰包，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来这里收费时，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拿出5万兹罗提给他（看上去是波兰人），并在他们的同意下，这个工作人员给司机开了一张收据，算是“符合”手续。司机又接过了这3个人递给的一张单子，说是保护这辆旅游车到达布列斯特一路的安全的通行证。正当老张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时，突然听到车外一阵争吵，探出头去一看，发现几个年轻人正把两位拎着大包的中年人从市场上推了过来。老张问一个雄鹰旅的人，此人告诉他说，那两个中年人是独联体国家的商人，他们不懂规矩，拒绝每天向他们交10万兹罗提的安全税，这是准备教训教训他们。听到这里，老张真感觉仿佛到了强盗窝，哪还有心思再买什么东西，只好闭起眼，琢磨着鞋帮里的百十美元会不会被这群强盗勒索去。

车上的人只有几个匆匆地买了点东西，剩下的都像老张一样闭目养神。

这两个小时对老张来说真难熬啊，终于车又上路了。

开出了华沙，车正驶向俄波边界时，又遇到了一个武装匪帮，大约有3、4个人，几乎都是俄罗斯人，身上带着武器，一身士兵装束。他们中一个人摆手示意车停下来，另外两个干脆端起了手里的冲锋枪。老张一看就明白怎么回事了，他听说，遇到这些人，你如果拿不出钱来是要吃苦头的。偷偷地从鞋帮里拿出50美元放在了上衣内侧的口袋。

“每人50万兹罗提，不然就要你们的脑袋。”三个人气势汹汹上了车。车上乱嚷嚷的，有的人哀求说没那么多的兹罗提了，少要点吧。“那你就拿出等价的卢布或美元出来吧，30美元或5000卢布，少一点就得从车上给我滚下来。”这些人蛮横地命令着。这时，司机把刚才“雄鹰旅”的通行证递给了其中一个人，这个人刚看了一眼就歇斯底里起来，他把那张单子撕得粉碎，满脸愤怒地狂喊着：“我最看不起‘雄鹰旅’的人，根本就不想提到他们，因为这些人从娘胎里出来就胆小，个个贪生怕死，而我们不，宁愿将自己的血流在这条公路上，甚至为此挨枪子。谁要是再提起他们，我就砸烂他。”边说还边用拳头猛敲车的棚顶，仿佛要把一车人都吃掉似的，司机忙转过身去，像是惹了祸似的，一句话也不敢讲了。正当这些人忙乱一团，老张已快速地拿起了笔和速描板开始为这几个画像。正当画第三个人时，其中一个家伙站到了老张的跟前：“你想拿回去留做纪念吗？见鬼去吧！”说着就要动手撕。老张忙拦住说：“我是搞绘画的，画几幅画送给你们，算是做个朋友。”这时另外两个也凑了过来：“他是中国人，画得挺像，看，这张是我……”其中一个显得十分满意。

老张就这样捡了一个大便宜，这些强盗只收了他10美元。

来到了布列斯特，老张仍心有余悸，唯恐从哪里又跳出几个强盗，但这里的秩序是不错的，过了一阵子老张的心才放了下来。后来他听说这样一件事：前不久明斯克一家企业的司机（白俄罗斯人），驾驶一辆货车在华沙——布列斯特公路上行驶时，遭到黑社会匪帮的强劫，他企图开车逃跑，结果黑社会的人开车追了上来，并朝他开了枪。这名司机胳膊受了重伤，愤怒之下把追上来的小轿车撞到了路两旁的排水沟里，但后来这位白俄罗斯人还是没能逃脱魔爪，遭了一顿毒打，并成了残废人。

老张这回真是亲眼看到强盗的面孔了，花上 20 美元大概也“值得”吧。

中国人去原苏东地区商贸及投资指南

新东欧和原苏联各独立共和国正吸引着中国的各类企业前去进行贸易洽谈和经济合作谈判。中国已有成千上万个体工商业者在这一广袤地区落脚生根。越来越多的中国国营企业和私人企业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浓重的商贸兴趣。本书第一部分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早期开拓这一地区的华人创业和生活情况，为使读者对这一地区的历史、经济、企业、商贸政策、华人分布等情况有更深了解，以便在经商、投资之前对这一地区的总体情况有较清醒的认识，附录部分专门介绍这一地区的国情或相关政策。所用资料最新用至 1992 年 8 月 15 日。

东欧（地理意义上的东欧），被西方地缘政治学家们称为“世界地缘中心”。尽管在政治裂变和改革受挫的当前阶段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但这一地区物博人稀，有良好的基础工业和受教育水平相当高的人民。取之不尽的资源和高水平的人民素质将使这一地区蕴藏着巨大的经济潜力。但列国发展水平不尽相同，需一一介绍。

匈牙利

一、华人分布概况：

至 1992 年 8 月 20 日，在匈牙利仍有 1 万 6 千余名华人，分布在布达佩斯（8 千余人）、米什库尔茨（2 千余人）、佩奇（2,500 人）、塞格德（1,000 左右）、卓尔（1,000 左右）和松博特海伊（800 左右）等地。

匈牙利是华人进入最早、开拓事业最广的东欧国家。目前，有约 2100 华人获得短期居留权，100 余人取得移民权。华人公司有 1400 余家，仍在运行的占 1/10。华商企业有餐馆、服装加工厂、食品厂、中医诊所、旅馆、豆腐作坊、烤鸭店、商店、信息中心、报纸及华人事务所、理发馆、按摩室、电器修理部等等。无产业者多做摊贩、卖艺或在华人企业渠道打工谋生。匈牙利是东西方转口贸易的好场所，但当地华人目前还没有打开渠道。

华人在匈赚钱的黄金期是 1988 年 10 月至 1991 年 7 月，如今华货深入到匈牙利各家各户，价格大降，又由于匈牙利限华驱华，人头生意难做，贩人生意基本中止。早期进入匈牙利的华人绝大多数赚了不少货物差价之利，获纯利在 10 万美金以上者有成千上万。目前华人总的情况是不景气。为好步人后者戒。

二、匈牙利国情概况：

匈牙利位于欧洲中部，是一个内陆国家，面积 9.3 万平方公里，人口 1062 万（1990），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2%。文明程度较高，文化体育事业高度发达。

匈牙利地处喀尔巴阡盆地的多瑙河中游中原，全境属大陆性温带阔叶林气候。气候温和，冬季气温-1~3℃，夏季 20~26℃，年日照近 2000 小时。降水适中。

这是一个土肥水美、资源丰富的国家。有植物 2165 种，自然植物覆盖率

较高，野生动物有 3.2 万种。矿物有铝土矿、煤、石油、锰、天然气、铀等。铝土可靠储量为 1.5 亿吨，居欧洲第 4 位。地下热水蕴藏丰富，分布在全国 2/3 的地区，平均温度达 98 。内河及巴拉顿湖（欧洲第一大淡水湖）鱼产丰富。

匈牙利主要民族是马扎尔族（匈牙利族），占全国人口的 98%，讲马扎尔语，属芬兰—乌戈尔语系，文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居民主要信仰天主教和基督教。

匈牙利国庆节是 10 月 23 日。8 月 23 日是宪法节和传统的面包节。

三、匈牙利外国人投资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 1、凡外国人在匈牙利的投资得到完全的保护和保证。
- 2、因对外国投资者的资产实行国有化、被征用或因采取类似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措施而造成的损失，应按实际价值及时予以赔偿。
- 3、国家通过采取措施的行政管理机关进行赔偿。在发现违犯法规时，可请求法院对有关赔偿问题的行政管理决议进行审查。
- 4、赔偿总额应按照投资时所用的货币支付给有关人员。

第二条：

在法律适用方面：

- 1、外国人是指被外汇法规视为外国人的法人和自然人。
- 2、外国人在匈牙利的投资是指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经济公司、外国人自己建立的经济公司以及通过外国人取得的经济公司股份（以下总称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

第三条：

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可遵照 1988 年关于经济公司问题的第 6 号法律（下称联合经营法）规定的方法和形式建立。这样的公司应参照本法中的不同规定和补充，执行联合经营的规定。

第四条：

- 1、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可以参与创建另外的经济公司，自己也可以创建公司，并可按照第二款的限制，在运营公司中取得股份。本法中的各条款除第四章外，对此类公司无效。
- 2、外国资本占大部分或外国独资的股份公司，不能在其它股份公司里占多数股份。

第五条：

对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由主管该公司登记注册的法院（下称公司注册法院）实行法律监督。

第六条：

若国际协定与本法规定不同，应按国际协定的规定办理。

第二章 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的 建立以及运营公司股票取得

第七条：

如果外国人有权在国内开办公司或者按照国内权利业已对其进行了企业（或其它经济方面）的登记，就可以参与创建经济公司以及作为一个成员参加公司。任何一个我国的自然人和法人都可以成为股票的持有者。

第八条：

国家、法人、未获得法人地位的经济公司及自然人，都可以同样地按照联合经营法之规定作为一个国内的创办者，或作为一个成员参加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

第九条：

1、除法律不允许或加以限制的以外，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可以从事任何经济活动。

2、凡创建有外资参加的企业或参加有外资的企业毋需得到外汇当局的批准。

3、在外国股份尚未达到第二款规定的程度时，创建经济公司和参加经济公司就毋需经过外汇当局或其它方面的批准。

第十条：

1、根据第九条第二款提出的申请，应报请财政部长批准。

2、申请书一式多份用匈牙利语书写。

（1）属于创建新公司的情况，应呈送匈牙利方面的创建者；

（2）属于外国投资的情况，应呈送外国方面；

（3）属于在运营取得外国股份的情况，应呈送该公司，在有委托时，申请书也可由别人代呈；属于第（2）点所列的情况，应指定国内的呈送人员。

3、申请书内容应包括：

（1）匈牙利成员和外国成员（创建者）的名称（公司名称）、合作形式和所在地址（居住地）；

（2）公司形式、公司注册地点、公司所在地及其经营范围；

（3）运营公司的情况，递交申请时的财产状况（创建资本、注册资本），属于创建新公司的情况时，则应呈明计划用此类资本的数额；

（4）纳税及纯利润的分配方式；

（5）注明能作出判断的数字材料，介绍公司的商业政策目标。

4、申请书应附上匈牙利语的公司合同（基本章程、创建规划），属于运营公司的情况还要附上可能需要作出修改的文件。

第十一条：

1、对提出的申请事项，由财政部长负责公布联合作出的决议，所作的否定决议，应说明原因。

2、如果不是按照规定的形式或内容呈送申请，从递交申请之日起 30 天内还可以作一次修改。从修改之日起 60 天内应对申请作出实质性决定。

3、应将第 1 款和第 2 款提及的决议送交公司注册法院一份。

第十二条：

1、对外国人用本国货币进行的投资，在国际协定没有不同规定时，必须用硬通货支付。

除非：在第 16 条第 1 款的情况下，外国成员把他那部分红利用于增加创建财产，或用来投资在匈牙利业已运营的或新建企业；

2、非货币性投资可以是任何一种有财产价值的能用于流通的行为，可以是智力创作和具有资产价值的权利。

第十三条：

1、如果业已登记入股的股票多于股份公司发行的股票，而且根据联合经营法第 155 条规定需要退回时，有外国人参与运营的公司中通过国家预算机关或金融机构办理的登记，入股股票也应该退回。

2、外国人只能取得记名股票。将不记名股票转入外国人手中时，应将其改成记名股票。在发生财产继承情况时，应当在从遗产继承之日算起的一年内，把外国继承者的不记名股票改为记名股票。

（199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

四、匈牙利有关外资的法律规定简介

鼓励外商投资，是匈牙利一项重要的经济战略决策，也是安道尔政府现行变革措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8 年、1989 年匈牙利先后颁发了外资法和企业法，1991 年重新修订外资法，从法律上给外资以保护和鼓励。本文以外资法和企业法为基本依据，就外资在匈牙利境内所能享受的权利和需履行的义务作简要介绍。

（一）税收优惠和资金转移。合资、外资企业在如下情况下可享受减、免税优惠：

1、企业利润的一半若是从加工业或旅馆业中取得的，进一步说，外资若占企业注册资本的 30% 以上，股份资本超过 5 千万福林，那么企业在投产后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内，分别可得到 60% 和 40% 的利润免税优惠。2、企业如果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从事“特别重要经营活动”，那么投产后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内，可享受 100% 和 60% 的利润免税优惠。“特别重要经营活动”包括：计算机仪器的生产，机器人的开发，机床制造业，农业及食品加工机构制造业，机械部件生产，包装技术设备生产，药物和肥料开发，蛋白质的基础研究，生物工程，节能技术开发，电信设备制造业和某些旅游业。3、外商以实物形式投入的固定资产，在进口时享受海关免税。若三年内将这部分资产转让他人，需补交海关税。投资法对免税固定资产有明确的范围限制。主要指机械、设备、配件、建筑装置、建筑材料、建筑工程器械、运输工具等生产及服务必需品。4、外商如果用在匈牙利取得的赢利，继续在匈牙利扩大再生产，可得到相当于这部分追加投资的免税优惠。

外商在匈牙利投资所分得的红利，可以以其投资币种形式自由转移出境。外商出售股份所得收入和股份资本，亦可用结业现金，以投资币种形式转移出境。

合资、外资企业的外籍职员，其工资的 50% 可以居住国货币转移出境。

（二）不动产权。合资、外资企业可以拥有开展经营活动所必须的不动产权和其它权力。

包括对不动产的购买、转卖、使用（如出租）和抵押权。唯一的限制，就是禁止出于特殊目的使用这些权力。

企业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得到不动产权。一种是匈牙利公民赠送；另一种

是企业注册后购买。企业注册后自然拥有建筑房屋的权力。但注册之前，若无特殊许可，外商以个人身份获得不动产权是不可能的。

企业取得不动产权后，需到匈牙利产权管理部门进行注册、登记。由产权管理部门证明不动产之规模、产权关系以及所有者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购买不动产的企业，需按不动产销售价格向税务机关交纳 5% 的购置税。

（三）劳动、工资制度。合资外资企业在匈牙利境内，有聘用匈牙利籍及外籍职员、管理人员、高级监督的权力。

聘用外籍人员的前提是：外籍人员得到了匈牙利内务部之居留许可，和匈牙利劳动部门之工作许可。

匈牙利正在建立自由工资制度。但为了控制通货膨胀，目前企业工资的增长只能适应在一定的限度内。外资比例超过 20% 或外资总额超过 5 百万福林的企业，不受此限制。企业雇佣人数的高限，受现行法律的限制。

企业有权替那些希望在匈牙利享受免费医疗和其它社会福利待遇的员工，交纳社会福利保障金。交纳比例为工资收入的 43%。

企业职工工资中的一部分，需用来支付退休金（10%）和交纳个人所得税。

（四）自由关税区的企业。外商可在自由关税区进行投资、开办企业。

建立在自由关税区的企业不受接受国普通海关、外汇管理条例的约束和限制，与货物周转相关的间接税收亦可豁免。此外，它们还享受直接性税收（如利润税、公司税等）的暂时减免优惠。

在自由关税区生产、装配的产品，可依据有关原则所确定的条件，发给产地证书。产品从自由关税区进口到匈牙利，可视为直接从产地国进口。从境外发运到自由关税区的商品亦视同发运到境外处理。

因储存或加工而进入自由关税区的货物，进一步说，因储存或加工之需要进入自由关税区的货物、固定资产、不动产一律免税。除此之外的，需付税。

储存货物的时间，在自由关税区是没有限制的。但禁止把自由关税区当成住所和在此开展零售业务。后者只有在海关和财政监督署的特别许可下，并且只限于满足当地需要的消费品，方可进行。储存货物及所得到的服务，需以自由外汇支付佣金。

（五）投资发展基金。投资发展基金是匈牙利政府专项拨款，旨在鼓励有助于发展国民经济重点项目的生产投资，和改善合资企业的运作条件。

1991 年这项基金达 15 亿福林。

投资发展基金优先支持那些使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经济实体。这些实体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时，可望得到资助。如建筑用水、电、煤气管道、工业用传热线、道路和工业用铁路等。发展基金用于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上，无需偿还。这部分资金可达总投资额的 20%，但总额不能超过 1 亿福林。

投资发展基金对公共事业的发展，以长期、特别低息贷款的形式予以资助。

合资和外资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可以得到来自投资发展基金的资助。条件是：它们的注册或股份资本超过 5 千万福林，而外国资本所占比例超过 30%，同时外国资本至少一半是以现金形式支付的硬通货。同时具备上述三个条件的合资和外资企业，可以申请投资发展基金。

五、匈牙利改革以来形势综述

1990年4月匈牙利举行近四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全国大选。以此为先导。具有历史意义的制度变革由酝酿、准备而推进到了操作阶段。

社会主义工人党惨败。由社会主义工人党前改革派组建的社会党(MSZP)即执政党,在选举中不尽人意。反对党如民主论坛(MDF)、自由民主联盟(SZDSZ)、小农党(FKP)、基督教民主人民党(KNDP)、青年民主联盟(FIDESZ)异常活跃。特别是民主论坛(MDF)与自由民主联盟(SZDSZ)在选举中脱颖而出,选票雄居榜首,得到大多数选民的支持,选举的结果是:

民主论坛(MDF)得票42.5%

自由民主联盟(SZDSZ)得票23.8%

小农党(FKP)得票11.4%

社会党(MSZP)得票8.6%

基督教民主人民党(KNDP)得票5.4%

青年民主联盟(FIDESZ)得票5.4%

选举中获胜的民主论坛邀小农党、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联合组阁政府。民主论坛主席安道尔·约瑟夫(Antal J'ozsef)出任政府总理。选举后的第二大党自由民主联盟、前执政党社会党等成了反对党。

—

在匈牙利政党集团中,民主论坛属中右派。它不像主张纯资本主义民主和建立完全自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由民主联盟那样激进。其全部政治观点及施政纲领建立在福利市场经济这一基点上。

1991年3月财政部长库堡·米哈依(Kupa Mih'aly)向国会递交了政府四年施政计划。总的目标要完成彻底的经济制度变革,建立一整套新的市场经济制度。头两年的任务放在经济制度变革上;后两年的经济增长和使“福利”变成自由兑换货币。此外,做好通货膨胀、失业率、经济增长、外债问题的解决和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综合调控工作。特别是头两年,除减少收支平衡方面的压力外,努力把通货膨胀控制在可以理解的范围内。

建立市场经济制度,最主要的任务是改革生产资料所有制,使所有制结构中私有制占统治地位。完成这一任务,除了鼓励个体、私营经济发展和吸收外资外,重点放在通过股份制、租赁、转让、拍卖、承包等多种形式对国有资产的重组和私有化上。

与所有制改革相配套,进行价格、财政、金融制度的改革。实行自由价格制度,国内价格与国际市场价格挂钩;实行自由利率、改革税收制度、发展证券市场,使价格、税收、利率、股票等成为调节经济生产的重要杠杆。

此外,削弱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国家今后的主要职能集中在:鼓励有效率的经济决策、调控经济危机、保证每个公民的基本生活条件。

二

民主论坛组阁之时,正是匈牙利经济处于波谷之际,通货膨胀严重,预

算赤字庞大，外债负担沉重，人民生活水平下降。

各个行业部门亦不景气。除了服务业较为兴旺外，工业产值下降、劳动生产率降低，农业欠收、贸易转轨中摩擦重重等等，各个行业部门都存在许多问题。

工业从 1989 年开始，工业产值和劳动生产率持续下降。1988 年这两项指数分别是 100/102.71989 年分别下降到 99/100.71990 年进一步下降到 90/98.3。

匈牙利有关方面认为，工业发展不景气除了部分受政策性因素影响外，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效率低的大型国有企业仍在运转，经济成份中私营企业总量、个量程度不够。

工业体制改革的措施，主要是国有资产的重组和私有化。1、股份化。对大型国有企业实行股份化，鼓励外商购股。2、转让、拍卖。对小型国有企业转让和拍卖所有权。3、租赁、承包。对中、小型国有企业出租或承包经营权。

农业 1990 年的冰雹使棉花等秋季作物收成蒙受巨大损失。直接后果是：其一，农民和国家的收入减少；其二，对额外进口的需求导致饲料价格的上升。此外，牛奶、猪肉的提价，导致消费需求下降。所有这些加剧了农业供需上的矛盾。

农业体制改革，主要集中在土地私有化上。经过一年的准备，今年 6 月《损失补偿法》出台。此法规定：对 1948 年以后被国家征用的土地，以证券的形式还给农民。土地以当时的价格计算，在此基础上，根据不同的条件，采用不同的发放比例。证券不能作现金在市场流通，但可用来购买土地和国有资产私有化过程中出售的股票等。

服务业 服务业的发展较为兴旺。这主要归功于旅游业和市场对信息、通信等方面的需求，以及小企业的灵活经营。1989 年匈牙利游客为 1420 万，1990 年达 2050 万，1989 年匈牙利服务业收入为 5.15 亿美元，1990 年达 8.24 亿美元。这其中还不包括流入黑市的外汇收入。

外贸 1990 年匈牙利与欧共体之间的贸易额已超过了与经互会之间的贸易额。对欧共体的出口达 31 亿美元，比 1989 年增长 30%。自由外汇已成为最主要的贸易结算方式。

卢布结算方式的贸易额下降。1990 年出口额比 1989 年减少 24%；进口平均降低 28%。1991 年元月 1 日起经互会国家间亦改为自由外汇结算。

根据 1991 年开始实施的外贸新规定：1、企业拥有外贸权，无需行政上的先决条件；2、需特殊许可的进口产品范围缩小；3、与经互会国家间的贸易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4、海关制度亦得到修改。

外资 匈牙利是东欧地区第一个从法律上允许和鼓励外资的国家。1990 年底外商合资、独资企业数已逾 5000，总注册资本超过 10 亿美元。1990 年底止，外商在东欧地区（苏联及前社会主义国家）投资的 50%在匈牙利。

匈牙利鼓励和保护外商投资。根据 1991 年元月修改后的外资法：1、合资企业利润的一半若是从加工业或旅馆业中取得的，进一步说，外资若占企业注册资本的 30%以上，股份资本超过 5 千万福林，那么企业在投产后的第一个和第二个五年内，分别可获得 60%和 40%的利润免税优惠。2、企业如果在具备上述条件的前提下，从事“特别重要经营活动”，如高科技开发等，那么投产后的第一和第二个五年内，可享受 100%和 60%的利润免税优惠。3、企业固定资产的进口，享受海关免税优惠。若三年内转让他人，补交海关

税。4、外商如果用在匈牙利取得的赢利，继续在匈牙利扩大再生产，可得到相当于这部分追加投资的免税优惠。5、外商在匈牙利获得的利润，可以自由地以投资货币形式从匈牙利转移出境。

安道尔政府在经济形势严峻的情况下推行变革纲领。然而，变革的经济、政治、社会心理环境并不理想，可以预见，安道尔政府及其变革之路将是艰难、崎岖的。

波 兰

一、概况：波兰位于中欧东北部，东面同原苏联接壤，共同边界长 1244 公里，西邻德国，边界线长 460 公里，南接捷克斯洛伐克，边界线长 1310 公里。北濒波罗的海，海岸线 524 公里。面积 312683 平方公里，居欧洲第 8 位。全境属于由海洋性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温带阔叶林气候。地势南高北低，大部分为低地和平原。全国 99.7% 的面积属波罗的海流域，较大河流有维斯瓦河、奥得河、瓦尔塔河等。湖泊共有 9300 多个，占波兰面积的 1% 左右。波兰人口 1991 年底为 3830 万。波侨在世界上有 1200 多万，苏联 120 多万，巴西 80 多万，捷克斯洛伐克 73 万，加拿大 32 万，德国 25 万，英国 14 万，波兰是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波兰人占 97.4%，乌克兰人 0.7%，白俄罗斯人 0.6%，波美拉尼亚人 0.6%，其他 0.7%。官方语言为波兰语。全国 80—90% 的人口信仰罗马天主教，还有东正教、路德教派、奥格斯堡派教会等。首都华沙是波兰的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交通中心，华沙有着悠久的历史 and 灿烂辉煌的文化遗迹。

波兰蕴藏着丰富的煤，达 1000 亿吨左右，褐煤储量也达到 300 亿吨左右。锌、铅的储藏量居世界之首，硫磺储量超过 1 亿吨，产量居世界第二位，天然气储藏量达 1800 亿立方米，其他矿藏有铜、银、铝等。

二、华人概况：1989 年至 1992 年 7 月，共有 3 万多华人来波兰旅游、求学或经商，滞留者约有 6000，集中在华沙等大城市。中餐馆有 7 家，还有很多华人在筹建餐馆。波兰“跳蚤市场”自由市场有不少中国摊贩，中国轻工产品渗入广大城乡市场。波兰人有很强的民族自尊心，对华人热情友好。波兰人民对中国当年反霸精神倍加赞赏。由于波兰目前的经济不景气，预计在波华人将会减少。

三、外国人如何在波兰办公司？

波兰当局欢迎外商到波兰投资，创办公司，近几年并为此创造了各种条件。外国人只要办理一些必要的手续，其公司即可在波兰开业。

为外商投资创造有利条件

波兰当局一直允许外商在波兰投资。1986 年 7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外资企业法》，促进了外资企业的发展。1989 年剧变后，波兰当局在国内推行公有经济私有化、股份化。同时，为鼓励外商在波兰兴办企业，增加投资，自 1991 年 7 月 4 日起，实行新的《外资企业法》。该法为外商在波兰投资办企业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新《外资企业法》规定，外国实体（系指居住在外国的自然人，总部设在外国的法人以及这两种人根据外国法律开办的不具有法人地位的公司）可以开设总部在波兰共和国境内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股份公司，或者承接或适当地购买经营上述企业的股份公司的股份和股票。

一、进一步放宽外商投资。新《外资企业法》进一步放宽对外国投资的限制。取消了建立外资企业需经外国投资事务署批准之规定，外国投资事务署也予以撤销，其部分职权由政府的所有制改造部接管。同时成立国家外资局，负责制订一些鼓励外国在波兰投资的措施。

新《外资企业法》规定，外国实体经营下列项目需经批准，即海港和机

场的经营管理；不动产的经纪和经营方面的业务；国防工业；进口消费品的批发；法律咨询服务等。

二、取消外商在波兰投资的最低限额。原外资企业法规定，外国在波兰建厂至少应有 5 万美元资金。新《外资企业法》只规定，外国实体可以用波兰货币——兹罗提，也可以用实物向公司投资。但是，兹罗提必须是用可兑换的外币在外汇银行按波兰国家银行外汇牌价兑换，而实物则必须是由国外进口，或者用上述办法兑换成的兹罗提在波兰购买的。外国实体如将下述款项的一部分或全部在公司入股，也被视为向公司投资，即：1) 股份或股票收入；2) 通过出售或出让股份或股票所获得的款项；3) 由于公司被撤销，其财产的分配在满足或确保了债权人的要求之后，属于作为合股人的外国实体的款项。

三、扩大了免税范围。新《外资企业法》规定，外国实体在波兰投资超过 200 万欧洲货币单位，可被免征所得税。在能保证国民经济中开发新工艺，新技术，或能使出口的商品和劳务至少占销售总额的 20% 等生产领域从事经济活动，或在那些将会出现大量的结构性失业的地区从事经济活动，均可免征所得税。

外国实体如购买国库所拥有的股份和股票，也可享受免税待遇。所得税的减免额不得超过外国实体购买或承接股份或股票交易的价值。如果公司在享受免征所得税待遇期间及免税期满后的 2 年内，宣布撤销公司或减少固定（股份）资本，则必须偿还这笔税款。

四、扩大了外籍人员汇出外汇的可能性。根据外汇法，作为外资企业公司的工作人员的外籍人员所得的报酬应纳税 20%。纳税后，外国实体有权在外汇银行利用公司付给的红利全部购买外币，或用在公司工作所得报酬——兹罗提购买外币并将这类外币汇往国外，无需特别的外汇许可证。因出售或出让所承接或购买的股份或股票而获得的款项，公司被撤销时，外国实体应得的款项，在被征用或采取其后果相当于征用的其他措施所得的赔款等均可用于购买外币并汇往国外，而无需特别外汇许可证。

五、取消了外商办厂头 3 年不纳税原则。取消了外商在 3 年内的一切商品免征进口税的作法。规定，外国实体所有的以实物投资的固定资产，自验关之日起，3 年内不准转卖。

由于上述鼓励外商来波投资的措施，波外资企业近几年有所发展。自 1989 年底到 1991 年 10 月，外商在波建立外资企业 4920 家，最近 6 个月又开办了 640 家。近几年来共有 60 个国家和地区在波投资，投资总额约 7 亿美元，其中德国最多，1.7 亿美元；美国次之，9200 万美元。

外商如何在波兰办公司

外国人可以下列三种方式将外资引进波兰：参与波兰国营企业私有化（即购买私有化了的企业的股份）；独资开办公司；与波兰人开办合资企业。

外国人可以在波兰开办两种公司：1、股份公司，2、有限责任公司。据波《选举日报》介绍说，开办有限责任公司容易些，花钱少，最低只需 4000 万兹罗提（约合 2900 美元）即可，而开办股份公司，往往要有大宗资本，至少需要 10 亿兹罗提（约合 7 万多美元）。

外国人在波兰开办公司，需经一定的审批手续。

公司发起人先与其合作者协商，达成设立公司协议，商定未来的公司的运转方式和原则。然后准备办理设立公司的手续。

一、申请办公司 向所有制改造部提出设立公司的申请书，该申请书用波兰文写成。申请书中应写明：要成立的公司的名称、目的及宗旨。公司的资金投向、经营范围、公司的合作者等。如果申请经营的项目中有：海港和机场的经营管理；不动产的经纪与经营方面的业务；国防工业；进口消费品的批发；法律咨询服务等，还应在申请书上写明要开设的股份种类和价值并在申请书中附上：1) 说明申请人法律地位的文件；2) 公司筹建文件草案和公司章程的草案或公司协议的草案；3) 对公司实物股份的定价。

自递交申请之日起 30 天内，所有制改造部长可以要求申请人自费提供下述文件：1) 说明各方财务状况的文件；2) 由申请人经所有制改造部长同意指定专家所作的对申请人、公司或协议项目的评价。自递交申请书之日起，在 2 个月内作出有关批准证书的决定。公司必须按照批准证书规定的条件从事经营活动。所有制改造部长可以以公司的业务将危及国家的经济效益、国家的安全和国防等为理由而拒发批准证书。

外商所办的股份公司，其发行股票的原则与波兰公司的股票发行原则相同。该公司应先准备一份要求发行股份的文件，该文件中应含有该公司的财产现状，财政情况以及对该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等材料，同时还附有独立的专门机构对该公司的审记证明材料。股份公司然后向有价证券委员会提出申请，请求同意该公司进入证券交易所，对自己发行的股票进行交易活动。

二、进行登记注册 股份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均需到指定的法院进行登记注册。届时需要下列文件：1、公证文件（由股份公司的股东们制订的经过公证的文件）或协议（由有限责任公司签订有关成立该公司的协议）2、（经过公证的）公司董事会的董事们的签字件；3、合作者名单；4、关于筹建注册资本的声明。根据《外资企业法》规定，筹集的资金必须变为兹罗提。如果是由国外引进的货物作为资本，则由合股人共同对其进行评估。也可直接在波兰购买，实物作为资本。

三、注册之后的手续 公司在法院登记注册之后，还应作下列几件事：

1、首先，公司必须向统计机构的地方单位报到。从那里得到所谓的地区号码，即公司的统计号码。公司的地区号码到处都有用处。如无此号码，银行则不给公司立帐户。

2、公司在将其职工向社会保险公司进行保险之后，还需要向国库予以报告。外资企业职工保险原则，由于波兰与各国签订的不同的协议而有差别。如果外资企业职工在波兰进行保险的话，那么，应将每个人的毛工资的 45% 交付波兰的社会保险公司。在公司中安置外国人，需经地方就业当局同意。

3、关于成立新公司的消息，应向工业与商业部通报。

只有办理完上述事项后，外资企业公司及其作为外籍人员的职工才有权在纳税后将盈利完全转出波兰。同时在波兰国内银行购买外汇。

四、注意事项 1、在波兰境内营业的外资公司必须将其盈利的 40% 作为所得税缴纳；必须缴纳社会保险公司的保险金；必须为其租赁的或拥有的不动产付费。

2、外国人只有经内务部长同意才能在波兰购买地皮和不动产（甚至包括住房）。

3、依据波兰法律，公司支付其职工的工资所应付的所得税（全面所得税

在波兰仅实行了几个月)。但这并不意味着，公司是全面所得税的纳税人，公司仅缴纳一部分钱（每人工资的 20%）。在一个税收年度过完之后，职工自己同国库机构进行决算。

4、建立外资公司需所有制改造部批准。如果波兰伙伴把波兰国营企业财产入股也需经过批准。

5、为方便在波兰投资，波兰已和 23 个国家签订了协定，最重要的是：
（1）关于避免双重纳税协定；（2）关于相互支持投资协定。与中、英、美、法、德等 7 国签订了上述两种协定；与日、意、印度等 14 国签订了关于避免双重纳税协定；与南朝鲜和瑞士两国签订关于相互支持投资协定。

捷克和斯洛伐克

一、概况：这是一个即将分裂为两个独立国家的联邦，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地区。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北邻波兰，东界原苏联，南接匈牙利、奥地利，西邻德国，是个内陆国家。面积为 127877 平方公里。气候属于海洋性气候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温带阔叶林气候，冬季温和，夏季雨量充沛，最冷的 1 月份，平均气温 -1 ~ 5 ，最热的 7 月份平均气温 15 ~ 19 ，地形以高地和低山为主，大部分地区在海拔 200 ~ 750 米。主要山脉有厄尔士山、波希米亚山、苏台德山、舒予瓦山和西喀尔巴阡山。最长的河是伏尔塔瓦河，约 430 公里。湖泊有 190 个，其中 160 个在上塔特拉山地。捷克和斯洛伐克人口为 1570 万。捷克族占全国人口的 63.5%，主要分布在西部波希米亚和中部摩拉维亚地区，斯洛伐克族占全国人口的 31.2%，主要分布在东部斯洛伐克地区，匈牙利族占 4%，分布在南部多瑙河和蒂萨河的冲积平原；此外还有波兰人、乌克兰人和德意志族人。捷克语和斯洛伐克语是主要的官方语言。捷克斯洛伐克大部分信奉天主教，少数人信奉新教、犹太教。首都布拉格是欧洲最美丽的城市之一，人称“金色的布拉格”。布拉格是欧洲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之一，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著名的文化城市，它有许多保存完好的中世纪以来的各种建筑。

捷克斯洛伐克硬煤储量 65 亿吨，占欧洲第 5 位；褐煤储量达 135 亿吨，占世界第 3 位。在西北部的罗斯尼山中蕴藏着丰富的铀矿。铁矿主要产在斯洛伐克的矿山山脉。其余还有金、银、铅、锌、锰、铜、锑等有色金属矿和萤石、菱美石、石墨、高岭土等。境内森林面积达 4.23 万平方公里，约在全国总面积的 1/3，生长针叶林和阔叶林等树木。

二、经济 捷克斯洛伐克战前经济就比较发达，约居世界第 10 位。二战后，经济也有很大发展。捷工业基础较好，以机械制造业为主。机器设备、玻璃制品、载重汽车、鞋、啤酒在国际上享有声誉。煤、钢、化纤、水泥、鞋、糖的人均产量，居世界前 10 位。冶金工业发达，畜牧业生产占 57.7%，耕地面积为 476.6 万公顷。农业劳动力占全国劳动力的 11%。粮食基本自给，油、肉、蛋、奶均自给有余。主要产小麦、黑麦、玉米、马铃薯、油菜、甜菜等。

捷是内陆国家，铁路和公路运输在全国交通中占重要地位，承担全国 70% 的货运和 30% 的客运。1987 年铁路总长 13102 公里；公路 73601 公里。全国有 17 条定期国内航线和 18 条国际航线，布拉格是全国也是重要的国际航空枢纽之一。捷河流总长 5700 公里，从事水运的内河航线长 475 公里。捷可以通过其他国家出海，有海运船 12 艘，总吨位 14.22 万吨，年货运量 49.05 亿吨公里。

联邦中央银行，下设 123 个分行，还有两个总行。两总行下设州管理局和县分行。另外，还有国家储蓄银行工商银行。外商银行专门为外贸企业提供资金，下设 6 个分行。有保险公司从事各种保险业务。

捷政局剧变与经济发生严重危机有直接关系。70 年代末捷人均经济水平已退居世界第 23 位；到 80 年代末下降到第 40 位，捷共虽然提出经济改革原则，但经济形势未见好转。而且出现了一系列新的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从 1991 年 1 月，捷开始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经济改革，改革主要措施是实行私有化，放开物价和实行克朗自由兑换。从目前看，改革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效，

如克朗汇率稳定、私有成份迅速增加、私人零售额已占全国零售总额的 45%，1992 年头 4 个月通货膨胀率仅为 2%。但也存在严重问题，1991 年工业生产持续下降为-23.4%，国民生产总值为-16%，群众实际工资收入下降了 20%，失业率为 6.6%，消费品价格陆续上涨。一些无党派经济学家指出捷政府近年在经济政策方面有三大错误：对新创办的中、小型私人企业重视和支持不够；通过小私有化建起的私人企业太少，私有成份未能对创造国民生产总值和新的就业机会发挥作用；禁止出售私有化投资券，阻挠了资本的集中，降低了资本市场的效益。

三、华人概况：捷克和斯洛伐克目前有 3600 华人取得短期居留证。没有身份证但仍在捷克从商的华人约有 13000 人，小商贩居多，主要分布在首都布拉格和西部、南部城镇。中餐馆、中医诊所很受当地人欢迎。华人公司主要业务是货物贸易、工程承包。劳务交易往往虚有其表，中国南方省份的“劳务商”多以劳务项目名义组织偷渡西欧。1991 年年底匈牙利限制华人入境以来，滞留边境（如乔甫——扎哈尼）的部分华人以旅游名义进入捷克和斯洛伐克，通过投资办企业或建立公司以取得居留权。商贩货物一部分由国内发运，一部分在俄罗斯华人批发商手中批发。中国轻纺产品可卖较高的价钱，但当地消费较高，不少华人离开大城市到边远小镇做小买卖，卖艺或开办小餐馆。

罗马尼亚

一、概况 罗马尼亚位于欧洲东南部，巴尔干半岛北端，多瑙河下游。东北部与原苏联接壤；南面与保加利亚隔多瑙河为邻；西北、西南分别与匈牙利、南斯拉夫相邻；东濒黑海。罗面积 23.75 万平方公里。罗境内平原、山地、丘陵和高原各占四分之一。喀尔巴阡山在欧洲与阿尔卑斯山齐名，是罗马尼亚的脊梁，呈弧形盘距中部，多瑙河下游流经南部，罗全境分为 6 个地形区。罗马尼亚河流很多，最后都汇入多瑙河，注入黑海。多瑙河是欧洲第二大河，全长 2850 公里，在罗马尼亚境内长 1075 公里，占多瑙河全长 1/3 以上。多瑙河灌溉着罗马尼亚肥沃的土地，汇聚了罗马尼亚国土上大大小小数百条河川。罗马尼亚湖泊多在 2500 个，有山区湖泊、人工湖、平原湖泊、海滨湖泊等。罗马尼亚处于西欧海洋性气候和东欧大陆性气候的过渡地带，全国最冷的 1 月份气温平均为 $-1 \sim 7$ ，最热 7 月份气温平均为 $16 \sim 23$ ，年降水量为 640 毫米。罗马尼亚矿物资源丰富，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居欧洲前列。此外还有铝矿土、金、银、锰、煤、锑、盐、铀、铅等储量也很丰富。水力蕴藏量约 565 万千瓦。森林面积占全国面积的 27% ，主要树种有山毛榉、枞树、冷杉、柞树等。内河和沿海盛产多种鱼类。

罗马尼亚人口为 2311 万，城市人口占 53%。其中罗马尼亚族占总人口的 89.1%；匈牙利族占 7.7%；日耳曼族占 1.5%；还有塞尔维亚族、乌克兰族、犹太族、鞑靼族、俄罗斯族、土耳其族、保加利亚族等。官方语言是罗马尼亚语，属罗曼语系，主要民族语言有匈牙利语、德语。主要宗教为东正教，全国 73.1% 的人口信奉东正教。此外还有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卡尔温教、路德教等等。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是全国最大的城市，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人口 230 万。布加勒斯特还有很多名胜古迹和博物馆，如自由新闻大厦、共和国宫、罗马尼亚雅典厅、莫戈索亚宫等。

二、经济 罗马尼亚主要工业部门有化工、冶金、机器制造业。国营企业 1456 个，地方企业 38 个，合作社企业 457 个，职工 784.3 万。钢铁产量 1988 年达 1430 万吨，人均居世界第 5 位；化学工业生产发展速度居世界第 10 位，创汇率占出口额的 25%，化工产品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20%；机器制造业在工业化计划中占中心地位，生产铁路车辆、汽车、农机具、采矿设备、石油和动力设备、船舶等；罗马尼亚森林资源丰富，木材加工工业发达，其中家具生产产量占世界第 14 位，出口量占第 5 位；服装加工业是罗马尼亚重要的轻工业部门，其产品总量的 70% 出口，行销世界 60 多个国家。

农业是罗马尼亚国民经济的基础部门。全国耕地为 1022 万公顷，人均 6.45 亩。1988 年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48%。国营农业企业 367 个，农机站 574 个，农业生产合作社 3784 个，山区个体户农户 58 万，其所占耕地为全国耕地面积的 5%。到 1989 年底以来，已解散了 320 个农业合作社，个体农户拥有的土地面积增加了 35.5 万公顷。罗马尼亚除了主要粮食作物外，还有甜菜、马铃薯、大豆、向日葵、蔬菜，葡萄种植业特别发达，低度葡萄酒年产量达 80~90 万吨，是传统的出口产品。罗马尼亚的畜牧业和渔业也很发达。

罗马尼亚交通以铁路、公路为主。水运和空运发展很快。铁路长度为 11269 公里，其中电气化铁路为 3427 公里；公路四通八达，总长度为 72799 公里，其中高速公路 114 公里；罗现有 6 条国际班轮航线，内河航道以多瑙

河为主。康斯坦察是最大的海岸；罗有 4 个国际机场，与 38 个国家的首都或城市通航；罗已形成石油、天然气输送网络。

1990 年罗马尼亚银行体制进行了改革。第一个层次的银行是中央银行；第二个层次的银行是商业银行、投资银行、农业和食品工业银行、储蓄银行。1990 年建立了第一家私营银行“小工业和自由经营银行”。

罗马尼亚同 149 个国家有经贸关系。近年来，外贸一直为顺差。1990 年对外贸易额比 1989 年减少 30%。出口产品主要是机器、设备、运输工具、化工产品和日用工业品；进口产品主要是能源和原材料、机器、设备、日用消费品。

根据 1991 年罗马尼亚初步统计材料表明 经济滑坡加剧工业生产继续下降，1991 年工业生产比 1990 年下降 22%，比 1989 年下降 40.4%；因能源短缺开工日益不足；通货膨胀和失业人数在增长，生活水平下降，罗马尼亚正经历着经济衰退带来的各种痛苦。

三、华人概况：罗马尼亚现有华人 3.2 万人，其中经商投资者占 1/10。流动性较大。华商企业以中餐馆、旅馆、贸易公司为主。华人好赌，无业者在华人企业中短期打工，有的期待机会转去西方。绝大多数华人持有罗马尼亚短期居留证。

四、贸易指南：罗马尼亚与中国有传统的友好关系。罗马尼亚政治转轨后，两国友好关系并未中断。罗国欢迎外国来罗投资经商，对外国企业有一系列保护和提供优惠的政策。

保加利亚

一、自然概况：保加利亚共和国位于东南欧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北与多瑙河为界，东临黑海，海岸线长 378 公里；西边同南斯拉夫接壤，南与希腊、土耳其相连，陆界长 1181 公里。全国面积 11.09115 万平方公里，占巴尔干半岛面积的 22%。保加利亚地形特点岗峦起伏，形态多变，低地、平原、高山、丘陵、盆地、河谷由北向南，自西、西北向东、东南方向有秩序排列。保加利亚著名的山脉是被称为“保加利亚脊梁”的巴尔干山脉；最大的平原是多瑙河平原；最辽阔、最平坦的低地是上色雷斯低地。保加利亚的河流分属黑海和爱琴海两流域，最大的几条河是伊斯克河、卡姆奇亚河、马里查河和斯特鲁河。保加利亚最大的咸水湖泊瓦尔纳湖，构造湖是拉比沙湖，另外还有沉降湖和冰川湖。保加利亚的气候北部属大陆性气候，南部属地中海型气候，全年平均气温为 12~13℃，年平均降水量约 670 毫米。保全国森林面积达 300 多万公顷，覆盖率为 27%。森林以阔叶林和针叶林为主。保矿产资源比较贫乏，主要有：煤、铅、锌、铁、铬、铀、石油等，但藏量不大。此外保的矿藏还有岩盐、石膏、陶土、重晶石和萤石矿等。保矿泉闻名遐尔，大部分是温泉和热泉。

保加利亚人口 890 万。其中 88% 以上的居民是保加利族人。土耳其族人占 9%，古卜赛人 2.5%，还有俄罗斯族、亚美尼亚族希腊族、卡拉卡昌族、罗马尼亚族、鞑靼族和犹太族。1989 年以后，大批土耳其人迁往土耳其。保官方语言是保加利亚语，属斯拉夫语，文字是基里尔字母。保主要宗教是东正教、伊斯兰教，少数人信奉天主教和新教。保加利亚的首都索非亚，人口 110 万，是全国政治、文化和商业中心，也是全国最大的工业中心和最重要的交通枢纽。索非亚气候温和，是著名的花园城市，素有“巴尔干矿泉城”的美誉。

二、经济：保加利亚的工业基础薄弱，资源又很贫乏。1988 年工业总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 70.2%，所创国民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 60.1%。1988 年保加利亚共有企业 2483 个，从业人员占全国劳动力的 35.3%。在工业部门构成中电力工业占 3.6%，煤炭工业 1.1%，黑色冶金 3%，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 14.9%，化学和橡胶工业占 9.3%，食品工业 25.2%，电机和电子工业 12.1%。

农业是保加利亚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保全国农业用地 9250 多万亩，耕地面积 6976.8 万亩，农业人口 311.8 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 34.8%，1988 年农业总产值为 92.6 亿列弗，占社会总产值的 9.7%，所创国民收入 15.4%。主要农作物小麦、大麦、玉米、大豆、向日葵、甜菜、西红柿、葡萄、烟草等。保加利亚畜产品率不断提高，以猪、奶牛和绵羊为主。保是出口蔬菜、果品、玫瑰油的传统国家，素有“巴尔干的果园，菜园、花园”的美称，其中玫瑰油的出口量居世界第一位。

保加利亚交通运输较发达，以公路为主，铁路、航运、空运及管道运输四通八达。保加利亚邮路总长度 7 万公里，电话 200 万部，平均每百户 52 部。

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重要地位，保与 123 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关系，其中同经互公国家的贸易占外贸总额的绝大部分。1988 年在对外贸易总额中，进口占 50.9%，出口占 49.1%。出口商品中生产资料占 70% 以上。

1991年，保政局剧变后的第二年头，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生产下降，工农业月平均产值比1989年剧变前下降了23.5%。1991年下半年，三分之一的工业企业生产下降了40%。80年代，保加利亚粮食水果蔬菜不仅满足本国需要，还要大量出口，进入90年代却开始闹粮荒。1991年失业人口猛增到40万，失业率为11%。保财政危机进一步加剧，通货膨胀严重，人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外债达110亿美元，人均1200美元。西方援助空头支票多，即使有也是杯水车薪，债权国德国公开“逼债”使保加利亚处境更艰难。1992年3月11日，保政府向国民议会提交了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政府的目标是将保变成一个市场经济的国家，政府工作的重点是私有化和鼓励发展个体经济。1992年政府的一项中期任务就是开始实行经济结构的变革。国家对外政策的方向首先放在欧洲和美国。同时与前苏各共和国经济关系的优势仍应保持。保政府在对外政策上是维护国家主权和独立，不单独与一个国家结盟，不参与任何针对第三国的协议，同所有巴尔干国家建立睦邻关系，发展同欧共体的关系，同美国和日本接近，在维护国家对外政策原则的基础上参与欧洲和世界性组织的活动。

三、华人概况：保加利亚现有华人2400左右，以留学、经商、文化体育交流为主。华人中40%为北京人，多为个体工商业者。华人餐馆很受欢迎。保加利亚生活水平较低，中国轻工纺织产品销路较好，但价格偏低。保加利亚企业希望与华商合作投资建厂或开展贸易，华商机会较多。

南斯拉夫

一、概况：新的南斯拉夫又称“第三南斯拉夫”，包括原南斯拉夫最大的共和国塞尔维亚和最小的共和国黑山。塞尔维亚面积为 8.8361 万平方公里，人口 980 万；黑山面积 1.4 万平方公里，人口 61.5 万。新南斯拉夫面积 10.2361 万平方公里是原南斯拉夫总面积的 40%，比邻国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和奥地利大，比邻国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小。新南斯拉夫人口为 1050 万，是原南斯拉夫人口总数的 45%。主要民族是塞尔维亚族人，共 650 万，占总人口的 62%；阿尔巴尼亚族 170 万，黑山族 52 万，匈牙利族 35 万，穆斯林人 33 万。宗教信仰主要是塞尔维亚东正教。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

新南斯拉夫北部有伏伊伏丁那大平原，农业发达，南部矿产资源丰富，石油产量可满足国内 1/3 的需要。内陆交通发达，连接南北欧的大铁路和高速公路纵贯境内，且有多瑙河水路与西北欧相通。南濒亚得里亚海，黑山沿海有 200 公里长的海岸线，是亚得里亚海滨旅游胜地。经济中等发达，据 1989 年统计，塞尔维亚人均国民收入 2645 美元，黑山人均国民收入 2073 美元。

二、社会经济状况：新南斯拉夫成立面临着许多问题，1. 原联邦机构将全部解散，人员安置是一大问题。2. 如何分配原南斯拉夫的债务、外汇储备和各项财产。欧共体南斯拉夫和会秘书处向南各共和国提出分配方案，塞尔维亚提出异议。3. 各共和国相互边界重新划分问题。克罗地亚境内塞族正同克当局为争夺领土而战，波黑境内塞族也正同克罗地亚族人和穆斯林人为争夺领土而战，黑山已向克罗地亚提出领土要求，马其顿和塞尔维亚正为边界问题而争吵。4. 新南斯拉夫国内各少数民族的不满情绪日趋激烈。占塞尔维亚共和国人口的 20% 的 200 万阿尔巴尼亚族人，正在考虑争取实现完全独立或与阿尔巴尼亚实现统一问题。5. 局势混乱，大量难民涌入塞尔维亚，80 万克罗地亚和 40 万波斯尼亚无家可归的人其中很大一部分在塞尔维亚落脚。6. 战争使塞尔维亚陷于破产。塞的工业遭到严重破坏，人口失业几乎达 100 万，约占劳动力大军中的 20%，物价飞涨，目前通货膨胀率为 30000%。大多数塞尔维亚人的生活质量在近十多年来里已跌到了谷底。

三、华人情况：在塞尔维亚和黑山的华人约有 4500，主要集中在贝尔格莱德。在原大南斯拉夫统一期间，华人商贩在南贩货获利颇高，又由于南斯拉夫是偷渡到意大利的重要通道，中国浙江福建等地的偷渡者先到南斯拉夫，华人最多时达 3 万以上。大南斯拉夫内战爆发后，偷渡路线被切断，在南华人锐减。在远离战区的华人致富机会颇多。中国货在南的销售价格普遍高出在匈牙利销售价的 2 至 4 倍。

在南华人内讧严重，自相残杀的案件时有所闻。蛇头被杀事件多因索价太高或因露财而被人暗算。案情复杂，警方常捕传众多无辜华人，但破案率不及十之一、二。不少华人称在此国经商险象环生。有在南斯拉夫的华商做转口贸易而大发其财者。意大利商人从华商手中批发丝绸及其它中国针织品，私运回国，一苏州华商在 90 年 5 月至 91 年 5 月一年内赢利 300 万美元。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黑等国的近 5 千华人为逃避战火，绝大部分撤至现在的小南斯拉夫联邦。

四、原南斯拉夫解体过程：1991 年 6 月 25 日，斯洛文尼亚共和国作出独立决定。同日，克罗地亚（铁托故乡）作出同样决定。两国不久就与南斯

拉夫联邦人民军发生武装冲突。1991年10月8日，这两个共和国正式宣布独立。至1992年7月，约有80多个国家承认这两个国家的独立。

1991年10月和11月，马其顿共和国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两共和国宣布独立。马其顿独立受到了希腊的反对，原因是在希国将会引起马斯顿族问题。波黑境内塞尔维亚族又成立了两个塞族共和国。至此，原南斯拉夫实际上已一分为七。而由塞——波边境地区的穆斯林居民区建立起来的桑扎共和国、塞尔维亚南部2百万阿尔巴尼亚族人成立的“科索沃共和国”已经得到了国外的种族或宗教性支持，邻近匈牙利的35万匈牙利族人也在为争取高度自治而斗争。在马其顿境内的阿尔巴尼亚族人在1992年1月开始谋求自治。至今，原南斯拉夫四分五裂，战火不断。欲去这一地区从商的华人，当小心为上。

阿尔巴尼亚

阿尔巴尼亚共和国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南部，西濒亚得里亚海，隔奥特朗托海峡与意大利相望。面积 2.8748 万平方公里。海岸线长 472 公里。人口 314 万，97% 是阿尔巴尼亚族，另有希腊、南斯拉夫和茨冈等少数民族。讲阿尔巴尼亚语。

阿尔巴尼亚民族的祖先是巴尔干半岛上古老的民族之一伊里尔人。十五世纪时，土耳其入侵。1912 年 11 月 28 日宣告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先后被法西斯意大利和德国侵占。1941 年 11 月 18 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后劳动党）成立，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1944 年 11 月 29 日解放了全国。这一天被定为阿尔巴尼亚的国庆日。1946 年 1 月 11 日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1976 年 12 月 28 日改称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1991 年 3 月 31 日成立阿尔巴尼亚共和国。自 1944 年至 1990 年，阿尔巴尼亚一直是劳动党一党执政，国家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由于极左思想和政策的影响，国内经济危机日益加深。随着西方压力的加大和东欧的剧变，阿尔巴尼亚实行了多党制，并于 1991 年 3 月 31 日首次多党选举产生了阿第一个多党议会。阿尔巴尼亚现执政党是民主党。原执政党劳动党于 1991 年 6 月 12 日改称为社会党，是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大党。阿到目前为止已有 19 个政党。大多数政党主张建立一个政治多元化和三权分立西方式民主国家。共产主义、马列主义遭到彻底否定。阿尔巴尼亚正在向资产阶级共和国过渡。

阿尔巴尼亚 1949 年 11 月 23 日同中国建交 现在的外交奉行的是一边倒的亲西方政策。

阿尔巴尼亚的山地和丘陵占全国面积的 3/4，西部沿海为平原，海岸曲折多岬角和港湾。全境属亚热带地中海式气候，从沿海向东部山地逐渐从海洋性过渡为大陆性。一月最冷，平均气温摄氏 3 度至 10 度；七月最热，平均气温摄氏 25 度左右。年平均降水量 1400 毫米。矿物以铬为主，储量居欧洲第 2 位，1985 年产铬居世界第 3 位。其他矿物如石油、铜、天然沥青、煤、镍、铁等也很丰富。经济以农业和采矿业为主。主要农作物有小麦、玉米、黑麦、大麦、稻米、燕麦、棉花、甜菜、烟叶、油橄榄等。采矿业主要有铬、铜、石油、沥青等开采，还有食品加工、纺织、钢铁、石油提炼、化工机械等工业。出口石油、加工后的沥青、铬矿石、镍铁矿石、铜、酒、卷烟、棉织品、烟草、水果、蔬菜等。进口工业设备、运输工具、农业机械等。全国公路约 6200 公里，铁路约 300 公里。首都地拉那，人口 23 万，是全国最大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都拉斯是全国最大海港和渔业中心。

1992 年 4 月 13 日阿尔巴尼亚组成了以总理梅克西为首的新政府。4 月 18 日总理亚历山大·梅克西向议会做新政府施政纲领报告。首先否定了中央计划经济，实行保证国家稳定和福利的经济体制——以自由的个人私有制为动力的市场经济。为此，政府将实行大规模私有化，包括农业土地私有化、企业私有化、住房私有化、放开价格、商业和外贸；同时在各部门实行改革。新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推动国际社会支持阿尔巴尼亚向民主和市场经济过渡。为此，阿尔巴尼亚把同英国、西欧的关系放在首位，并努力争取加入欧洲政治和经济一体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时强调发展与邻国的关系。施政纲领中描述了阿尔巴尼亚的经济现状：国家财产损失在一年半里达到 10 亿列克（目前 50 列克等于 1 美元），1991 年，只有一半的经济在运转，生产和服

务业产值降到 1990 年的 50%，1991 年的出口仅够支付进口的 47%，1991 年同 1990 年相比，物价平均上涨 104%，失业人数巨增，国家短期外债达近 5 亿美元，1991 年财政赤字达 55 亿列克，社会动荡不安。新政府为稳定国家社会和经济准备采取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强化治安工作，提高工作效率，进行反腐败斗争，精减机构，减少预算支出，压缩投资，取消 80% 的停业工资，尽快建立税收机构，放开物价，调整工资结构，自由兑换外汇，最后强调增加政府活动的透明度。深刻的危机和贫困使阿尔巴尼亚的经济恢复步履维艰，市场经济的建立困难重重。

到 1992 年 7 月，因私去阿尔巴尼亚的华人约有 100 余人，相当一部分曾在 60 年代中阿关系极度亲密阶段与阿尔巴尼亚有工作联系和个人交往。阿政治经济转轨迟于东欧、原苏联各国，有部分华人正欲由东欧其它国家进入阿国开拓事业。

俄罗斯

一、概况：俄罗斯联邦原称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现称俄罗斯或俄罗斯联邦。俄国是独联体中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经济实力最强的一个。俄罗斯面积 1710 万平方公里，占原苏联面积的 76%。在其境内共有 16 个自治共和国、5 个自治州、10 个自治区、6 个边疆区和 49 个州。人口 14810 万，占原苏联人口的一半以上。境内有 100 多个民族，其中俄罗斯人占 81.5%，鞑靼人占 3.8%，乌克兰人占 3%，楚瓦什人占 1.2%。俄罗斯族信仰俄罗斯东正教。当地主要语言是俄语。俄语也是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官方语言。首都莫斯科，也是原苏联的首都，是俄国最大的城市和政治、经济、科学文化以及交通中心，面积 900 平方公里，人口 881.5 万。莫斯科迄今已有 800 多年的历史，克里姆林宫是莫斯科的心脏，红场是莫斯科的中央广场，是节日活动的中心，列宁墓是红场上最重要的建筑。莫斯科的地铁是该市的重要交通系统，也是一大景观。莫斯科还被称为“绿色的都市”，绿化面积占全市面积的 40%。

公元九世纪以基辅为中心建立的古罗斯国，史称“基辅罗斯”。公元 11 至 12 世纪，罗斯国陷入了封建割据，1240 年被蒙古军队征服，建立了金帐汗国。1147 年在莫斯科河中游建立起来的莫斯科大公国逐渐强盛，终于在 1480 年打败了蒙古军队。在以后几百年的封建割据中，东斯拉夫人在第聂伯河流域与伏尔加河流域分成三大支系，即今天的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从 15 世纪末叶到 16 世纪初，莫斯科大公国又兼并了原古罗斯国疆域上的各封建公国，建立了统一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1547 年，伊凡四世自称尔和西伯利亚各民族先后加入了俄罗斯，俄罗斯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1701 年，彼得大帝建立俄罗斯帝国。19 世纪初，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帝国的其他民族一起击退了拿破仑的入侵。到 19 世纪中后期，经过几代沙皇的不断扩张，到十月革命前，俄罗斯已成为横跨欧亚的庞大帝国。19 世纪末，俄罗斯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917 年 11 月 7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成立。到 1920 年有近 20 个自治共和国或自治省加入俄罗斯联邦。1922 年 12 月 30 日，俄罗斯联邦同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一起加入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叶利钦执政后，推行激进的政治改革，要逐步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取代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主张建立一种介于美国和法国之间的制度，在政权体制方面，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重视与各共和国发展互补关系；主张建立俄罗斯的军队；对待苏共和俄共的态度上，采取打击、压制和瓦解的策略；在外交上以西方为重点，尽快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一体化，争取更多的援助。注意同亚洲国家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在对华关系上，宣布继承前苏联同中国发表的联合公报，重点发展睦邻友好和经贸合作，进一步减少边境地区军力。

二、经济：经济上俄罗斯推行“完全的市场经济和私有化。”为此俄罗斯联邦政府实行了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一系列切实措施。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放开了。议会通过了国营和市营企业私有化与记名私有化帐户存款法。土地也开始实行私有化，非国营经济部门在日益扩大。然而，经济形势却未见好转，国民经济中的危机局面在继续加剧。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粮食欠收，俄罗斯 1991 年的粮食收购计划只完了 48%；财政赤字剧增；外债近些年来成

倍增长，已达到 810 亿美元；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率急剧上升，钞票奇缺；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等。1992 年 4 月，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审议了俄罗斯联邦经济改革进程之后作出决定：重申俄罗斯联邦奉行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方针的必要性。采取措施解决下列问题：防止大规模罢工，不允许生产下降到危险程度；增加消费品和特殊食品的产量；实行稳定金融信贷政策；奉行结构、投资和转产政策；对居民消费水平实行社会保护；反对投机倒把、营私舞弊和黑社会组织等等；同时，俄人代会建议修改和补充现行立法文件，保证经济改革的顺利进行；建议俄罗斯政府制订工业综合体稳定纲要，执行《关于振兴俄罗斯农村地区和发展农工综合体纲要的决定》等；最后，人代会呼吁各独立国家——前苏联各共和国支持俄罗斯联邦的经济改革，以克服暂时的困难。

三、在俄华人概况：到 1992 年 7 月底，已有近 10 万华人先后进入俄罗斯，除公派商务官员和留学生外，约有一半是持因私护照入俄经商和旅游的。约有 3 万人分散在莫斯科、彼得堡、海参崴、伊尔库茨克等城市。还有约两万人在漫长的边界上常进常出或随国际列车往来于两国之间从事货物贩运，赚钱很辛苦。

长住俄罗斯的华人大多数并未取得俄罗斯居留权。俄国对“过境”愈期不离开并未采取类似匈牙利的驱赶政策，故从东欧，尤其是匈牙利撤出的一部分华人滞留在俄罗斯以期东山再起。现在，在原苏联 15 个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市（现各新独立共和国的首都）都有华人开办的餐馆、商店、货物批发站或旅馆。华人公司经营项目包括货物现汇贸易、易货贸易、技术合作、去料去样加工到工程承包、劳务等等。一位四川来的商人曾用食品罐头换回四架运输机。

华商来俄增强了俄国市场的活力，中国产品无论是大宗贸易还是小商贩运，都在一定的程度上帮助了正处在物质空前匮乏的俄国人民，增加了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了解和友谊。

乌克兰

一、概况：乌克兰共和国是原苏联第二大加盟共和国，其地位仅次于俄罗斯。位于原苏联西部，周围邻国依次是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捷克、匈牙利、罗马尼亚、摩尔多瓦等。乌克兰南部濒临黑海和亚速海，可通过海峡进入地中海，拥有良港和海军基地，是重要的出海口，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乌克兰面积是 60.37 万平方公里，在原苏各加盟共和国中居第三位。人口 5170 万，在原苏各加盟共和国中居第二位。该共和国境内共有 110 个民族，其中乌克兰人占 72.7%，俄罗斯人占 22.1%，其余为犹太人、白俄罗斯人、摩尔多瓦人、波兰人和保加利亚人等。人口密度是全苏最高的，每平方公里 85.6 人。乌克兰共有 25 个州，可分四个地区，东部以哈尔科夫为中心，中部以首都基辅为中心，南部以敖德萨为中心，西部以利沃夫为中心。乌克兰讲乌克兰语。宗教信仰东正教。

公元 9—12 世纪时，乌克兰的大部分是古基辅罗斯国的重要组成部分。13 世纪 40 年代，蒙古鞑靼人侵入，乌克兰大部分处于蒙古金帐汗国统治之下，剩下两个公国被称为“小俄罗斯”。从 14 世纪下半叶起，乌克兰大部分又被波兰、立陶宛王国统治。15 世纪乌克兰民族基本形成。16 世纪起莫斯科大公国逐步蚕食乌克兰，并于 1654 年把东乌克兰并入俄国版图。18 世纪，南乌克兰地区及西乌克兰相继并入俄国。1917 年 12 月成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后来，当地民族主义者曾一度推翻了苏维埃政权，成立了乌克兰人民共和国。1920 年，苏波战争结束后，根据《里加和约》，西乌克兰被割给波兰。1922 年 12 月 30 日，东乌克兰加入了苏联。德波战争开始后，1939 年 9 月 17 日苏联又出兵收回西乌克兰，同年 11 月西乌克兰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合并。1954 年，克里木半岛划归乌克兰。1945 年起，乌克兰是联合国成员国。乌克兰共和国首都是基辅。

二、自然资源和科学教育事业：乌克兰矿产资源丰富，拥有 72 种矿产资源，有铁、锰、铬、钛、铅、锌、铝、汞、镍、煤、石油和天然气。铁矿石储量约 194 亿吨（占全苏产量的 1/2），锰的储量居世界前列（占全苏产量的 3/4），顿巴斯是乌克兰的原苏联最大煤田之一。

乌克兰科学教育发达，有人数众多的知识分子队伍。乌克兰共有高等院校 147 所，大学生 88 万人；中等专业学校 727 所，80 万人。1981 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作的每千人中，有 841 人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乌克兰科学院下设 69 个研究所和科学机关，拥有几万名科学工作者。乌克兰具有光辉灿烂的民族文化。几百年来，拜占庭、波兰、俄罗斯和东方的土耳其、鞑靼人的多重影响，使乌克兰在语言、文学、音乐、绘画、建筑、服装等各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风格。本世纪 20 年代乌克兰的文学、绘画、戏剧、电影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提高了苏联文化的世界地位。

三、经济状况：乌克兰面积仅占全苏面积的 2.7%，但国民生产总值约占苏联的 25%。乌克兰工业发达，产值约占原全苏的 17%，是原苏联冶金、机械、化学工业的中心。钢和钢材产量约占原苏联的 1/3，化学机械设备占 30%，农业机械占 25%，建筑设备占 1/5 至 1/4，铁矿砂石占 46%，煤约占 25%，核电能占 2/5，焦炭占 1/2，铸铁占 1/2，还生产原全苏 21% 的矿肥，18% 的硫酸。

乌克兰属黑土带，地势平坦，土地肥沃，早在沙俄时代，就有“欧洲谷

仓”之称。乌克兰耕地面积只占原苏联的 15%，但农业产值占原全苏的 22%。其中，谷物占 20%，蔬菜占 29%，水果占 29%，肉类占 23%，牛奶占 23%，砂糖占 50%，植物油占 1/3，黄油占 1/4。1989 年生产谷物 5300 多万吨，占原全苏 1/4；1990 年苏联 83% 的糖、80% 的盐及 55% 的植物油均靠乌克兰提供。乌克兰通过海运向 70 多个国家出口粮食、糖、铁矿石、煤、锰等，从 60 多个国家进口咖啡、茶叶、水果、可可、黄麻和机器设备等。

乌克兰经济发展严重不平衡。乌克兰主要从事重工业生产，加工工业不足。乌克兰 95% 的自然资源和 70% 的工业企业控制在原联盟中央手里，而乌克兰的能源生产只能满足本身需要的 58%，特别是石油要靠俄罗斯供应。乌克兰的木材、医药、纺织品的 40—50%，以及有色金属、摩托车、化纤的 60—80% 也都要从俄罗斯等其他加盟共和国进口。乌克兰拒签经济共同体条约，原因之一就是同俄罗斯的资源争端。俄罗斯停止供应木材给乌克兰，使乌克兰一些煤矿因缺乏坑木而停产；作为报复，乌克兰停止了对俄罗斯的粮食供应。另外，乌克兰在组建自己的军队、发行本国货币及瓜分联盟财产等各方面都采取了强硬措施。

四、华人情况：在首都基辅已有 2000 余华人。敖德萨约有 2500 华人，利沃夫有 500 华人。华人游商定居后仍是从事餐饮等服务性行业。敖德萨一华商靠经营化肥和钢铁、废旧工业产品成为千万富翁。基辅有华人开办的学校，招收中国学生，利润颇高。近几年乌国外商以华人为最多。

立陶宛

立陶宛共和国位于原苏联西北部，濒临波罗的海，地势平坦，气候温和，降雨量 500—800 毫米，森林覆盖面积占全国总面积 1/4 以上，景色宜人。立陶宛共和国面积为 6.52 万平方公里；人口 372.3 万，其中，立陶宛人占其人口的 79.6%，俄罗斯人 9.4%，波兰人 7%，白俄罗斯 1.7%。宗教信仰是天主教。讲俄语，当地主要语言有立陶宛语。首都维尔纽斯。大城市还有考纳斯、克莱彼达、沙马里亚伊。

立陶宛工农业比较发达。畜牧业是立陶宛农业的支柱，占农业商品产值的近 90%，其中奶牛和养猪业又占畜牧业商品产值的 80%。1986 年，立陶宛人均肉、奶产量在原苏联居第一位。立陶宛主要农作物有亚麻、甜菜、土豆和蔬菜，谷物占原苏总产量的 1%，不能自给。立陶宛工业占社会总产值的近 70%。60%的居民是工人。电力工业、机械制造、金属加工、建筑业、燃料和轻工业部门发展迅速，在原苏联国民经济中占有突出的地位，其中 40%以上的工业产品为消费品。立陶宛生产原苏联所需家用电表的 100%、电动机床的 90%、电视元件的 79%、拖拉机零件的 30%。立陶宛生产的高精度机床、仪表、电子计算机设备已行销到 85 个国家和地区。但是，立陶宛资源较贫乏，它所需的全部石油、天然气、棉花和金属都靠原苏联提供。

立陶宛全国 2/5 的人从事各种形式和专业学习，在校中学生近 60 万，中专生近 6 万，大专院校生近 7 万。著名的维尔纽斯大学已有 400 多年的悠久历史，比莫斯科大学还早 175 年。立陶宛人民酷爱文学、艺术和绘画。立陶宛人的绣花腰带很有名，经常被作为友谊、幸福、感激的象征馈赠尊贵的客人。

中国与立陶宛有着传统的友谊。1991 年 9 月 14 日中立两国建交。1992 年 8 月，两国签署公民互免签证的协定。立陶宛是匈牙利中止与中国互免签证后唯一对中国公民免签证的国家。目前在该国有 200 左右华人，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将会有更多的华人去该国开拓经营。同时，东欧华人中的“人头生意”商将云集该国。

爱沙尼亚

爱沙尼亚共和国位于原苏联的西北部。境内地势低平，间有低矮丘陵，多湖泊和沼泽。属海洋性气候向大陆性气候过渡的中间型气候。森林占领土面积的 36%。爱沙尼亚共和国面积为 4.51 万平方公里。人口 157.3 万，其中爱沙尼亚人占 61.5%，俄罗斯人占 30.3%，乌克兰占 3.1%，白俄罗斯人占 1.8%。爱沙尼亚人大多数信奉基督教。当地主要语言是爱沙尼亚语，也讲俄语。首都塔林是一座拥有 50 万居民的海滨城，坐落在里加湾和芬兰湾之间，三面环水，风光旖旎。首都不仅是该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的工业产值约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 40%。

在爱沙尼亚的经济结构中，工业占主导地位，主要矿产资源是油页岩和泥炭。油页岩储量居世界第 4 位，年产 3500 多万吨，占原苏联产量的 80% 以上，为电力工业和化学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燃料和原料，该共和国人均发电量在原苏联居首位。除此之外，机械制造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也较发达。食品工业占其工业总产值的 1/3，捕鱼业又是食品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988 年的产量约为 42.6 万吨，占原苏联捕鱼总量的 3.7%。现在爱沙尼亚已成为一个拥有发达农业的工业化国家，它的工业总产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60% 以上，食品和其他日用消费品的人均产量，以及居民的生活水平都大大高于原苏联的平均水平。

农业在爱沙尼亚国民经济中占第二位。农业以畜牧业为主，占其农业产值的 70%。畜牧业主要是饲养奶牛、肉牛和猪。1988 年肉产量为 22.8 万吨，奶 128.9 万吨，大大超过本国需要。种植业以谷物为主，1987 年谷物为 125.7 万吨，而 1988 年仅为 59.1 万吨，下降了 47%。1991 年头 5 个月，肉和奶的收购量分别减少了 25% 和 15%。

爱沙尼亚较早地重视吸引外国投资者，自 1987 年以来已建立 800 多家合资企业，投资资本为 1.26 亿美元。

爱沙尼亚的文化教育和科学发展水平较高。全国有 6 所高等院校、37 所中等专业学校、600 所普通中学。1987 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的从业人员中具备高等和中等专业水平的人为 23.16 万，占从业人员总数的 32.6%。有 350 多年历史的塔尔图国立大学是爱沙尼亚最古老的学府，其中有中国学研究中心。

爱沙尼亚人能歌善舞。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的歌咏节是传统节日。爱沙尼亚的民族服装装饰品丰富多彩，精美无比。

中国与爱沙尼亚于 1991 年 9 月 11 建立了外交关系。已有 400 华人先后到爱沙尼亚经商。

拉脱维亚

拉脱维亚共和国位于原苏联欧洲部分的西北部，西濒波罗的海。地理和气候条件与立陶宛、爱沙尼亚极为相似。拉脱维亚面积 6.37 万平方公里。人口 268.7 万，其中拉脱维亚人占 53.7%，俄罗斯人占 34%，还有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拉脱维亚大多数信奉基督教新教，少数信奉天主教和东正教。当地主要语言是拉脱维亚语，也讲俄语。拉脱维亚首都里加，全国近 35% 的人口居住在首都。较大的城市还有陶格夫匹尔斯、利耶帕亚、文茨皮尔斯、叶迦皮尔斯等。

拉脱维亚矿产资源贫乏，动力工业主要依赖进口燃料。主要资源有泥炭、白云石、石英砂和石膏等。拉脱维亚是波罗的海沿岸经济发达的共和国。经济支柱是加工工业、轻工业、食品工业。机械制造和金属加工工业占主导地位。主要工业项目有：电力机械、无线电器械、通信设备、仪表、运输机械和农业机械等。独立之前拉脱维亚生产全苏联 1/5 的有轨电车、1/2 的挤奶装置、1/2 的摩托脚踏两用车、1/5 的收音机和 1/8 的洗衣机。该国生产的农业机械销往 15 个国家。化学工业主要生产化学纤维、化学丝、玻璃纤维、热塑管和管道零件、合成树脂及塑料、化学药品等。拉脱维亚的家具和火柴生产出色。轻工业中的针织业和食品工业中的黄油干酪加工特别发达。

拉脱维亚的农牧业发达。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占国土面积的 60%，其中耕地草场和牧场约占 2/3，有 35% 的从业人员在农工联合体工作。拉脱维亚以种谷物、亚麻、甜菜和马铃薯为主。半数耕地用以种植饲料作物。75% 的集体农庄都有养蜂场。畜牧产品占全国农庄和国营农场产值的 90%，主要是奶牛和养猪。

拉脱维亚的利耶帕亚和温茨匹尔斯基本上是不冻港，里加在破冰船的帮助下，可维持冬季海运。这三个港口占原苏联通过波罗的海的对外贸易及旅行吞吐量的 40%。拉脱维亚人均月薪 1989 年为 249.9 卢布，仅次于爱沙尼亚和俄罗斯联邦，是原苏联经济最发达和富饶的地区之一。拉脱维亚独立后，制定了今后的发展战略，1991 年 9 月 5 日宣布，1992 年发行本国货币，以加速向市场经济过渡。拉脱维亚将继续保持同一些原苏联共和国正常的睦邻关系，特别是保持原有的经济联系。但走向欧洲是该共和国的最终目标。

拉脱维亚全国近一半的居民参加各种形式的学习。全国高等院校 10 所，在校生 4 万多人。里加的艺术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闻名于原苏联。

中国与拉脱维亚建交日期是 1991 年 9 月 12 日。目前在拉脱维亚有 150 华人，多为中国北方人。

白俄罗斯

白俄罗斯共和国位于原苏联东欧平原西部，它的西部与波兰接壤，西北部与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接壤，东北部与俄罗斯联邦毗邻，南部与乌克兰相连。领土面积 20.76 万平方公里，在原苏联排第六位。人口 1026 万。白俄罗斯共和国境内生活着 80 多个民族和部族。其中白俄罗斯人占 77.9%，俄罗斯人占 13.2%，波兰人占 4.1%，其他民族还有乌克兰人、犹太人等。在其领土上划分为 6 个州和 117 个区；有 96 个市和 111 个镇。首都明斯克，历史悠久，是苏联最大的工业中心之一。白俄罗斯大多信仰东正教，讲俄语，当地主要语言是白俄罗斯语。

白俄罗斯在卫国战争中遭到法西斯德国的严重破坏，损失惨重。死亡人数达 220 多万，占当时总人口的 1/4 以上，9200 个村庄被毁，209 座城市变成废墟，工业几乎不存在。战后，白俄罗斯在联盟的支援下，工农业生产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原苏联国民经济中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白俄罗斯境内大部分是沼泽和泥炭地，1/3 是森林。现已探明该共和国蕴藏着大量优质石油、丰富的泥炭和岩盐、钾盐等资源。除了传统的泥炭开采外，还有发达的仪器制造和先进的无线电电子工业和电机工业。机床、汽车和拖拉机制造是原苏联的骨干产业之一。根据 1988 年的统计，用于畜牧业和饲料生产的机器设备占原苏联总产量的 24.5%，矿肥占 40%，化纤占 28.1%，摩托车占 21.3%，电冰箱占 11.3%，电视机占 10.8%，金属切削机床占 10.5%。

白俄罗斯地势平坦，水源充裕。境内大小河流 2 万多条，总长度达 9 万多公里；有湖泊 1.1 万个，享有“万湖之国”的美誉。水路运输在全苏中最为发达。农业可耕地的 60% 用于种植经济作物和粮食，10% 以上是牧场。畜牧业占农业产值的一半以上，以养牛为主。白俄罗斯又是原苏联牛奶、油类、亚麻和土豆的主要产区之一。奶产量居原全苏第 3 位，肉产量居第 4 位，土豆 1988 年产量 770.8 万吨，占原全苏总产量的 13%，粮食作物以麦类和玉米为主。经济作物是亚麻，1988 年的产量占原全苏总产量的 26.6%。

白俄罗斯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大部分靠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共和国提供，生产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因此，该共和国经济上很难完全独立。最近，白俄罗斯除了积极参加新经济联盟和政治联盟活动外，正着手向市场经济过渡，以改善其不断恶化的经济形势。

1992 年 1 月 20 日，白俄罗斯共和国与中国建交。

在明斯克约有 500 华人，多为学生或小商贩。华人中有经营稀有金属发大财者。在白俄罗斯全境约有 2400 华人，流动性较大。华人餐馆在筹建中的有三家。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共和国位于原苏联外高加索中西部，西临黑海，西与土耳其为邻。面积 6.97 万平方公里。人口 544.9 万。其中格鲁吉亚人占 70.1%，其他民族有亚美尼亚人、俄罗斯人、阿塞拜疆人、奥塞梯人和阿布哈兹人。包括阿布哈兹和阿扎尔两个自治共和国和南奥塞梯自治洲。下辖 65 个区，51 个市，61 个镇。首都第比利斯。格鲁吉亚人大多数信仰东正教，少数人信仰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讲俄语，当地主要语言是格鲁吉亚语。

格鲁吉亚是传统的农业国。农业主要种植茶叶、柑桔、葡萄和果树栽培。葡萄种植和酿酒是最早的和最重要的经济部门。葡萄园面积 14.7 万公顷。茶园 6.7 万公顷，茶叶年产量占原全苏的 95%，达 50 万吨以上。畜牧业和养蚕业较发达。格鲁吉亚的工农业总产值仅占原苏工农业总产值的 1% 多一点（1989 年统计）。94% 的谷物、76% 的牛奶、40% 的肉类和 100% 的石油、天然气均需俄罗斯联邦提供。近年来工业发展较快。以电力、燃料、黑色冶金、机械制造、化学、建材、食品为主。地下资源丰富，有煤、石油、锰等。水力蕴藏量达 1550 万千瓦。1990 年发电 158 亿度。

格鲁吉亚人受教育程度很高，据 1989 年统计，每千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者达 725 人。

格鲁吉亚目前国内民族矛盾比较尖锐。南奥塞梯自治州为脱离格鲁吉亚独立，开始了与格鲁吉亚旷日持久的对抗。1992 年 6 月 24 日，俄罗斯同格罗吉亚就停止南奥塞梯冲突签署协议。

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是原苏联外高加索三个共和国中最大的一个。位于外高加索东部，东濒里海，面积 8.66 万平方公里。人口 714.56 万。其中阿塞拜疆人占 82.7%，俄罗斯人占 5.6%，亚美尼亚人占 5.6%。阿塞拜疆人信仰伊斯兰教，亚美尼亚人和俄罗斯人信仰基督教东正教。当地主要语言是阿塞拜疆语，讲俄语。首都是巴库。

阿塞拜疆共和国自然资源丰富，盛产石油和天然气。该国的石油加工工业、石油化学工业、机器制造、有色冶金、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比较发达。据统计，它为原苏联提供 60% 的石油和天然气设备。农业主要种植棉花、烟草、谷物、茶叶、蔬菜和水果。葡萄酒产量占原苏联的 32%。由于近几年政局动荡，一些重要经济指标出现了负增长。同 1988 年相比，1989 年的国民收入下降了 2.5%，仅为 112 亿卢布；工业产值减少 2.77 亿卢布，为 119 亿卢布；农业产值下降 5.6%，为 85 亿卢布；农业的社会劳动生产率下降 2.5%，居民的实际收入下降。

近年来，阿塞拜疆经济形势不断恶化，民族矛盾尖锐复杂。自 1988 年 2 月以来，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自治州的归属问题已成为阿塞拜疆同亚美尼亚民族冲突的焦点。纳——卡州位于阿塞拜疆境内，面积 4400 平方公里，人口 18 万。1923 年 7 月 7 日该自治州成立，有 49 个民族，亚美尼亚人占 80% 以上。历史上外高加索的 3 个主要民族就时有纷争，加上宗教信仰不同，80% 以上的亚美尼亚人却归阿塞拜疆管辖，纳——卡州的亚美尼亚人早就要求将该州划归亚美尼亚，而阿塞拜疆不同意。1989 年年底和 1990 年初，阿塞拜疆人和亚美尼亚人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迄今为止，冲突已发展成局部战争。800 多人丧生，几千人受伤致残，数万人沦为难民，1/3 房屋被毁，大片耕地荒废。1991 年 11 月 20 日，一架载有阿塞拜疆、俄罗斯和哈萨克高级官员的军用飞机在前往纳——卡州执行任务时失事，机上 23 人全部遇难。两国关系由此急剧恶化。1992 年 5 月 18 日，亚美尼亚攻占了阿塞拜疆通往纳卡地区的一个狭长地带，这使它们南边的邻国土耳其和伊朗感到不安。阿亚两国领导人都表示希望依靠国际社会的力量和平解决卡拉巴赫问题。俄罗斯驻联合国常驻代表主张联合国派遣维持和平部队在该地区长期存在。

亚美尼亚

亚美尼亚共和国位于外高加索南部。西邻土耳其，南与伊朗接壤。面积 2.98 万平方公里。人口 358 万，占原苏联人口的 1.2%。其中亚美尼亚人占 93%，阿塞拜疆人占 3%，俄罗斯人占 2%，库尔德人占 2%，人口平均密度为每平方英里 281 人，是原苏联平均人口密度的 7 倍。45% 的人口集中在占共和国面积仅为 6.5% 的阿拉拉特谷地。该国信仰基督教。讲俄语、亚美尼亚语。首都埃里温。

亚美尼亚共和国有色金属资源丰富，如铜矿、铜钼矿、多金属矿及霞石。森林覆盖率为 12%。主要能源是水力资源。该共和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主要工业部门有机器制造业，如电机、仪器和机床等。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产值约占工业总产值的 2/5。轻工业以纺织业（特别是针织业）和制鞋业为主。食品工业以葡萄酿酒和果品蔬菜罐头制作为主，农业以栽种葡萄果树为主，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其次是大麦和玉米。经济作物有甜菜、烟草、天竺葵。畜牧业主要是养羊。亚美尼亚机器制造业 95% 以上的产品、90% 的水果蔬菜以及 70% 的酒类和烈性酒，出口到原苏联其他共和国和国外。

亚美尼亚人的文化水平较高。该共和国是原苏联科学研究、计算机和计量工具的重要中心之一。1986 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作的人员中，平均 1000 人中就有 923 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

亚美尼亚现在面临着经济形势严峻和民族矛盾尖锐两大问题。目前亚美尼亚内债已达 123 亿卢布，外债达 4.1 亿美元。由于亚美尼亚的地理位置，使其在经济上受制于阿塞拜疆。卡尔巴赫冲突不断升级，阿塞拜疆对亚美尼亚实行了经济封锁。1991 年 11 月 4 日，阿关闭了途经该共和国向亚美尼亚输送天然气的管道，使亚美尼亚工业蒙受 6 亿卢布的损失，80% 的企业被迫停产，居民住宅的能源供应中断。电力不足使亚美尼亚电视台只能播放 3 个小时的节目。汽油短缺造成邮局无法将报纸送到读者手中；城市居民面临饥饿和寒冷的威胁。11 月 20 日发生的“飞机事件”又加剧了局势的变化。为此，阿塞拜疆又封锁了通往阿美尼亚的公路和铁路，亚美尼亚处境更加艰难。目前国际社会和原苏联各有关加盟共和国正试图以和平方式帮助解决两国争端。

哈萨克

哈萨克共和国位于原苏联的中亚，大部分领土北面与俄罗斯相接，东南临中国，南与吉尔吉斯和乌兹别克和土库曼为邻，西濒黑海，面积 271.73 万平方公里。人口 1669 万。其中哈萨克人占 39.7%，俄罗斯人占 37.8%，除此以外，还有乌克兰族、鞑靼族等。哈萨克族信仰伊斯兰教。当地主要语言是哈萨克语、俄语。首都是阿拉木图。

哈萨克矿产能源等自然资源丰富。煤炭储量 1400 亿吨，占原苏联的 1/10，年发电量达 897 亿度，原油产量为 2540 万吨。粮食产量占原全苏总产量的 10—19%，其粮食和能源均自给有余。哈萨克实际上是原苏联农副产品和原料的供应地。哈萨克工农业总产值已达 500 多亿卢布，一个以能源采矿工业为主的基础工业体系已形成。

该共和国同样存在民族矛盾。但该共和国比较理智地处理了国内民族关系，又通过了《主权宣言》、《语言法》等文件，基本上兼顾了各民族的利益和要求。因此，在当前原全苏民族矛盾尖锐的大气候下，这个多民族共和国各族人民相安无事。该共和国经济生活很稳定，供应较充足，人民安居乐业。

苏联解体后，尽管哈萨克寻求更大的主权和独立，但由于对原联盟经济上依附很深，难以独立。长期以来，哈萨克以原料生产为专业化方向，重点发展煤炭、石油、采矿和农牧业，机器制造业仅占工业产值的 17%，加工制造业尤为落后，大部分生产资料，甚至 70% 的日用消费品有赖于其它加盟共和国提供，哈萨克作为原联盟中的一员，得到原苏联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支援。因此，哈萨克共和国仍与原苏联各共和国保持密切的合作和联系。

哈萨克共和国与中国于 1992 年 1 月 3 日建交。

乌兹别克

乌兹别克共和国位于原苏联中亚部分，与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阿富汗、土库曼为邻。该共和国面积为 44.74 万平方公里，占原全苏第五位。人口 2032 万，居原全苏的第三位。其中乌兹别克人占 68.5%，俄罗斯人占 10.4%，塔吉克人占 5%，哈萨克人占 4%。乌兹别克人信仰伊斯兰教，人们的生活习惯和行为规范受宗教影响很深。当地主要语言是乌兹别克语、俄语。下辖一个自治共和国和 12 个州。首都塔什干，已有 1000 多年历史，是原苏联第四大城市。

在中亚地区，乌兹别克共和国的经济力量较强。工农业总产值比吉尔吉斯、塔吉克和土库曼三国的总和还要多 60%。它是原苏联的主要产棉区、养蚕和洋麻种植业的主要基地。1990 年在原苏联乌兹别克的国民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是唯一没有下降的。但是该共和国对原联盟中央在财政上依赖性很大，共和国的经济具有单一性，原料生产占的比重很大，60% 的工业品和 50% 多的商品需从外面购买。在经济改革方面，卡里英夫总统主张采取稳健的措施，调整经济结构，积极对外开放，以增强经济自主能力，逐步减少对联盟经济的依赖。该共和国改革的重点是搞活国营大中型企业，使其发挥经济的主导作用，有限度和分阶段地实施私有化。

该民族受教育程度较高。境内拥有各类学校 1 万多所，在校学生 630 万人。其中，各类高等院校和中等专业技术学校 500 多所。受过高等、中等教育的人数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了许多发达国家。乌兹别克人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于经商。

1992 年 1 月 2 日，乌兹别克与中国建交。

摩尔多瓦

摩尔多瓦共和国位于原苏联欧洲部分的西南部，东与乌克兰接壤，西与罗马尼亚为邻。全共和国面积 3.37 万平方公里。人口 434.1 万。其中摩尔多瓦人占 64.3%，乌克兰人占 14%，俄罗斯人占 12.8%。摩尔多瓦人和乌克兰人、俄罗斯人基本上分居在德涅斯特河的西东两地区。加告兹人和保加利亚人居住在南部地区。宗教信仰主要是东正教。当地主要语言是摩尔达维亚语，讲俄语。首都基什尼奥夫。

摩尔多瓦共和国经济不发达，工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能源缺乏，重工业薄弱，食品工业和轻工业比较发达。特别是食品工业。食品工业主要是葡萄酒酿造、蔬菜、水果、罐头、肉类加工和制糖业等。轻工业有卷烟、纺织和制鞋业。农业主要是蔬菜、水果、烟、甜菜、向日葵、玉米和小麦。葡萄种植业和园艺业在农业中占重要地位。葡萄种植面积为 25.3 万公顷，占原全苏葡萄种植面积的 30% 以上。香槟酒和白兰地酒产量约占全苏的 1/5，果汁约占 1/3，糖产量居全苏第三位。肉类、奶类和蛋类产品都在原全苏占有一定的比重。

为应付独立后的形势，摩尔维亚政府很注重同原苏联其他共和国的经济联系，签订了许多经济与技术合作协议和相互供货协定，进口大量石油煤炭作为储备。

土库曼

土库曼共和国位于中亚西南部。南邻伊朗和阿富汗，西濒里海。面积48.81万平方公里，占原全苏总面积的2.2%。是原苏联境内面积第四位。人口362.1万，占原全苏人口的总数的1.19%。其中土库曼人口占72%，俄罗斯人占10%，还有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乌克兰人等。土库曼人信仰伊斯兰教。9.3%的人说土库曼语，也讲俄语。土库曼境内已消灭了文盲，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的人数居中亚其他共和国之首。1986年在国民经济各部门工作的每1000人中有902人受过高等或中等教育。该共和国首都是阿什哈巴德。

土库曼有着丰富的矿藏资源。已探明的石油与天然气的储藏量在原苏联占第二位。其他丰富的矿藏还有硫磺、重晶石、芒硝、钾盐等。土库曼的卡拉库姆沙漠是世界上第四大沙漠。由于缺水严重，土库曼境内95%的土地无法灌溉。为此，该共和国在卡拉姆修建了长达1450公里的大运河，是原苏联在沙漠上最大的水利设施。

土库曼共和国的主要工业部门有石油和天然气开采、化工、轻工和食品工业。农业主要是棉花种植业。棉田占耕地面积的一半。棉花产量居原苏联的第二位，细纤维棉花产量占原苏联产量的28%。其它农作物还有谷类、水果和蔬菜，产量较少。畜牧业主要饲养绵羊和山羊，畜产总值占共和国农业生产总值的2/5。羔皮产量占原全苏联20%，居第二位。蚕茧产量占原全苏产量的10%，居第三位。

土库曼开始改革的时间比其它共和国都早，尽管该共和国目前的经济状况很不景气，但老百姓对目前共和国状况感到满意。局势平静，没有种族冲突。

1992年1月6日，土库曼共和国与中国建交。目前有数百华人在土库曼。

吉尔吉斯

吉尔吉斯共和国位于中亚的东北部，北临哈萨克，西与乌兹别克、南与塔吉克相连，东面与我国新疆为邻。面积 19.85 万平方公里。人口 437.2 多万。其中吉尔吉斯人约占 45%，俄罗斯人占 21%。此外，还有乌兹别克人和乌克兰人等。1874 年从我国陕西迁去的约 5 万回族，现居住在楚河流域。宗教信仰是伊斯兰教。吉尔吉斯人讲吉尔吉斯语，其文字以俄文为基础。首都 是比什凯克。

吉尔吉斯是小国，山地之国，水力资源丰富，在中亚经济区的四周中，吉尔吉斯的经济实力仅次于乌兹别克。工农业总产值约为 70 多亿卢布，排列第二位。主要工业有采矿、机械制造、轻工、食品。另外出产煤、石油和天然气。农业主要是畜牧业。种植业占共和国农业总产值的 46%。主要粮食作物是小麦。种植业占共和国农业总产值的 46%。经济作物有棉花和甜菜等。吉尔吉斯在经济上不能自立，大部分商品需要从外面购进。但该共和国电力工业和畜牧业比较发达，细羊毛收购量占原全苏联第一，1/3 的电力输往其它共和国。该共和国对原苏联的依赖性很大，中央的财政补贴占共和国的 3/4 左右。苏联解体后，该共和国生产持续滑坡，市场供应越来越糟。

为摆脱危机，当局采取三种方法：一加强同其它共和国的横向经济联系与合作。根据同其它国家达成的协议，从哈萨克进口粮食、从乌兹别克进口石油和棉花、从乌克兰进口钢材和设备等。俄罗斯联邦和乌克兰答应提供总值为 20 亿卢布的援助。二是寄希望于经济共同体条约。三是大幅度实施私有化。根据共和国拟定的方案，80% 的商业企业、90% 的生活服务业和 30—40% 的工业将转为私有化。

1992 年 1 月 5 日，吉尔吉斯共和国同中国建交。由中国新疆进入该国的华人约有 2000 人，多为游商。

塔吉克

塔吉克共和国位于原苏联中亚东南部。南面与阿富汗接壤，东面与中国新疆相连。面积 14.31 万平方公里。人口 551.2 万，其中塔吉克人占 62.3%，乌兹别克人占 23.5%，俄罗斯人占 7.6%，鞑靼人占 1.4%，吉尔吉斯人为 1%，乌克兰人为 1%。宗教信仰伊斯兰教，多数属逊尼派，少数为什叶派。塔吉克民族语言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有文字。首都杜尚别。

塔吉克在原苏联国民经济综合体中是一个以种植棉花、开采有色金属矿和稀有金属矿、经营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而著称的地区。但该共和国面积较小，自然资源缺乏，经济上对外依赖性很强。该共和国的工业产值占社会总产值的 56%。矿产资源主要是铝、锌、钨、锑、汞等有色金属和稀有金属。主要部门有采矿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轻工业项目有轧棉、缫丝、纺织制毯等。食品工业多半是榨油、提炼脂肪业、葡萄酒酿造业和果品蔬菜加工。该共和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经济的中心地带在北方的费尔干纳盆地，工业主要集中在首都杜尚别和列宁纳巴德。

塔吉克共和国 90% 以上的土地为山地。农业总产值的 69% 是种植业。主要种植谷物，其面积占全部耕地面积的 1/2，有小麦、大麦、水稻、玉米、马铃薯。棉花种植在农业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其中以种植优质细纤维棉花而著名。该共和国棉花产量占原全苏联的第三位，单产面积产量居原苏联首位。塔吉克畜牧业以饲养羊、马、牛等为主。

塔吉克人大多数从事农业生产。城市化水平偏低，劳动力流动性小，城市工业部门的从业人员明显不足，懂俄语和技术的人材十分缺乏，本民族职工则更少。该共和国 1989 年国民收入按职工平均月薪计算为 188.3 卢布，是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倒数第三，工业增长率始终在低处徘徊。

1992 年 1 月 4 日，塔吉克共和国正式与中国建交。目前有近千华人（多为中国西北地区人）进入该国经商。

后 记

1991年初，几位知心挑唆我改改笔调，写点除说教记实以外的可读之物。这本东西出版后，最失望的恐怕就是这几个好对我指手划脚的酸客。

在东欧6国及原苏联的15个国家，又有一些朋友衷告我笔下留情。这使我为难。真的东西不写，写什么？编造的历史要毒害几代人。为不使被采访的千百个同胞为难，只有写真事，冠以化名。炎黄同胞不愿做出头之鸟、拔尖之毛。发财的不愿露富，失败者又恐落入耻笑，其心情可以理解。借此机会首先感谢提供可信素材和百忙中接受采访的华人。蠢笔能触及华人的各个方面，仰仗这些朋友的大力支持。

有同胞问我国外怎样，东欧怎样，出国好不好等等不易简单回答的问题，这本书里有些答案。总的来讲，只要有一定条件，出去闯闯不是坏事。尽管中国人刚刚走出国门时会出一点笑话，会交一点学费，但自卑是完全不必要的。我发觉敢走出国门的学者、商人，甚至某些国家的领导者们，总的来看要比关在自家书房、办公室和夜郎城中沾沾自得的人士要开明一点。

中国人涌入东欧于国家无害。走一个解决一个就业问题，在国际大小商场中滚爬锻炼总比都挤在秀水一巷勾心斗角的好。海外华人赚了钱回国投资，利国利民。也有一些人才流失，中国总不能把人才个个留在笼子关着，而光让蠢才出国显眼。只要国策不变，国运不变，海外人才倒流中国是完全可能的。

令出国者伤心的第一件事是护照。现在正改革，手续已简化许多，但还是难。某些部门流弊千端。贿赂，伤了千千万万出国人的心，又使千千万万公职人员变坏，使不劳而获的国际性人贩子谋取暴利，不明真相的外国人还瞎嚷嚷中国人权问题。

借此机会对想去东欧的同胞提点建议。小报上一些关于“倒爷大淘金”的故事不少是幻想发财而又不能的人在书房里臆造的。做生意在你极为熟悉的国内环境如果都是难事，出国就更不容易了。先出去看看是可以的，投资是要小心的。为什么西方商人至今在这一地区的投资者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在东欧获得成功的华人也是少数，总结他们的成功经验，不外是：多少了解一些东欧国情，国内有一定的支持背景，有一个以上信得过的搭档，外语基础好（或有可靠的翻译），深谙经商白道黑道，资金较多，等等。多一项条件就多一份把握。信不信由你。中国人爱面子，回国的人难免把好的一面夸大说说，又有一种人贩子，还专门吹外国世界多精彩，诱使天真的人砸锅卖铁向他买护照，多少人后悔不迭，悔之晚矣！如果此书能给那些想出国的人一些启发，就能让作者得到最大的安慰。

挚友张达、洪武、尔军、小军等人慷慨相助，使笔者多行数万里采访或体验东欧华人事业与生活；

海波、宗泽、邓平、李钢、张春来等友补充了本书很多宝贵内容；海波、兴华为本书下了点睛之笔；

彭鸿斌、王强、大鹰、李延、张琳等友曾为此书出版奔走费力；

Romeo Stine、Judith Blaho、Constantin Shie、Chen Ming、I-van Romanov等海外友人的支持和保驾使笔者顺利采访到第一手材料。

此书献给以上关心帮助过此书的人们，献给千千万万可歌可泣的在东欧悲壮创业的华人同胞。

作者
1992年8月24日14时
于北京西单

